

# 王宁教授的世界文学观

## ——王宁教授访谈录

王祖友<sup>1</sup> 王 宁<sup>2</sup>

(1. 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2. 清华大学 外文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世界文学崛起并迅速成为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话题。本文是对王宁教授的访谈录,主要涉及世界文学的概念、发展模式 and 体系、世界文学作品构成、比较文学的新问题和方法,以及作为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理论升华的世界诗学的建构等。作为学贯中西的国际知名学者,王宁教授结合自己学习、考察、研究经历,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的和中国的视角提出了一种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这一理论话题值得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并将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格局。

**关键词:**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世界诗学

## Professor Wang Ning's World Literature View: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Ning

WANG Ning WANG Zuyou

**Abstract:** World literature has risen and rapidly become another current theoretical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circle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Ning mainly involves such issues as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its development mode and system, the form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new issues of an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as sublim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theory. Based on the research by Western scholars, Professor Wang Ning, a famous international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bines his own experience of stud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ng world poetics from the comparative and Chinese

---

**作者简介:**王祖友,男,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王 宁,男,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致远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perspective. This topic is worth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concern and discussion, hence changing and remapping the present world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situation.

**Key words:**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poetics

王宁,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致远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2017年7月11日,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2017年年会在我校举行。笔者受《英语研究》的委托对王宁教授进行访谈,现就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王祖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2017年年会在我校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界文学的在地化:阅读、翻译与传播”,您认为这个主题的时代意义有哪些?如何做到“世界文学的在地化”?

**王宁:**众所周知,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比较文学在西方世界陷入了危机境地,所幸的是世界文学崛起并迅速成为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话题。“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是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学子艾克曼谈话时创造出来的一个充满“乌托邦”幻想色彩的概念,但实际上歌德并不是第一个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人,早在1810年,克里斯托弗·马丁·魏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就率先使用了这一术语,哲学家赫尔德等人也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诸如“世界的文学”这样的表达法。但是人们不可否认,歌德是最早将其付诸实践和概念化的思想家和作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歌德被称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鼻祖之一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他的理论概念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启发性,并引起一代又一代学者们的讨论甚至争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致使世界文学这一课题再度成为一门显学。因此可以说它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产物。

另一方面,世界文学发展到今天,早已摆脱了早先的乌托邦色彩,成了当今时代的一个审美现实。我们都知道,歌德具有广阔的世界主义视野,他所关注的文学现象不仅仅限于德国和欧洲,而是涉及了广袤的东方诸国,尤其是中国文学。当时年逾古稀的歌德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总结道:“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歌德虽然不懂中文以及其他东方语言,但他当年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恰恰得助于他通过翻译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的阅读,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许已经忘记了《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和《玉娇梨》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启发了歌德,使他得出了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这一点颇值得我们

事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深思。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借用了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作为全球资本化的一个直接后果的资产阶级文学生产的“世界主义特征”。马恩在考察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发展后总结道:“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较之歌德早年的狭窄概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实际上专指一种包括所有知识生产在内的全球性的世界文化。在这里,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乌托邦想象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试图证明,随着世界市场开拓的加速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或文化知识(生产)已经出现。这就赋予我们以一种开阔的、超越了民族/国别视野的全球视野来考察文学。用于文学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现象,还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下来比较和考察。我们今天若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雏形,它在某种程度上就产生自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当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眼光来研究文学现象,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进展。这也许正是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正是为什么世界文学必须“本土化”或“在地化”的一个原因所在。因为它并非凭空出现的,而恰恰是各民族文学的优秀作品凝练成的。

**王祖友:**作为特邀嘉宾您作了题为“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旨发言,能请您简明扼要地阐释一下您的观点吗?

**王宁:**我们都知道,在最近十多年里,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沉寂已久的世界主义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它频繁地出现在哲学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并且更为频繁地得到专门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引证和讨论。这些研究和批评性著述大多从政治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世界主义,但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文学和文化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将其与当今比较文学界所热烈讨论的世界文学这个话题相关联。当然,从世界主义过渡到“世界文学”,必然涉及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理念。虽然中国古典哲学中也有一些世界主义的因子,比如说所谓的“天下观”就被一些东西方哲学家所热烈讨论。但是世界主义真正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却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并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有着世界主义主题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们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世界文学的分布,就不难发现,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祟,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一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因此我们今天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讨论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就一定要从中国的文学立场和理论视角出发,借助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这个理论视角大力

促使中国文学进一步走向世界。而在这方面,翻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我们讨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助于翻译的中介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推向世界,从而对重新绘制新的世界文学版图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虽然这是三个独立的话题,但彼此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便促使我将其放在一个讲座中来讲授。

**王祖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文学学术界出现了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热。讨论的世界文学理论热点问题有:重新定义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的发展模式和体系;世界文学作品是由融合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译本构成;世界文学话语的实践层面。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看法?

**王宁:** 确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比较文学界就有学者开始关注世界文学这一现象,例如荷兰学者佛克马就在出版于1987年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中,多次讨论了世界文学问题,并将其与文学经典的形成相关联。但真正促使这一现象成为比较文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则始自世纪之交,在这方面,法国的卡萨诺瓦、美籍意大利学者莫莱蒂、美国学者达姆罗什、比利时学者德汉等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他们频繁地著书立说,并在各种国际会议或论坛上发表见解,试图对世界文学这一老话题进行全新的阐释。他们的先期研究成果对我本人也不无启迪,而我本人也于20世纪初参与了这一讨论,并在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同时分别在 *Neohelic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欧美学术刊物上编辑了好几个主题专辑,发表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论文。我从达姆罗什的定义出发,通过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将其作些修正和进一步发挥,并提出我本人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和重建。在我看来,我们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时,实际上已经至少赋予它以下列三重涵义:

(1) 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

(2) 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

(3) 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

此外,我还认为,并非世界各地的文学放在一起就是世界文学,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必须有如下几个标准:①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②其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③是否纳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④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⑤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研究。只有从上述诸方面来衡量,我们才能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我的这些观点在国际学界发表后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并得到国际同行的回应。

**王祖友:** 全球范围内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各个学派各有一位代表性的学者:空间说及其代表性人物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问题说及其代表性人物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流通说及其代

表性人物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您最认同这三种理论的哪一种?

王宁:实际上并不能说他们是三个学派,他们各自的著述实际上着眼于三种不同的视角,他们彼此间并未展开争论,而是在互补和互证。我这里首先概括一下这三位理论家的世界文学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观主要体现于她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La re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1999)一书。该书尤其对达姆罗什有着很大的启发,这本书是近十多年来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一部非英语著作,同时也是法语世界研究世界文学的一部奠基性著作,2004年该书译成英文出版后,在英语世界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并广为人们所引证,它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出版为推进英语世界的世界文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外,卡萨诺瓦本人也身体力行,她一直活跃在世界文学教学第一线,经常往返于欧美两大洲,将世界文学的理念从书本直接引入课堂。她的这本书开篇就讨论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并以费南德·布罗代尔的《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为出发点,高屋建瓴地描述了整个世界的状况。她将“世界文学空间当作一个历史和地理概念”来考察。她认为,这一广大的世界文学空间一直为两个为人们所认可的习俗所遮盖:第一是将文学的书写当作纯粹的创作活动;第二则是在民族/国别文学的框架内来看待文学。但是同时她又论证道,这显然远远不够,因为事实上,文学并非,也不可能仅仅限于在民族文学的领地中发挥作用,它也不纯然是一种创作活动。她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一大批作家已经暗示了这一真实情形,我们仍可以将文学领域本身当作是一个关涉文学的研究的学术领域,但我们往往却会忽视这一点。

莫莱蒂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关于世界文学的主要著述包括论文《世界文学的构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2000)、《更多的构想》(*More Conjectures*, 2003)和《演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Evolution, World-System, Weltliteratur*, 2009)等,在这些论文中,他从今天的视角赋予世界文学这个老话题以新的意义和内涵。在《世界文学的构想》一文中,莫莱蒂拓展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认为,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既然不同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因此在他看来,“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莫莱蒂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Moretti, 2000: 55)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对于在英语世界挑起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曾经是莫莱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我1998年首次在哥大讲学时,达姆罗什和莫莱蒂一起请我共进午餐,那时我就和他们相识了。他后来将他的新书《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赠送给我,希望我在国内也发起这方面的讨论。可以说,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达姆罗什是

一位领军人物,同时也是被引证和讨论最多的一位学者。他的这部专著现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奠基性经典著作,有着最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该书把世界文学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而不只是把这一术语用于价值评估的目的。作者在书中将世界文学分为经典(主要指历史上的文学名著)和杰作(当代优秀作品),认为这两类作品都应该被视为世界文学。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作者提出了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简略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

(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

达姆罗什不仅从理论概念上推进世界文学,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将世界文学的理念付诸教学和学术活动。早在21世纪初,他就领衔主编了六卷本《朗文世界文学选》,出任该选编创始总主编,并在其中收录了大量非西方的文学作品以及非经典的当代“杰作”(masterpiece),对于突破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西方中心主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11年,他还联合了欧美、亚洲和澳洲的一些学者共同在哈佛大学创立了世界文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World Literature),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暑期学校,为世界文学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普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从上述三位学者的论点中汲取营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即我从卡萨诺瓦的空间说中受到启发,将其拓展到西方文学以外的空间;从莫莱蒂的“远距离阅读”中汲取营养,认为通过翻译来把握世界文学的总体方向是可行的;从达姆罗什的具有解构意义的流通观点中得到启发,并加上了批评性选择这一点。当然,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也即世界文学并非只有一个版本,它既是单数,同时也是复数。

**王祖友:**“和而不同”思想集中体现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可以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和”就是研究各国文学优秀成分以期达到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新常态;“和而不同”就是不随声附和,同时又汲取不同研究的合理观点,实现“多元互补”。“和而不同”将各国文学的合理因素与合理成分联结一体,形成一个伟大的综合体——“文学的世界共和国”,推动真正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您如何评价“和而不同”作为阐释“世界文学”的理论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王宁:**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世界文学既是单数同时又是复数,它绝不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或艺术形式的文学。实际上,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世界文化和世界语言版图的重新绘制,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的现实:通过翻译的中介,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多个国家和不同的语境下广为流传;一些具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和身份的作家在一个跨文化的语境下从事写作,涉及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文学研究者自觉地把本国的文学放在一个世界性的语境下来考察和比较研究,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也意味着“超民族的”(transnational)

或“翻译的”(translational)的意义,意味着共同的审美特征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世界文学就其发展现状而言,远不止是一个固定的现象,而更是一个旅行的概念。在其旅行和流通的过程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同样,在其世界各地的旅行过程中,一些本来仅具有民族/国别影响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而另一些作品也许会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由于本身的可译性不明显或译者的误译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们不适应特定的文化或文学接受土壤。

实际上,佛克马早就指出,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前者强调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平等价值,后者则更为强调其普遍的共同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标准,这一点尤其体现于通过翻译来编辑文学作品选的工作。尽管文选编者们的初衷也许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的成果客观上却起到了对以往文学的挑选、筛选甚至经典化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文学问题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佛克马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我们受其启迪,认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确实可以做到“和而不同”,也即寻求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又各自保留了民族特色。这样看来,世界文学又是一种互补的和彼此对话的文学。

王祖友:目前,国外比较诗学的新问题与新方法主要有哪些?国内呢?

王宁:比较诗学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就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刘若愚(James J. Y. Liu, 1926—1986)、法国学者艾田浦(René Etiemble, 1909—2002)、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W. Fokkema, 1931—2011)以及美国学者孟而康(Earl Miner, 1927—2004)等人都作过推进。特别是孟而康这位精通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这方面出版的一部集大成之著《比较诗学:跨文化的文学理论》(*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在此方面影响最大。孟而康本人既是美国的弥尔顿研究专家,同时又对日本语言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因而他的比较诗学研究就明显地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世界诗学的研究。

孟而康基于跨东西方文化的视角,甚至提出一种新的比较诗学理论模式,但是他的诗学理论并未上升到总体文学和世界文论(诗学)建构的高度。其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西方的文学和批评理论经验并未被当作建构一种普适性世界文论的基础。确实,孟而康的研究基于跨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他通过仔细的阅读,从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中积累了大量的例证,从而发现了“一种生成性诗学”,虽然他没有使用诸如“世界”(world)或“普世的”(universal)这类词,但他实际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所谓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

式,从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诗学首先应当是“自满自足的”,不应该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和批评风尚的嬗变,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的美学原则。显然,孟而康集中讨论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作品,但却很少讨论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因此,今天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已经突破了这一点,试图在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建构一种世界诗学,虽然孟而康的著作对我们的理论建构不无启发,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少。另一方面,孟而康著作的局限还在于,他出版了《比较诗学》一书后不久就患病,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他已经开始萌发的世界诗学构想,这无疑给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再者,他的另一个局限则在于,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头脑里考虑最多的是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文论,虽然他在书中也稍带提及了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全然不提现代文论。因此他的研究更具有史的价值而并不能引发当下的理论讨论。因此后来在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并迅速步入学术前沿时,比较诗学便逐步被“边缘化”了。当然,孟而康的这些局限也给我们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者的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学者乐黛云、曹顺庆、杨乃乔、陈跃红、周启超等也发表过一些著述,在国内学界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王祖友:**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8月17—21日在河南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世界文学”,它的会议分议题之一是“比较文学变异学”,我对此颇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可否求教于您?

**王宁:** 在比较文学变异学方面,曹顺庆教授是专家,他在这方面著述甚丰,他两年前出版的英文专著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著。我也在英语世界的刊物《比较文学与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上发表了书评对之加以推介。我的主要观点是,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多追求“相同”,认为不同文化和文明中的文学是不可比的,而变异学恰恰就挑战了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对来自异质文化和文明的文学进行比较才最有意义和挑战性。我想强调差异至少可以反映拟议中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特色。

**王祖友:** 对于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您有何建议?

**王宁:** 作为一位长期以来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我的学术发展道路也许可以起到一些借鉴作用。也即我本人早先是专门学英语的,因而从一开始所从事的是英美文学研究,之后逐步过渡到西方文学和文论研究。由于我本人自幼热爱中国文学,读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因而很容易从中国学者的视角进入中西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研究领域。我的经验和建议是:无论我们一开始是学什么专业的,都要打好两个基本功,其一是要精通一两门外语,尤其是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这样就可以广泛地涉猎这一学科领域的国际前沿理论话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要有扎实的中国文学功底,这样你在国际学界的发言就有底气,同时也能代表中国学界发出





自己的声音。这当然是我本人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至少对青年学子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王祖友:最后请您对“世界文学”下个定义并阐述您的世界诗学构想。谢谢!

王宁:“世界文学”作为国际人文学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不仅吸引了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同时也引起了专事民族/国别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我在前面已经作过比较充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说明。在中国的语境下,长期以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并不包括中国文学本身,而是以外国文学的身份出现,这就人为地将自己划在了边缘的地位。在与比较文学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之后,这种情况虽有好转,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满足于向中国学界介绍外国文学及其研究成果,并没有达到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水平,因此它在国际学界不受重视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新的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应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将中国文学当作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加大其世界文学版图上所占的比重,从而加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

关于世界诗学的构想,我已经发表了论文,这里仅作简略的介绍。我在西方学者的先期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的和中国的视角提出了一种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我认为,世界诗学的建构有着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基础。此外,近几年来认知诗学的异军突起和日趋成熟,也为我们建构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或世界诗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建构世界诗学的理论根据主要有这三点:①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理论升华,而当今占据主流的西方文论并未涵盖不同国别和民族的文学和理论经验;②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都产生于西方语境,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局限,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不可能将其涵盖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范畴和经验,尽管一些理论家凭着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把握能力,通过强制性阐释,使自己的理论教义也能用于非西方文学阐释,但毕竟漏洞很多;③中国学者始终关注西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同时又有东方的本土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提出这一理论建构。因此我在对建构世界诗学的路径加以阐释后指出,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且值得国际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理论话题,将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格局。

#### 参考文献:

- [1] Miner, E.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 Moretti, F.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J]. *New Left Review*, 2000 (1):55.

责任编辑:郭建辉

# 毛姆对辜鸿铭和宋春舫的一卑一亢态度及其历史观

姚君伟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英国作家毛姆在创作中涉及过中国和中国人,然而并不友好。20世纪20年代初,毛姆到访中国,在拜访辜鸿铭的过程中,毕恭毕敬,表现出对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膜拜,而与中国现代戏剧家宋春舫面谈时,态度却极其傲慢。以往国内学者就此多从中外文学关系和形象学等视角来研究毛姆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本文通过追溯毛姆与辜鸿铭和宋春舫的具体交往,分析了毛姆一卑一亢的态度背后的旧史观。

**关键词:**毛姆;辜鸿铭;宋春舫;卑与亢;历史观

## Maugham's Modesty and Arrogance in His Respective Meetings with Ku Hungming and Soong Tsung Faung and His Historical Conception

YAO Junwei

**Abstract:** William S. Maugham touched up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n his works, though not so friendly. He visited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20s, but in his visits to Ku Hungming and Soong Tsung Faung, he was extremely modest and arrogant respectively.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meeting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s and to the Chinese images in Maugham's writing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trace and analyze their meetings and talks, especially Maugham's different attitudes to Ku and Soong, from which his old historical conception is revealed.

**Key words:** William S. Maugham; Ku Hungming; Soong Tsung Faung; modesty and arrogance; historical conception

---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201409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君伟,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 0. 引言

英国作家毛姆(William S. Maugham, 1874—1965)的名字在中国并不让人感到陌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毛姆的作品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他谈中国的文章《苦工》还被编入西南联大“大一英文”使用的《英文读本》。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曾出现过“毛姆热”。然而,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对中国人似乎并不太友好,小说中提及“中国侍者”开的小客栈,起名竟是“中国佬的茅房”;中国人在书里不是厨子,便是洗衣工,要不就是小伙计;在毛姆的其他作品里,中国人也多为负面形象。短篇《贞洁》里有个中国人是包工头,他承包工程时“要价太高”,后又在一家中国人开的赌场里打架斗殴,把一名“中国苦力”打成重伤,结果被捕。《人生的枷锁》里也写到一个中国人,即和主人公菲利普一同住在欧林教授夫人家寄宿公寓里的“宋先生”。一开始,菲利普对宋的印象还好,可没过多久,宋和公寓里的法国小姐凯西莉谈起了恋爱,菲利普、同住的三个老太,特别是房东太太立刻改变了对宋的态度,说他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看着令人感到惶恐甚至恶心。

小说是虚构的,毛姆笔下的人物当然并非就是他本人。那么,既然毛姆与中国有过交集,我们倒不妨追问,毛姆怎么看待中国文化?他与中国作家面对面的时候,有怎样的表现?这样的表现背后又体现出他怎样的历史观?他在《在中国屏风上》(1922)这部中国游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与辜鸿铭和宋春舫见面情形,从中不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 1. 毛姆拜访辜鸿铭时的“卑”

毛姆早就有远东之旅的计划。1919年8月,在他的《家庭和美人》《信》《圣火》等几部戏上演之后,计划终于得以实施。他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去美国纽约,横穿美国,去西海岸,坐船到香港,之后去上海、北京和沈阳,最后经日本和苏伊士运河回国。毛姆的这次旅行收获颇丰。中国令他陶醉,后来他说这是个能“给你一切”的国家。在这里,他见到具有东方异国情调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景观,也关注到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欧美的医生、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等。毛姆是个敏于观察的小说家,后来出版《作家笔记》,而此番他所做的笔记里就包括“领事、大班、恨嫁的老处女、讨厌本职工作的传教士、想家想疯了英美烟草公司代理商,还有来自法国南部生活在白墙修道院内思念家人的圣洁女院长。”(黑斯廷斯,2015:234)除了这些欧美人,毛姆在中国专门见了两个中国人,即辜鸿铭和宋春舫。

毛姆在提出拜访辜鸿铭之前,对他已有所了解,并说前去拜访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是他“这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辜鸿铭是“清末怪杰”,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因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学贯中西,热衷于将中国传统文

化引介到西方,英译《论语》《大学》《中庸》等中国儒家典籍,并著有《中国人的精神》等,在西方影响广泛,以至于当时的西方有“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在毛姆眼中,辜鸿铭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物。

毛姆提出拜访辜鸿铭的想法后,他的东道主马上安排,岂料辜鸿铭收到这位东道主的便条,根本不予理睬。毛姆得知后,深感如此对待辜鸿铭这样一位哲学家是不合适的,便补救式地拟了封措辞礼貌的信函,恭敬地提出拜访的要求,很快获许次日前往。

第二天,毛姆坐轿子来到辜鸿铭的住所,未见他本人,却先被引进到一间狭长低矮、陈设简陋的屋子里,见到满书架的中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以及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另有写的可能是孔子语录的书法条幅,他佩服至极。等到辜鸿铭进来,毛姆赶紧上前,谢谢他同意接受来访。辜鸿铭虽然客套地说,毛姆来访让他感到“很荣幸”,但他也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猜想是那张便条惹他生气,遂礼貌地说不是这样的,但辜鸿铭背靠在椅子上,“面带一种嘲讽的表情”看着他,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好“喃喃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毛姆,2013:105)。

毛姆拜访辜鸿铭时,后者已60多岁。他高个子,扎一条细长的灰辫子,眼袋厚重,牙齿缺损发黄,但眼睛明亮。在毛姆的认知中,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有一个尊贵的地位,他要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这样的尊贵,于是,辜鸿铭成了他恭维的对象。在接下来的时间,辜鸿铭一味地奚落西方和英国,认为英国人在哲学上没什么天分,而当毛姆问他是否研究过美国哲学时,他又嘲讽地说,他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感兴趣。辜鸿铭时而英语、时而德语地对毛姆酷评西方哲学,给毛姆的感觉是,辜鸿铭毫无保留地接受儒家学说,自信只有在儒家经典里才能找到智慧,因为它们回应了他的精神诉求,并使得西学显得空洞。毛姆谦卑地聆听着辜鸿铭在那里议论,他发现辜鸿铭“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吁求,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硬的儒家经典”(毛姆,2013:107)。谈到当时归国的留学生,辜鸿铭变得更加严厉,更加愤愤不平起来,他责备他们是在亵渎神明,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毛姆就这样坐在那里洗耳恭听。从历史上看,自19世纪中叶起,欧美人在中国人面前便一向怀有文化优越感,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他们大多数人眼里是低人一等的,但遇到辜鸿铭,毛姆却只能低头听着后者尽情反击西方文化而不以为忤: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

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置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青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奋的人吗?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毛姆,2013:107-108)

他们俩谈话时,辜鸿铭还把玩着他留的辫子,说这是个象征,并认为自己是古老中国最后的代表。毛姆听他绘声绘色地讲着一些中国历史事件,不禁大为感慨,像辜鸿铭这样一位满腹经纶的人物,自觉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却并不受重用,真是一个悲哀的人物。最后,毛姆几次提出告辞,辜鸿铭在宣纸上写了幅字送给他。毛姆问写的是什麼,辜鸿铭带着一丝恶意说那是他自己写的两首诗,并让他找英国朋友帮他解释大意。第一,辜鸿铭自己不想译给他听;第二,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其实也无知得很,根本无法领略中国诗的美妙,而只能读懂大意。毛姆对辜鸿铭朝圣般的拜访在后者尽情的奚落和侮辱中结束。

## 2. 毛姆面对宋春舫时的“亢”

毛姆在辜鸿铭面前似乎根本抬不起头来,也好像心甘情愿地不想抬起头来,虽然一开始,他以休谟和贝克莱为例,反驳辜鸿铭认为英国人没有多大哲学才能的观点。与他的种种“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等到他见中国现代戏剧家宋春舫的时候,他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言语和表情由朝圣般的“卑”转为极度傲慢的“亢”。

毛姆在《戏剧学者》一开头写到宋春舫送他的名片上写着“现代比较文学教授”,毛姆对他的印象是“他显得有些腴腆。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声音很刺耳”,说起话来给毛姆不真实的感觉。这是个不好的第一印象。宋春舫未读完圣约翰大学,即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深造,后在巴黎居留期间,对戏剧发生兴趣,回国后教戏剧,并以法文撰写一部中国戏剧论。他见毛姆时才30岁不到,而毛姆已46岁,是功成名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对戏剧和小说创作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他与宋春舫对于戏剧和中国戏剧发展之路的选择和趣味有迥然不同的认知,却一味地将自己的理解和理念强加给对方。他说,宋春舫“在外国的学习留给他的是一种对(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E.

Scribe)的极大的热情,他认为斯克里布可以作为中国戏剧革新的榜样”。其实,正如宋春舫的儿子宋淇在毛姆去世翌年,对毛姆这篇文章作注时说的,宋春舫对斯克里布“并无偏爱”,他在1921年写《中国新剧剧本之商榷》时,才正式主张把他的剧本移植到中国来,因为他认为西欧名家剧本中,斯克里布的著作“最切合我国人之心理者”(宋春舫,2011:120)。毛姆并不了解这个背景,所以他说“听他说到戏剧应该激动人心时,你不免感到奇怪”,他认为宋春舫实际上是“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毛姆,2013:135)。

毛姆认为“中国戏剧有极精巧的象征方法,一直是我们的梦寐以求的,因为它是具有思想性的戏剧,可是现在看起来却因为它太单调呆板而走向衰灭之路。”毛姆看好的中国戏是京戏,而他这里说的象征和思想性是欧美舞台剧所缺少,因而是孜孜以求的方向,而宋春舫虽然听过京戏,还写文章肯定京戏艺术,但与毛姆不同,他并不认为京戏就足以代表中国戏剧,因为他“同他那一代的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总希望文学能对时代发生一点作用,对社会改良有所贡献”(宋春舫,2011:121)。他们对京戏里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内容有保留。毛姆和宋春舫的戏剧观有很大差异,路径甚至相反。

在戏剧道路的选择上,毛姆看到与宋春舫谈不拢,便问他为了让学生了解当今的文学潮流,向他们推荐一些什么读物。毛姆说宋春舫“迟疑了片刻”,最后说真答不上来,“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研究戏剧,但是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请我的同事来拜访你,他教欧洲小说。”听到这个回答,毛姆不屑地说“那就不麻烦了”(毛姆,2013:136)。我们知道,宋春舫的名字几乎总是与中国现代戏剧联系在一起,他是中国西方戏剧收藏家、研究家和翻译家,也是话剧作家,但他也并不是不了解英法小说。实际上,在他所介绍的戏剧家中,像高尔斯华绥、王尔德、法朗士、邓南遮等也均为小说家,只不过他很可能是自认为对当代小说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名家毛姆面前不便发表意见。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毛姆误读了宋春舫,还反过来嘲笑他。

谈话中,宋春舫又问到法国剧作家白里欧(E. Brieux)的《梅毒患者》,并说这是斯克里布之后欧洲最佳剧本,因为这个题材涉及社会问题,学生感兴趣。毛姆不屑一顾,随后又把话头引向中国哲学和庄子。当宋春舫说庄子生活在很久以前,毛姆立刻反唇相讥,说亚里士多德也一样。其实,宋春舫虽然主要兴趣在欧美戏剧,但他从小饱读中国诗书,后来还让儿子上私塾,读《诗经》《庄子》《列子》等,但毛姆夸张地说听到庄子的名字,宋春舫“张口结舌”,最后又是很低调地承认他没有研究过那些哲学家,又说如果毛姆有兴趣,他可以请一位中国哲学教授来拜访他并给他回答。毛姆表示,无法跟这种不会聊天的学究聊下去。(毛姆,2013:136)今天回头看,宋春舫的“表现”实际上应该是他学者身份的体现,因为他那个年代讲究术业有专攻,不研究一门学问,就不发言。谈到哲学,宋春舫认为好友胡适才是专家。这在宋春舫是严谨,却

被毛姆不公平地嘲笑为“望洋兴叹”的河伯。

最后,毛姆和宋春舫谈论起戏剧。毛姆说宋春舫感兴趣的是戏剧技巧,却认为戏剧技巧很复杂、很深奥,所以,要向他这个戏剧名家讨教。毛姆回答说关于戏剧写作技巧,他只知道两点:一是符合常识,二是紧扣要点。按照毛姆的夸张描述,宋春舫听了,带着一丝沮丧的语气问毛姆,写剧本在这两点之外,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吗?毛姆的回应是要有某种技巧,但并不比打台球要得多。宋春舫争辩说,既然写剧本这么容易,那为何剧作家写一个剧本要花那么长时间。毛姆嘲笑地说那些剧作家是写不出来,很多剧作家,比如西班牙剧作家洛卜·德·维加或莎士比亚都轻松自如地写下大量的剧本。毛姆对有些现代剧作家极尽讽刺,说他们“压根就是文盲”(毛姆,2013:137-138)。宋春舫反问,总不好说易卜生是文盲吧,那他一个剧本为何要写两年。针对宋春舫的反问,他立即把易卜生痛批一顿,说他构思情节时遇到巨大的困难,苦思冥想到最后,终于绝望,只好回到以前多次使用过的情节。对此宋春舫表示不解,当然也无法接受。

毛姆注意到宋春舫的这一反应,便以不屑的口吻对易卜生的情节做了概括:“一群人待在一间封闭、令人窒息的房间里,随后有一个人(从山上或海上)来了,他猛地把窗户打开,每个人都清醒过来,于是戏结束了。”在毛姆眼里,宋春舫听完,“严肃的脸上一时露出淡淡的微笑,但他皱起眉头,望着空中呆了两分钟”,随后站起来说要走了,回头要重读易卜生的作品。在宋春舫走之前,毛姆还不忘问他对戏剧的未来有怎样的看法。毛姆猜想他会说“哦,见鬼!”,更可能说“啊,天哪!”结果,宋春舫“叹了口气,摇摇头,又举起他那优美的双手:一副万分沮丧的模样”(毛姆,2013:138)。看到宋春舫对中国戏剧现状感到绝望,正如看到英国戏剧现状时感到绝望一样,毛姆感觉“这确实是一个安慰”。

### 3. 毛姆的旧史观

细读《戏剧学者》这篇短文,不难发现,毛姆与宋春舫的会谈从方式到语气再到观点,全部都是居高临下的。在这里,他是个要训人的人,宋春舫则是被训的对象,而他访问辜鸿铭的时候,角色正好相反。在辜鸿铭面前,毛姆毕恭毕敬,低三下四,是“卑”,而面对宋春舫,毛姆冷嘲热讽,傲慢无礼,是“亢”。这一卑一亢的背后,包含着许多至今仍值得我们细加考量的元素,特别是毛姆与辜鸿铭和宋春舫的谈话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观。

宋淇在分析他父亲与毛姆对戏剧和易卜生的戏剧所持不同观点的时候,说他父亲是从一个戏剧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的,而毛姆表达的是一个同行剧作家的见解;他还说,毛姆是“一个惯以白眼看人生的人,出言未免接近于冷嘲,而这恐怕不是像我父亲那种一本正经的理想主义者所能当场领略和接受的”(宋春舫,2011:130)。这一分

析很有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毛姆认同辜鸿铭而讽刺宋春舫,背后更大的一个的原因是毛姆所持有的历史观。

所谓历史观,也即社会历史观,概括地说,是指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或总的看法。毛姆拜访辜鸿铭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刚刚爆发,这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和领导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李大钊在《史观》一文里,曾对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历史观本身也有其历史,而这一历史也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他进一步总结说:“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李大钊,2013:102)他将前者称为旧史观,而将后者称为新史观。

李大钊这篇写于1920年的文章,至今对我们看待历史,分析不同的历史观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和启发意义。就毛姆而言,从他对辜鸿铭的推崇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看法。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对封建主义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而辜鸿铭逆流而动,站起来反对这场文化运动。他的历史观是保守的,按照李大钊的观点,他所持有的是一种旧史观。毛姆推崇辜鸿铭,认为中国是神秘的,中国应保留自己原有的文化,而不是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和机械文明。可以说,毛姆与辜鸿铭的历史观是相似的。这样,当毛姆遇上辜鸿铭,他便立刻感觉找到了知音甚至是精神导师,他所能做的唯有崇拜和信服,即使受辱也不在意。

纵观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史,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欧美知识分子关注过中国,其中有的对中国文化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如黑格尔、杰克·伦敦等,有的则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赞赏有加,如歌德、梭罗等。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情况更为特殊。她在中国前后生活了近40年,了解中国的民风习俗,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偏爱,甚至发展到迷恋的程度,因而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现代诉求颇感困惑,致使她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变革趋势而选择传统,摒弃现代。与赛珍珠等作家相似的是,毛姆也没有考虑到世界历史滚滚向前的潮流,忽略了中国对现代化的迫切追求,遂有了他面对宋春舫时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毛姆不明白,像宋春舫及其朋友胡适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希望把他们留学的心得,不管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都应用到社会上去,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毛姆同样不知道,他对易卜生的否定性评价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接受的。殊不知,在西方所有的剧作家里,没有谁像易卜生那样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那么流行。《新青年》曾在1918年6月出过“易卜生主义”专号,宣传他的观点,胡适还带头翻译并撰稿;毛姆挖苦的宋春舫也对易卜生



推崇备至,并下过苦功。可以说,易卜生吸引宋春舫和胡适等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是他对社会专制的批判和他对个人自由独立的主张。这是毛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缺乏了解的地方,也是他的旧史观的一次突出的体现。

#### 4. 结语

2015年4月,宋以朗出版一本围绕他父亲宋淇的传记——《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其中作者也提到当年毛姆与宋春舫谈戏剧这件“不得不提”的事,并说到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美国大学演讲时,曾多次引述他们的这次谈话来阐释东西文化交流,最后,宋以朗也和他父亲一样,认为毛姆称辜鸿铭为“哲学家”是他个人的偏见,说明他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有限”(宋以朗,2015:35)。宋家两代对毛姆的评判是客观的。对辜鸿铭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所持的保守观点,毛姆全盘接受;对宋春舫的戏剧观和现代性诉求,毛姆则极尽挖苦之能事,甚至冷漠地完全忽略。其实,对于理解异文化之难,毛姆是有清醒认识的。毛姆交游广、作品多,但他从未用力描写过原住民的生活,因为他“不相信欧洲人如何能了解到他们的内在,到头来无非是一些肤浅的印象加上许多常规的偏见罢了”(黑斯廷斯,2015:295)。遗憾的是,毛姆在他与辜鸿铭和宋春舫的谈话中,终究未能克服他的“肤浅的印象”和“常规的偏见”,其根本原因恐怕是他未能摆脱掉自己的旧史观的羁绊。

#### 注释:

- ①毛姆后来请他的一位汉学家朋友将两首诗译了出来,发现原来它们是写给一位女子的,让他“感觉多少有些吃惊”。更有人考证出,它们可能还是写给一位风尘女子的。
- ②参见胡适和罗家伦合译的《娜拉》,以及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号。

####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散文[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 [2] 毛姆. 人生的枷锁[M]. 张柏然,张增健,倪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3] 毛姆. 在中国的屏风上[M]. 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4] 赛琳娜·黑斯廷斯. 毛姆传[M]. 赵文伟,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 [5] 宋春舫. 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
- [6] 宋以朗.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朱晓云

# 国际象棋与纳博科夫的小说叙事

宋德发 袁娜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纳博科夫是 20 世纪杰出的小说文体家,同时一生热爱国际象棋。国际象棋不仅作为其小说的描写对象,参与到主题的建构中,同时影响了他小说的叙事。从最初的棋局式模仿,到将棋局的非线性策略运用到小说叙事中,再到在小说中制造棋局般的“多重可能世界”,纳博科夫小说叙事将读者纳入到如同做局者与破局者的文本解读“游戏”中。如果说,纳博科夫早期的小说创作,尚在形式层面与棋局有着明显的模仿关系,其后期的小说叙事则更多地在深层次的、思考的层面上呈现出与棋局的内在关联性。

**关键词:**国际象棋;纳博科夫;叙事

## Chess and Nabokov's Novel Narrative

SONG Defa YUAN Na

**Abstract:** As an outstanding novelist and stylist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Nabokov has a passion for chess all his life. Chess not only serves as the object of Nabokov's novels, but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me. More importantly, chess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novel narrative throughout Nabokov's entire career as a wri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ss and his novel narrative is distinctive and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Nabokov's early works, the narrative shows the imitation of chess game. Then, the non-linear strategy of the chess game is applied to the narrative. In the third stage, chess-like “multiple possible world” is manufactured in Nabokov's novels, and readers are brought into the “game” of interpreting the texts with the author as the game-maker. If Nabokov's early novels have a clear formal imitation of chess, his later work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is formal imitation. Instead, the novel narrative shows an intrinsic relevance of the chess game in a deep and

---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 世纪中西文学中棋的叙事与意义建构研究”(CX2017B262)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宋德发,男,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袁娜,女,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棋文化研究。

thinking level.

**Key words:** chess; Nabokov; narrative

## 0. 引言

纳博科夫,以其深厚的叙事功底、强大的文本建构能力以及对小说形式的创新,被看作是20世纪一位杰出的文体家,不少研究者也对此做过论述。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国际象棋在纳博科夫的小说叙事中所起到的作用。纳博科夫一生热爱国际象棋,尤其钟爱排局。他曾在自述中说:“在我最奔放最多产的岁月中,对雕塑的棋子或它们在我心中的副本的疯狂操纵,吞噬了我那么多的本可以用在激动人心的文字活动上的时间。”(纳博科夫,2013e:345)有研究者认为,他在国际象棋领域内作为排局作者的名声与他作为文学家的名声不相上下(Ravilious,1994:287)。他在《防守》等作品中所写国际象棋与排局,具有不可超越的独特性。国际象棋与纳博科夫的小说创作有着剪不断的内在关系,它不仅作为小说描写对象和故事内容出现,更重要的是构成或者影响了小说的叙事手法与结构。纵观纳博科夫的小说创作历程,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国际象棋类比,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棋局式模仿,到将棋局的非线性策略运用到小说叙事中,再到在小说中化用对弈棋的时间、空间的深层感悟。笔者曾在《排局与纳博科夫式叙事策略》中以《说吧,记忆》为例专门讨论了国际象棋排局对纳博科夫式叙事的影响(袁娜、宋德发,2017:133)。本文则从棋局式模仿、非线性叙事、量子叙事三个方面,全面讨论国际象棋与纳博科夫的小说叙事的关系,以期对纳博科夫小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 1. 棋局式模仿

纳博科夫曾写道:“精致的情节展开模式,叫读者欲罢不能。”(纳博科夫,2013b:16)可以说,对纳博科夫而言,“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纳博科夫,1991:2)因此,他的小说,往往情节曲折,出乎读者意料,而读者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又更能体会到他的苦心经营,从而获得特别的审美感受。犹如棋局,国际象棋是竞技性游戏,对弈双方的终极目标就是将杀对方的王,而在对弈的过程中,弈棋者需要使出各种计谋,布局、防守、攻杀,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棋盘上出色的布局、出人意料的妙着,往往会留名青史。也正因为如此,纳博科夫本人曾这样说道:“今天重读这部小说,重温其故事情节,我颇有点安德森<sup>①</sup>回顾他那盘得意棋局的感觉。”(纳博科夫,2013b:II)

在纳博科夫早期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出人意料的“妙着”就已经多有体现。如在1926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中,小说读至结尾,在加宁记忆中的既模糊又清晰的玛丽,竟然没有出现在这部以她名字命名的小说中。这种出人意料的

结局,已经体现了纳博科夫非凡的文学才华。而在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中,国际象棋元素最为明显的则是小说《防守》。这部小说是纳博科夫于1929年春天开始创作的,1930年在柏林由俄国流亡者主办的出版社出版。小说最初是用俄文写作的,书名为*Zashchita Luzhina*(意为“卢仁防守”)<sup>②</sup>,30多年后译成英文出版。

在这部国际象棋元素非常丰富的小说里,主人公形象以及与国际象棋有关的各种明喻、暗喻、类比之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最引人入胜的,当属小说的基本结构,因为其中“也能找到象棋效应的连锁反应”(纳博科夫,2013b:Ⅲ)。小说前四章,描写孩童时期卢仁的生活以及他与国际象棋结下的缘分。然而,在第四章的尾声,毫无征兆地,卢仁猛然跨越了16年的时光,由十几岁的少年变成了邈邈的中年人,坐在德国一处旅游胜地的花园小桌边指着一扇窗户说话。从“然而他还是接过了小桌那边递过来的草帽”(纳博科夫,2013b:48),可以判断他是在与人说话,而不是自言自语;从卢仁不停摆弄的、放在小桌上的半圆形黑丝面料手提包来判断,与他说话的人是个女人。然而,这个女人在这一章及接下来一章中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出声。紧接着,小说第五章集中描写卢仁的父亲,从已故的老卢仁的回忆中,读者也窥到了卢仁成长为一名国际象棋大师的历程。直到第六章伊始,卢仁仍在花园小桌旁,摆弄着那只手提包。而这时,坐在他对面的那位一直没露面也没出声的女人终于开始显露面目,从此成为“小说布局的要紧部分”。因为是她,成了卢仁的妻子,在此后的故事中,一直陪伴着卢仁,卢仁的生活再也与她分不开。正如纳博科夫所说:

于是在第四章快结束时,我在棋盘的一角走出了意想不到的的一步,十六年的岁月用一段文字一笔带过,卢仁突然长成一个邈邈的中年人……这三个中心章节的整体部署使人想起——或者说应当使人想起——某种象棋难题,其要点不仅仅是通过这么多步将死对方,还要有一个被称为“逆向分析”的过程,其要求是根据当前态势图进行复盘研究,证明黑方刚走的这一步不可能是王车易位,或者肯定是吃了白方的过路兵。  
(纳博科夫,2013b:Ⅲ-IV)

纳博科夫在这里所提到的需要“逆向分析”的棋题,是国际象棋排局的一种。一般的排局是从现有局面开始,要求在规定步数内将死对方。但这种逆向排局则是分析棋局已经发生的走法,即从现有的局面着手,回溯分析棋子是经历了怎样的走法才形成了目前的局面。这种排局的理念是“要知晓过去,人首先要知晓未来”,而每一个制作优良的逆向排局,在未找到最终解法之前,解局者会觉得这排局是不可解的,或者觉得杂乱无章看起来没有一种解法是不可能的,然而最终,解局者会发现,在过去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才能够解释目前的态势图(Graefrath,2008:2)。正如在小说中,在棋盘上意想不到的一步出现之前,卢仁是一个生活在富足的家庭中的内向、孤独男孩,而第四章快结束时的他,变成了一个中年人,笨拙、邈邈、不合时

宜。这些年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 16 年后回到他当初来过的地方？和他说话的究竟是什么人？犹如棋局的复盘推演，小说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这段故事的回溯。

其实早在纳博科夫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中，就有这样的模仿逆向排局的情节。加宁在知道同住一栋公寓的阿尔费奥洛夫的妻子玛丽过几天要来德国，并看到了玛丽的照片后，和女友柳德米拉分手。小说第七章，加宁收到一封信，他把信撕碎扔进风中，而飘落在窗台上的一张碎纸片上，剩余几行字：

ourse, I can forg  
ove. I only pra  
hat you be hap (纳博科夫, 2013c:54)

我们可以推断这些残缺的字，将它补全，于是可得到以下几句：

Course, I can forget  
Love. I only pray  
That you be happy<sup>③</sup>

但至此，作者并没有透露来信的人是谁，只有加宁自己知道。直到小说第十章，从克拉拉的口中，读者才知道了或者说确认了加宁撕碎的那封信是柳德米拉写的。此外，玛丽是什么人？她与加宁的过去到底有什么故事能让加宁如此反常？这也是小说作者在写完加宁决然与柳德米拉分手后几章之后才陆续揭晓的。如果说在《玛丽》中，纳博科夫尚未明显地、有意识地说明对小说情节的安排类似于棋局的布局，在《防守》一书中，其小说结构对国际象棋棋局的借鉴，则更多的是有意为之了。

## 2. 非线性叙事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一书中，曾以国际象棋和围棋为例，在游戏理论的背景之下来比较战争机器和国家装置。在他们的体系中，线性的逻辑或行为被描述为“树形的”，而非线性的则是“根茎的”，更像是风滚草或是真菌。他们在这个比喻中，将国际象棋视为线性、树形和国家装置的同盟。事实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是在与围棋的对比下，刻意强调了国际象棋是线性的。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具体的博弈中，强有力的策略都会避免是太过线性的。太过线性的棋手，譬如初学国际象棋的人，往往在刚开始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后拿出来试图直接攻击对方的王，除非对手也是初学者，否则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败招。（Martin, 2008:90-91）

而高明的棋手，往往会避免线性的思维，而将自己的意图竭力隐藏起来，以避免

让对方察觉攻击的意图而有所防备。对小说来说,古典小说多强调线性的因果逻辑关系,叙述有头有尾的故事,现代小说叙事则多追求非线性,“分解叙事的连续性”,“以意识流和其他创新叙事形式来打破传统的句法结构和叙事语言的连贯性”(艾布拉姆斯、哈珀姆,2014:226),避免让读者过早地预料到后面的故事情节走向而减弱阅读意愿。就像纳博科夫的小说,总是给人一种庞大的叙事迷宫的感觉。读小说犹如“破案”,而“所需的线索散见于全书各章,因此读者必须反复阅读,和叙述者一起观察、思考、分析,才能理出头绪,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并感受探秘的玄妙和破谜的惊喜。”(谷启楠,2013:218)形成这种感觉的原因,除了他像棋局一般出其不意的布局之外,更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纳博科夫“一般在创作时并非按顺序一章接一章地写下去,而是零零碎碎地写在卡片上……最后再把它们颠来倒去的整理安排成篇”(梅绍武,2013:366)。这种创作方法,其结果就是文本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非线性叙事结构。

纳博科夫在谈到棋题艺术时,对那种“任务”型的机械的苏联棋题感到厌恶,犹如对苏联式的一览无余的“主题小说”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象棋的主题,可以这样解释,是布局、后撤、牵制、摆脱牵制等这样的一些手段;但是只有在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棋题才是令人满意的……虽然在结构问题上,只要可能,我都力图遵循传统的规则,如节省力量、整体性、清除无用的部分等,我总是情愿为了极其出色的内容的急迫需要而牺牲形式上的纯洁,导致形式像一个装着狂怒的小恶魔的海绵包那样膨胀爆裂。”(纳博科夫,2013e:345)

在国际象棋棋局中,捉王的最终目标虽然非常明确,但过程却可能扑朔迷离。纳博科夫的小说,也往往在“后撤、牵制、摆脱牵制”中制造了许多谜题。就如《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这是纳博科夫第一次用英语写作的长篇小说(创作于1938—1939年),小说中的塞巴斯蒂安·奈特<sup>④</sup>是一位俄裔小说家,喜欢写“研究小说”,但不幸英年早逝。小说中的“我”是塞巴斯蒂安·奈特同父异母的弟弟,因为觉得别人为哥哥写的传记是歪曲不实的,因此研究哥哥的作品,走访有关的知情人,试图为哥哥重新写一部传记。很难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到底是塞巴斯蒂安·奈特还是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V。毕竟V对塞巴斯蒂安的了解少之又少,他所面对的塞巴斯蒂安·奈特,是幼年时家庭教师头脑里的印象,是其生前的秘书兼传记作者古德曼的刻画,是其曾经的恋人克莱尔·毕晓普的回忆,是他费尽心思找到但并不确定是不是塞巴斯蒂安曾经的情人的描述。因此,到最后,V说:

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上扮演他,还有他的熟人来来去去……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我扮演的角色: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我们两人的相像之处是洗不掉的。我就是塞巴斯蒂

安,或者说塞巴斯蒂安就是我,或许我们两人是我们都不认识的某个人。

(纳博科夫,2013d:216)

可见,小说中最终形成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形象,是经过多个人的加工而成,犹如一盘棋的最终局面是由不同的棋子组合而成,“每一个棋子都像是一个陈述的主体,被赋予了一种相对的权力;而这些相对的权力在一个表述的主体(即棋手或游戏的内在性的形式)身上结合起来”(德勒兹、加塔利,2010:505)。而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说:“别人给你讲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讲故事的人整理成型的部分、听故事的人再整理成型的部分、故事中已死去的人对前两种人所隐瞒的部分。”(纳博科夫,2013d:51)此外,在对这些故事的拼凑中,纳博科夫打乱了时空顺序的叙述使得读者更要有耐心跟着他不停地探索、停留、回溯,如同破解谜题。

纳博科夫的小说中,结构形式最为奇特的当属《微暗的火》。此书出版于1962年,全书以“前言”“诗篇”(一首四个篇章的长诗,名为《微暗的火》)、“评注”“索引”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前言”部分的作者是查尔斯·金波特,介绍了长诗作者谢德和《微暗的火》一诗的创作及出版历程。第二部分《微暗的火》是一首999行的英雄对偶句诗体的长诗,诗作者为约翰·弗兰西斯·谢德,他是美国阿巴拉契亚州<sup>⑤</sup>一所大学的教授,著名诗人。这首诗本应是1000行,谢德在尚未写完最后一行时,被人枪杀。评注则又是金波特所作。表面上,这是一部由查尔斯·金波特负责注释的诗人谢德所作的长诗。长诗只有50多页,不到全书容积的七分之一,不同的诗行,有不同的注释,长篇累牍的注释和诗行一起,构成了一个幻想又真实、离奇又合理的故事。纳博科夫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比喻、双关、镜像等,足以让评论家称这部作品为“一次疑难的棋局,一场地狱般的布局”(梅绍武,2013:366-367)。此外,书中谢德将诗写在卡片上,他写诗的过程,是“边了解边改造这个世界,接收,拆散,就在这储存的过程中重新把它的成分组织起来,以便在某一天产生一桩组合的奇迹,一次形象和音乐的融合,一行诗”(纳博科夫,2013f:18)。纳博科夫的写作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打乱叙述顺序、重新组合的非线性叙事,要求读者要运用想象力,跟随作者一起参与小说中错综复杂的游戏,以达到审美的快感。正如纳博科夫所言:

文学应该给拿来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中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于是,也只有在这时,它那稀有的香味才会让你真正有价值地品尝到,它那碎片也就会在你的头脑中重新组合起来,显露出一个统一体,而你对那种美也已经付出不少自己的精力。(纳博科夫,2013f:365)

不过,非线性叙事并不是单纯的打乱叙事的时空顺序来刻意造成阅读障碍。非线性叙事结构,其实是基于内在的逻辑性,并且经过严密计算和细致安排而形成的结

构。犹如棋局,对弈中的每一步,都是经过了反复计算后才下出的。有的着法粗看不合情理,或者意向不明,其实可能是迷惑对手的一种手段,是基于对棋局的整体把控有意做的安排。可以说,小说中的非线性叙事与棋局一样,作者(棋手)在宏观上掌控作品(棋局)的整体布局,并以曲折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其目的都在于将读者(观者)有效地带入,从而延长或者增加审美的快感。

### 3. 量子叙事

美国国际象棋世界冠军鲍比·费舍尔曾说:棋是人生;而热爱国际象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则说:人生如棋。<sup>⑥</sup>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把玩国际象棋的同时,也对国际象棋的本质与人生的本质达成了近乎一致的看法:国际象棋的变化,正如人生一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而每一局面,棋手的选择看起来很多,每种选择,导向不同的结果,但最终却只能被迫,或自愿选择一种走法,就像人生的选择一样。人生不能重来,弈棋落子不悔,因此,除已成事实存在的局面外,人们也特别会想象可能存在的局面。这种“可能存在”,以现在的科学理论来说,恰恰是一种量子理论的视角。

量子力学的诞生,颠覆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量子力学渗入到当今世界的各个角落,对文学研究也颇有影响。量子理论与叙事学理论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叙事学理论——量子叙事理论。量子叙事理论根据其理论根基侧重点不同,又分为几种既有重叠又各自有区别的量子叙事理论框架,这其中颇具影响力的是美国文学理论家瑞恩(Marie-Laure Ryan)的多重可能世界叙事(汤黎,2013:15)。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叙事的量子力学理论来源是平行宇宙的概念。在瑞恩看来,在物理学中,平行宇宙的存在被假定在宇宙学层面上以描述黑洞另一面的存在,同时,被假定在亚原子粒子的层面上来避免量子力学运用到宏观世界的悖论。而在叙事学中,多重可能世界的哲学内涵及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对比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认知模式,让读者可以组织信息然后将其解读为一个故事。(Ryan,2006:633)

“可能世界模型不再预设现实世界的特权地位,而是把现实世界视为众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虚构世界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表征,而是按照通达规则进行模拟的一个可能世界。”(张新军,2010:4)通俗来说,即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只是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世界,而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想象而成,它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有着通约规则的可能世界。以棋局来做类比,每一手棋,都会导向不同的局面。棋局中的每一个局面,则都是数不清的可能性局面中的一个局面。可能世界叙事理论为解读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诸多看似复杂和矛盾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美国文学研究家丹尼尔·奥尔布莱特(Daniel Albright)更是将叶芝、庞德及艾略特这些20世纪早期的诗人作品称之为“量子诗学”。而这类“‘量子作家’通过建构文本自身来建构文本的意义,期望以此强调读者对文本的参与”(汤黎,2013:12)。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棋局相通。一局棋的最终局



面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更多的可能性则蕴含在棋手的构想中。观棋者读棋谱,可以重新去构建棋的多种可能性,犹如读者对作品的阅读。

纳博科夫的作品,常常在文本建构上让人折服,其作品体现出量子叙事的特点,首先是作者苦心经营的文本结构,有的基于可能世界模型。以《微暗的火》为例,金波特是这本书的序言、评注及索引的作者,但诗章却是由谢德写成。在这部构造奇特的小说里,金波特既是作者,又是读者。金波特的世界,是遥远的北方国度赞巴拉,他身为君主却被迫逃亡到美国,隐姓埋名,在一所学校任赞巴拉语教师。谢德的世界,是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纽卫镇的生活,他是教授、是诗人,唯一的女儿在少年时自杀,在长诗即将完成之际,被前来追杀金波特的杀手枪击毙命。他们彼此的世界,相对来说都是一个完整而真实存在的世界。然而,现实世界是纳博科夫的世界,不止赞巴拉是虚构的,看起来真实的阿巴拉契亚同样是虚构的。更何况,金波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而那个对他而言真实无比的赞巴拉只是他的幻想世界。在小说评注部分的结尾处,金波特(纳博科夫)这样说道:“一个疯子企图杀害一个自己想象中的国王,另一个疯子幻想自己就是那位国王,另有一位著名老诗人碰巧东歪西倒地走进那条火线,在两个虚构的事物相撞下毁灭。”(纳博科夫,2013f:340)正是这样,小说文本的结构就是建立在作者现实世界之上的一重又一重的可能世界,“当读者翻开《微暗的火》时,这既是纳博科夫的作品,也是谢德的作品,更是一部包裹着金波特自私幻想的虚构作品”(黄艺聪,2016:120)。而至于读者要探究长诗的作者和评注到底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者赞巴拉在多大程度上是金波特的虚构还是真实存在,这就要求读者参与到文本之中,自行分析、组合,最终建构自己理解的故事。

而在《爱达》一书中,纳博科夫则创造了两个星球。本书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反地界”(Antiterra)的星球上,时间从1868年持续到1967年。“反地界”像是我们的星球却又不是,与它相对的则是“地界”(Terra)。主人公凡可算是一流棋手,热衷研究“地学”,而思想家、哲学家在探讨是否存在“一面映照我们这个扭曲的土地的扭曲的镜子”(纳博科夫,2013a:19)。纳博科夫用棋局的比喻来解释这两个相似又不相同的世界:

有些人坚持认为,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及“虚假的重叠”如此众多,如此深切地编织进了相继发生的事件之中,必会(带着迂腐的幻想)累及基本一致性的理论;也有些人反驳道,正是这相异之处确认了有关另一个世界的活生生的有机现实;完美的相似毋宁说是暗示了一种镜像的继而投机的现象;开局和终局相同的两盘棋,即便落子无悔、殊途同归,在其间的任何一个阶段却或许会在一个棋盘和两个大脑之中生发出无数种变化的枝杈。(纳博科夫,2013a:19)

“反地界”也罢,“地界”也罢,都是文本建构的两个可能世界。“反地界”犹如“地

界”的镜像,所以我们可以把《爱达》当作乌托邦田园诗、家族年记、个人回忆录及现实主义小说。“反地界”和“地界”毕竟又不是一个星球,所以我们亦可把《爱达》看作神话、童话、科幻故事,阿尔迪斯庄园及年少的凡和爱达,让人看到对天堂的期许。这样的两个可能世界,给读者的带入感更强。而在棋局中,对局是双方棋手的无声交流,棋中多少意,不语两心知。一局棋终,可能构成了一个现实的完成了的“世界”,而对局过程中,在棋手的构想中,又有着无数的可能的“世界”,构成了“无数种变化的枝权”。作品中建构的可能世界,与棋局中的可能世界,在量子理论的视角下存在着相通之处。

其次,纳博科夫的文本对读者的参与性有着强烈要求,而这恰好与他钟爱的排局中做局者与破局者的关系相同。纳博科夫希望读者能参与到文本之中,反复品读,并建构自己的故事。前文提到“量子作家”通过建构文本自身来建构文本的意义,期望以此强调读者对文本的参与,纳博科夫亦然。如博伊德所言:“四十年的写作经历令纳博科夫寻到了隐藏意义的新法,而不断地重读能够逐渐向我们提示其最有心也最雄辩的叙述者的话外之音。”(博伊德,2013:555)在《微暗的火》评注部分中,金波特说到自己与诗人下完一盘和棋后,讨论了宗教问题。在这部很少提到棋的小说中专门提到二人下的是“和棋”,是出于偶然吗?或许不是。国际象棋中,和棋是一方反复将军却无法将死对方的王,或者双方无子可动或无力可胜的局面。金波特与谢德的教会之间有些差别,而从对话的结果来看,他们彼此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对方,因此,和棋在这里暗示了双方谈话的结果。并且,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本小说中两个角色的可能世界彼此亦无法征服,留给读者自己组建文本的意义。也因此,纳博科夫用棋局的比喻来说明文本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棋题里的比赛并不真正在于白方和黑方之间,而是在编制者和假想的解题者之间(正如在第一流的小说作品中,真正的冲突不是在人物之间,而是在作者与世人之间)。因此,棋题价值大部分在于“尝试”的次数——具有欺骗性的开步,错误的迹象,似是而非的着棋步骤,全都是狡猾地、煞费苦心准备好了的,以便把未来的解题者引入歧途。(纳博科夫,2013e:346)

于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如同做局者与破局者,他们一起参与到文本的“游戏”之中。作者(做局者)对读者(破局者)进行“捉弄、迷惑、欺骗、误导”,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称之为“纳博科夫的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袁娜、宋德发,2017:135)当然,读者一旦破解文本,就犹如破局者终于解开谜题,其游戏的快乐,也会更加强烈。

此外,“量子叙事是发生性(generative)……其叙事中的每个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突破点,并且突破点也并不是由叙事所推测,而是由其使之成为可能。”(汤黎,

2013:16)棋局同样是“发生性”的,每一步骤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突破点。而纳博科夫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发生性的,因其经常不存在连续的、清晰的、由单一时空叙事所建构的确定的意义,而是建立在可能世界的模型上并要求读者自行组织信息从而将其解读为一个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纳博科夫对国际象棋的感悟与其小说意义的生成在量子叙事理论的视角下达到一种相通之处。

量子力学理论与叙事学理论的结合在一部分研究者看来并非完美,然而,正如瑞恩所言,对文学研究者来说,他们并不真的关心多重世界宇宙学是否是量子力学的最佳解释,但这种理论带来了一个有效的方式:它能让“如果”(what if)这种思考模式更为戏剧性,让我们对分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引发了命运的严重后果而惊诧不已(Ryan,2006:668)。如果谢德在那个致命的夜晚没有跟金波特在一起,他就不至于被杀;如果凡不曾在那年夏日去往阿尔迪斯庄园,就没有他与爱达将近一个世纪的爱情纠葛。正如棋局中,一招不慎可致满盘皆输,而棋手如基耶塞里茨基则要在余生反复追问,如果安德森没有走出那不朽的得意一招,棋局会是一番什么模样。对纳博科夫这位致力于突破传统小说叙事形式的作家来说,从对国际象棋的感悟到在作品中建构可能世界,再到对读者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强烈要求,量子叙事理论正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他的小说的一条新的途径。

#### 4. 结语

纳博科夫对小说叙事的驾驭,与他对国际象棋的感悟有关。与真正的竞技性棋赛比起来,纳博科夫钟爱的排局是“不合实际”(unrealistic)的、“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的(Rachels,2008:219)。小说也是如此,意想不到的布局、打破时空顺序的非线性叙事结构能够让读者在文本的层面上多次流连,从而细细发掘文本的意义。如果说,纳博科夫早期的小说创作,尚在形式层面与棋局有着明显的模仿关系,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其后期的小说叙事则不再限于在形式层面上对棋局的模仿,而是在深层次的、思考的层面上呈现出与棋局的内在关联性。

#### 注释:

- ①原注:Karl Ernst Adolf Anderssen(1818—1879),德国著名国际象棋棋手,号称无冕之王。1851年在伦敦执白对莱昂内尔·基耶塞里茨基,中局连弃双车取胜,后世将此局誉为“安德森的不朽之局”。基耶塞里茨基(Lionel Adalbert Bagration Felix Kieseritsky,1806—1853)为爱沙尼亚著名国际象棋棋手,1839年赴法国教授象棋并以下收费棋谋生。
- ②在国际象棋界,一般将由白方(先走方)选择着法而产生变化的开局称为“开局”,由黑方(后走方)选择着法而产生变化的开局称为“防御”(也即防守),开局的命名方法之一是以开创这个开局的棋手的名字来命名。小说中卢仁是国际象棋大师,他开创的这一开局方法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 ③因为,我可以忘记/爱情。我只是祈祷/愿你幸福——作者译。
- ④奈特,即 Knight,在国际象棋中指“马”。在书中,少年塞巴斯蒂安·奈特写的诗的下面该签名的

地方都画着一个国际象棋的黑色棋子“马”。

⑤小说中虚构的地名。

⑥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的原话为: Chess is life.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原话为: Life is a kind of chess.

#### 参考文献:

- [1] Graefrath, Bernd. To Know the Past One Must First Know the Future: Raymond Smullyan and the Mysteries of Retrograde Analysis[G]// Hale, Benjamin(ed.). *Philosophy Looks at Chess*. La Salle: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2] Martin, Bill. The Difficult Ways of God and Caïssa[G]// Hale, Benjamin (ed.). *Philosophy Looks at Chess*. La Salle: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3] Rachels, Stuart. The Reviled Art [G]// Hale, Benjamin (ed.). *Philosophy Looks at Chess*. La Salle: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4] Ravilious, C. P. The Aesthetics of Chess and the Chess Problem [J].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994, 34(3): 285-290.
- [5] Ryan, Marie-Laure. From Parallel Universes to Possible Worlds: Ontological Pluralism in Physics, Narratology, and Narrative [J]. *Poetics Today*, 2006, 27(4): 633-674.
- [6] 布赖恩·博伊德. 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跋)[M]. 韦清琦,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 [7]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M]. 申慧辉,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8]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爱达或爱欲:一部家族纪事 [M]. 韦清琦,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a.
- [9]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防守[M]. 逢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b.
- [10]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玛丽 [M]. 王家湘,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c.
- [1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M]. 谷启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d.
- [1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说吧,记忆 [M]. 王家湘,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e.
- [13]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微暗的火 [M]. 梅绍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f.
- [14] 谷启楠.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译后记)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15] 黄艺聪. 越界的叙事者——《微暗的火》中的可能世界模型 [J]. *国外文学*, 2016(2): 118-126.
- [16] 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 姜宇辉,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 [17] 梅绍武. 微暗的火(译者后记)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18] 梅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 文学术语词典(第10版)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9] 汤黎. 量子叙事:一种全新叙事模式[J]. *国外文学*, 2013(4): 11-18.
- [20] 袁娜,宋德发. 排局与纳博科夫式叙事策略——以《说吧,记忆》为例 [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5): 133-136.
- [21] 张新军. 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模型[J]. *国外文学*, 2010(1): 3-10.

责任编辑:郭建辉

# 文学文化角色的独特性

刘建华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文化研究有利于文学研究,也会造成一些不利于文学研究的倾向,比如信奉文化决定论、忽视文学独特性。本文试图联系当代美国小说的有关作品和研究谈谈文化决定论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不利影响,强调尊重文学及其文化角色独特性的必要性。

**关键词:**文学;文化;创造性;鲁宾逊;多克托罗

##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s Cultural Role

*LIU Jianhua*

**Abstract:** Cultural studies can benefit literary studies and also cause some unfavorable tendencies like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the neglect of literature's singularity to the detri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cultural determinism's detrimental influence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literary works and emphasize the necessity to respect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and its cultural role in relation to the concerned work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 and its studies.

**Key words:** literature; culture; creativity; Marilynne Robinson; E. L. Doctorow

### 0. 引言

最近读到英国学者赛克斯(Rachel Sykes)的一篇讨论当代美国小说的论文,颇受启发,对文学文化角色的独特性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里就联系这篇论文和有关美国小说谈谈这方面的想法,并对文中某些观点提一点不同意见。

### 1. 安静小说

这篇题为《探寻玛里琳·鲁宾逊的基列德小说中的安静》(*Reading for Quiet i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Novels*, 2017)的论文虽然研究的主要是当代美国著名作

---

作者简介:刘建华,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家鲁宾逊的三部以虚构的西部小镇基列德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基列德》(*Gilead*, 2004)、《家》(*Home*, 2008)和《莱拉》(*Lila*, 2014),但视野较为开阔,其中不仅涉及了当代美国小说和研究的新近发展,还围绕安静和喧闹这两个概念梳理了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西方文化,试图在与西方文化两千多年发展变化的广泛联系中探讨鲁宾逊的基列德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论文中,赛克斯首先强调,鲁宾逊的基列德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安静,主要表现为:人物安静,都少言寡语,声调较低;地点安静,都以基列德这个人口少、较偏僻的西部小镇为故事发生地;故事安静,主要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没有多少行动和事件。赛克斯对三部小说作了比较,认为它们在安静程度上的顺序是《基列德》第一、《莱拉》第二、《家》第三。《基列德》之所以最安静,是由于它完全由76岁的临终牧师艾姆斯的独白所构成,是他写给儿子的一封长信。因此,《基列德》里的安静因素最多,除了安静的人物、地点和故事,还有一些与艾姆斯的职业、年龄、体质以及作品的书信体形式有关的安静因素。

赛克斯之所以要把鲁宾逊的小说当作安静小说来研究,是因为她发现这么做最能凸显它们在文学文化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文学方面,她认为这些安静小说反映了美国小说进入21世纪后的新走向,创立了一种新的叙事美学。她指出,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小说变得越来越宏大和喧闹,试图在更大规模上表现美国和世界文化,比如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德里娄(Don DeLillo)、品钦(Thomas Pynchon)、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等人的作品。所以,鲁宾逊的安静小说是对这一潮流的违逆,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她的《基列德》不仅获得了2004年度国家书评界奖、2005年度普利策奖和2005年度使节图书奖,还引发了安静小说创作热,其中的重要作品有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的《马奇》(*March*, 2004)、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的《奥利弗·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 2008)、哈丁(Paul Harding)的《修钟匠》(*Tinkers*, 2009)、约翰逊(Denis Johnson)的《火车梦》(*Train Dreams*, 2011)、科尔(Teju Cole)的《不设防城市》(*Open City*, 2011)、勒纳(Ben Lerner)的《离开阿托恰站》(*Leaving the Atocha Station*, 2011)、门罗(Alice Munro)的《宝贵的生活》(*Dear Life*, 2012)和阿拉梅丁(Rabih Alameddine)的《一个不必要的女人》(*An Unnecessary Woman*, 2014)。与此同时,批评界对安静小说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以普利策小说奖评审委员会为例,在2005年把奖授予《基列德》之后,他们在2006年、2008年和2010年评出的布鲁克斯的《马奇》、斯特劳特的《奥利弗·基特里奇》和哈丁的《修钟匠》等作品也都是安静小说。

至于鲁宾逊所创立的叙事美学,赛克斯把它称作安静美学,认为其要素包括安静的人物、安静的地点和安静的视角。这些要素是鲁宾逊的三部基列德小说所共有的,是它们可被看作安静小说的主要依据。这一美学的驱动力不是喧闹的行动、事件和情节,而是意识的内在机制和对现代主义喧闹主题的改写。赛克斯用“沉思原则”(Sykes, 2017: 108)来概括这一美学的驱动力,强调推动鲁宾逊安静小说中故事发展

的是安静人物的沉思。她认为,正是鲁宾逊的安静小说所体现的这些美学特点使得它们有别于当代的喧闹小说,代表了 21 世纪初美国小说的新走向。

赛克斯指出,鲁宾逊的安静小说不仅背离了喧闹小说,还批判了产生喧闹小说的喧闹文化,因而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在赛克斯对两千多年西方文化的回顾中,古代人和现代人对安静的态度截然相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安静被看作一种尊贵的生存状态。古希腊人用安静表示一种摆脱了思想感情波动以及外在影响的内在平静,认为它是健全人格的体现,是独立思考和艺术创造的必要条件。进入 20 世纪,喧闹文化开始流行,喧闹变成进步的标志,噪音和不和谐音被现代主义表现为美和真理。在此喧闹文化中,文艺发展出一套有关激进政治、文化和美学的语汇。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试图突破语言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合并安静与沉默,使安静变成一种迫不得已的被动状态,导致了讨论缺乏、抗议失败等结果。通过梳理两千多年西方文化对安静的态度由肯定到否定的演变、西方文化和受文化影响的文学由安静到喧闹的退化,赛克斯看到了鲁宾逊安静小说在重新发掘安静的价值、批判充斥着消费主义和进步主义目的论的喧闹文化、改造屈从于这一文化的喧闹小说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赛克斯紧密联系文化来研究文学的做法,认为当代喧闹文化产生喧闹小说、鲁宾逊反喧闹文化及小说的安静小说是对传统安静文化的回归等观点,对于理解当代小说和鲁宾逊是有参考价值的。但她的做法和观点也包含了较强的文化决定论倾向,令她忽略或误解了作品中一些较为重要但不合安静文化的写法,使得她所发现的某些文学文化关系显得较为牵强,甚至自相矛盾。下面就围绕安静与喧闹的关系谈谈她的理解与作品实际的出入。

## 2. 安静与喧闹

在赛克斯的理解中,古代安静文化与当代喧闹文化对立,回归古典文化的安静小说与当代喧闹小说对立。总之,安静与喧闹是对立的,因此她讨论安静小说就是只关注其中的安静,不关注其中的喧闹。但小说里不可能只有安静,人物也不可能全都安静或总是安静,那样就不可能有矛盾冲突和发展变化,就不可能有故事,尤其是在她所提到的使一切都处于分裂态的当代数码文化中。所以,她就不得不寻找安静的对立面,而且也找到了,那就是安静的消极面。

这个消极面被赛克斯概括为“不作为”(Sykes, 2017: 115),主要表现在《基列德》里最安静的人物艾姆斯身上。赛克斯指出,在写给儿子的信里,艾姆斯用回避和省略等手法撇除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亲眼目睹的社会、经济和种族等方面的不平等状况也很少有过不安。总之,艾姆斯在书里逐渐表明自己是一个“最为消极、最该受谴责的政治安静主义者”(Sykes, 2017: 116);鲁宾逊也在这种描写中暗示了安静作为一种参与方式所具有的局限性。

然而,在鲁宾逊的实际描写中,艾姆斯并不完全是一个不作为的安静主义者。首先,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 240 多页、构成《基列德》全书的长信,向他传授自己的

经验和观念以帮助他顺利成长,就是一种作为。作为牧师,他的主要作为方式是布道,他在布道词的准备上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按他的说法,在担任基列德公理会牧师的45年里,他共写了67500多页布道词,若按300页一本来编书,能编成225本。

在艾姆斯的信里,我们确实常能见到他叫儿子及他人别作为的话,比如他说:“有时,我喜爱普通星期天的平静。那就像一场暖雨之后站在刚播下种子的园子旁一样。你能感觉到无声无形的生命。你需要做的只是小心别踩到它。”(Robinson, 2004: 20)在这段话里,我们能够看到他对普通事物和平静生活的喜爱、对无声无形事物的敏感以及对生命的珍视。他叫人站在园子旁感觉而不要进去作为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刚下过雨,种子已经得到所需的水分;二是因为刚播下的种子容易踩到。也就是说,艾姆斯并不反对作为,而是反对不当作为,认为应把行为调整恰当。他在信里就告诫儿子要调整好自己的脾气和言辞:“火气太大,发得太频繁或不恰当,会造成你想象不到的破坏。首先,要注意你的言辞。‘微火能燃巨木;舌头即是火苗’——那是真理。”(Robinson, 2004: 6)

艾姆斯的问题是,他知道许多真理,平时也注意遵照执行,但有些时候却遵循不了,甚至会严重违背。这些时候,他就不能安静,会变得十分喧闹。这是《基列德》里的一大反讽,也是书里矛盾冲突和故事趣味的主要出处。这些时候大多与杰克这个人物有关。杰克是艾姆斯的老友、基列德长老会退休牧师老伯顿的儿子。离家20年后,他要从外地回来了。老伯顿对此“既期盼又忧虑”。“期盼”是因为这是杰克离家后第一次回来;“忧虑”是因为杰克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人”,离家前做过许多坏事,包括抛弃跟他怀了孕的姑娘。杰克也令艾姆斯忧虑,因为他是艾姆斯的教子。艾姆斯在信里向儿子介绍杰克是这样开头的:“我每周至少谈论一次圣父的爱与我们的应得之间的差距。而当我看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同差距时,我总是感到恼怒。”(Robinson, 2004: 73)这就是说,对于距他较远的问题,比如上帝的爱与人类的应得之间的差距,艾姆斯能安静接受,而对于距他较近的问题,比如父母的爱与孩子的应得或教父的爱与教子的应得之间的差距,他就不能安静接受了,就总是“恼怒”。

令艾姆斯恼怒的这种差距从杰克回来后的第一次拜访开始就日益扩大,令艾姆斯的恼怒也不断增强。杰克的完美举止和谈吐很快就赢得了艾姆斯的妻子莱拉和儿子罗比的好感,也很快就令艾姆斯产生了“最大的担心”,那就是在他走后,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将落入杰克的魔掌。想到这里,他内心又生出“以往的恶意”(Robinson, 2004: 141)。第一次拜访时,发现莱拉和罗比并不了解他,杰克就对艾姆斯表达过希望他不咎既往的意思。但艾姆斯却把这看作自己的“疏漏”(Robinson, 2004: 92),决定加以弥补。

艾姆斯家与老伯顿家聚会中对预定论的讨论是小说里非常精彩的一幕,也是艾姆斯弥补疏漏的一次重要尝试。是杰克提出的预定论问题,问艾姆斯是否认为人不会变、有些人注定要下地狱。在以问题“复杂”“神秘”为由推托一番之后,艾姆斯最终说出:“他们会变,如果遇到某种外来的因素——酒,或人的某种影响。也就是说,



他们的行为会变。至于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本质也会变或呈现其另外一面,就很难说了。”这里的意思就是:人的行为会变,但本质不会变;预定论是对的,有些人确实注定要下地狱。但艾姆斯没有直接这么说。他先用“复杂”“神秘”等词强调这一问题的难度,为他公开攻击杰克(既指责他酗酒,又诅咒他下地狱)制造烟幕;最后又用“难说”来掩盖他攻击的猛烈程度。难怪杰克听完他的话后只能客气地说他“滑头”(Robinson, 2004: 151)。

但一向安静的莱拉却接受不了丈夫对杰克的做法,“红着脸”提出了救赎的问题:“怎么看获得救赎呢?如果人不会变,那么救赎似乎就没有多少意义了。”(Robinson, 2004: 152)老伯顿称赞莱拉说得好,说她帮他解决了如何协调预定论与救赎的难题。不愿激化矛盾的杰克想离开,被莱拉拦住。在一阵“令人不自在的沉默”之后,莱拉说出“一切都会变”(Robinson, 2004: 153),给了杰克一个令他满意的答复,彻底纠正了艾姆斯的错误。

至此,我们看到了艾姆斯的变化,从宣扬上帝博爱到怀疑打击杰克,从安静到喧闹。艾姆斯对杰克的态度主要建立在两点无知和想象之上:一是不知杰克的本质是否变了,因而以为他还是以前的他;二是不知杰克为什么回来,因而见他接近莱拉和罗比就以为他要引诱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杰克,艾姆斯是不可能不恼怒和喧闹的。莱拉也有那两点无知,但她知道不应随意判断,尽管她嘴上不说。艾姆斯把“别判断”挂在嘴上,但在生活中却经常判断,尤其是对于杰克这样他所不喜欢的神秘者。直到最后,艾姆斯才从准备再次离开基列德的杰克那里得知其真实故事,看到了自己的无知与错误,才又安静下来。

总之,即使是最安静的《基列德》里也有很多喧闹。而赛克斯只是找了安静的缺点,却忽视了这些在作品里具有重要意义的喧闹。她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安静小说的地位,因为有缺点的安静仍属于安静,不会与安静小说产生矛盾,而谈安静小说里的喧闹则会损害安静小说的地位。但不这么做,只想维护安静小说,就会忽视和误解作品里的实际描写。赛克斯之所以陷入这一尴尬境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于看重文化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以为只有把鲁宾逊的小说看作反喧闹文化的安静小说才能彰显其特殊价值。

其实,安静与喧闹的这种依存关系不仅存在于被赛克斯肯定的安静小说里,也存在于被她否定的喧闹小说里。她之所以否定喧闹小说,是因为它们生于并代表当代喧闹文化,里面没有安静只有喧闹,表现为以“不断膨胀的雄心”和“巨穴般‘新碎片小说’”(Sykes, 2017: 109)形式在更大规模上再现美国经验、构建宏大叙述。下面就以多克托罗(E. L. Doctorow)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2000)为例,谈谈所谓的喧闹小说里的实际情况。选《上帝之城》主要有三个理由:①非常符合上述喧闹小说标准,有多克托罗“最为雄心勃勃”(Bawer, 2000: 391)的作品之称,而且全书都是碎片;②较有代表性,被看作“过去五十年里最伟大的美国小说”(Williamson, 2000);③也以牧师为主人公,跟《基列德》有不少可比性。

与艾姆斯一样,《上帝之城》里的主人公潘姆也是基督教圣职人员,是纽约市一座圣公会教堂的牧师,也爱从宗教角度观察和思考。但与艾姆斯不同,潘姆的活动多、言论多,因而比艾姆斯喧闹得多。《上帝之城》里的主要故事发生地是纽约,也远比基列德喧闹。两书最明显的不同是在叙述方面。《基列德》是以艾姆斯给儿子写信的方式叙述的。艾姆斯写信的目的单纯,写信的对象单一,因此《基列德》的内容集中,形式也不太复杂。而《上帝之城》的叙述者艾弗瑞特是一位兴趣广泛、志向远大的作家,正准备写一部新作品。《上帝之城》被写成他为这部新作所积累的材料。如同一本尚未整理成型的原始材料,《上帝之城》由 101 个相互之间似无明显联系的片段组成,而且这些片断不连贯地采用了日记、书信、访谈、侦探小说、回忆录、史诗、歌词、学术论文、电影剧本、会议发言等体裁,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宗教、科学、哲学、历史等众多领域。如同《圣经》那样含有世界起源与结局的宏大叙述,此书的第一个片段写的是 150 亿年前产生宇宙的大爆炸,最后一个片段有关一部表现人类在世界末日般 21 世纪里生活状态的电影。可见,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上帝之城》都要比《基列德》宏大、庞杂、喧闹得多。有评论就称它为“凌乱的后现代杂物堆”(Keeling, 2000: 56)。

然而,这一庞杂喧闹的“后现代杂物堆”里也有不少条理和安静。它的主要条理就是潘姆牧师寻找“可信上帝”的“神学侦探”(Doctorow, 2000: 18)活动。这一活动使潘姆有机会结识进化派犹太教教会的拉比夫妇乔舒亚和撒拉、小说家艾弗瑞特等主要人物,并通过他们与其他人物联系起来,结成了一张关系网,为理解作品奠定了可靠基础。潘姆的神学侦探活动充满了事件和喧闹,但也有许多沉思和安静。首先,他的神学侦探活动就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由一桩安静的盗窃引发的。在这桩盗窃中,他教堂里的一座高大沉重的金属十字架不翼而飞。一周后,它在乔舒亚和撒拉的教堂顶上被发现,但究竟是谁偷的、怎么偷的、为什么要偷、偷了以后为什么要放在犹太教堂顶上、怎么把这么大的东西搬上屋顶而没让人察觉等问题却始终没有答案。在连职业侦探也认为此贼“不属于这个世界”(Doctorow, 2000: 31)之后,潘姆就开始把这一安静的失窃看作一种叫他质疑旧上帝、寻找新上帝的预兆。

潘姆之所以要质疑旧上帝、寻找新上帝,也与安静有关,那就是基督教对于自己在人类尤其是犹太人于 20 世纪所受灾难中的责任所保持的安静。潘姆在布道中号召信众打破这种安静,结果受到主教的审查。被迫停职后,他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立陶宛的科夫诺犹太人隔离区,接替遇害的乔舒亚帮助曾在那里担任过小交通员的撒拉的父亲耶和书亚寻找记录纳粹罪行的日记。在最后找到的日记里,潘姆看到了纳粹统治者发布的许多禁止犹太人喧闹、强迫他们安静的命令,包括没收他们的所有家畜、马车、书籍、打字机、照相机、烛台、珠宝,禁止他们 19 点以后上街,禁止他们举行三人以上的聚会,等等。最后,纳粹统治者下令将他们统统处死,使他们彻底安静。

在科夫诺隔离区存在的三年里,不少犹太人用安静的方式进行了反抗。那些日

记都是隔离区政务会副会长巴巴内尔暗地里写下的,都是由耶和书亚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送交有关人士收藏的。也有用安静和喧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反抗的,比如领养过耶和书亚的老裁缝。纳粹军官穿上老裁缝精心制作的新衣服不但分文不给,还嘲讽犹太人期待报酬为“笑话”。老裁缝便以剪线头为由来到他跟前,一剪刀把新衣服的前胸从上往下剪到了底。“你自己去缝吧,盗贼!”老裁缝厉声喊道:“我们劳动的盗贼,我们性命的盗贼!”(Doctorow, 2000: 76)。结果,老裁缝被抓了起来,当着隔离区所有犹太人的面被施了绞刑。一段时间之后,耶和书亚才意识到,老裁缝当时之所以没有在剪衣服时捅死纳粹军官,可能是为了不让过激的行动殃及大家,因此对抗与节制、喧闹与安静作了精心的组合。

在寻找隔离区日记的过程中,潘姆跟撒拉有了更多接触,开始爱上她,觉得这位“天使般完美”女士的一个迷人之处就是她的安静,包括她的“虔诚”“端庄”和“谦逊的都市式优雅”(Doctorow, 2000: 97)。潘姆是一个很喧闹的人;他的主教是他30年前的耶鲁校友,说他从未完全摆脱60年代的“绝对主义”,一向“好斗”(Doctorow, 2000: 161)。所以潘姆这时爱上撒拉,能够反映其喧闹开始对安静开放。当然,潘姆爱撒拉绝非只因为她安静。他也极其喜欢她所组织的反思和改造宗教的活动。他们俩最后喜结良缘,也可以被看作喧闹与安静的完美结合。

《基列德》里的艾姆斯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不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存在的事物就不能说它存在。”(Robinson, 2004: 47)《上帝之城》里的爱因斯坦反复强调:“永远要有参照物”,“绝对运动和绝对静止是错误的”(Doctorow, 2000: 36)。以上介绍的两部作品里的具体描写可以说明,无论在安静小说还是喧闹小说里,安静与喧闹都是相互依存、难以分离的,尽管它们的比例在不同作品中不尽相同。因此,用安静小说和喧闹小说这两个概念来划分小说,尤其是那些比其他文化产品要复杂得多的优秀小说,应该非常谨慎,否则就会忽视作品里的许多描写,损害对作品及其文化角色的把握。下面就谈谈划分安静小说和喧闹小说对理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文化角色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 3. 文学与文化

赛克斯非常关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文化角色。比如她认为当代喧闹文化产生喧闹小说,因而鲁宾逊的安静小说就非常特别,对于克服当代文化和小说中的喧闹问题很有意义。再比如,她认为鲁宾逊的安静小说也与文化关系紧密,除了与当代喧闹文化的对立关系,还有与古代安静文化的继承关系。对于鲁宾逊在表现安静的优点之外又揭示其缺点这一做法,她也联系文化作了解释。她指出,在当今这个互联网全球化、一切都呈分裂态的数码文化时代,安静的沉思和纯粹的安静小说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鲁宾逊就不得不把安静的优缺点都呈现出来。总之,她为鲁宾逊找了排斥安静的当代文化、肯定安静的古代文化和使一切都处于分裂态的数码文化,试图表明,鲁宾逊写不写安静、为什么写安静和怎么写安静全都取决于文化。

赛克斯对鲁宾逊的文化研究确实具有知识性和启发性,但也难免会引发一些问题。这里要问的是:罗宾逊小说最主要的文化角色究竟是不是像赛克斯所理解的那样在于用安静文化批判喧闹文化?

上一节里简单介绍了“最安静”的艾姆斯身上的喧闹。其实,“最安静”的基列德里也不乏喧闹。更准确地说,《基列德》写的是基列德在种族关系方面由喧闹到安静的变化。小说里的现在时是20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过去时是19世纪中叶的废奴运动。这两个时间和相关事件构成了此书的时间及主题框架。基列德由喧闹到安静的变化就是发生在这一长达百年的有关种族关系的框架之内。艾姆斯家从祖父开始的三代牧师分别代表了这100年变化的三个阶段。祖父是废奴主义者,积极参加了内战前布朗(John Brown)<sup>①</sup>领导的武装废奴运动和内战。在他担任牧师期间,基列德热情欢迎黑人。父亲信奉和平主义,但他所倡导的和平曾被祖父批评为既“不扬善”又“不除恶”(Robinson, 2004: 85)的假和平。在他担任牧师期间,祖父离家出走,种族关系开始恶化,发生了黑人教堂被烧事件。艾姆斯担任牧师期间,黑人居民决定搬离基列德。临走时,黑人牧师来向艾姆斯告别,说他们对于离开感到“难过”,因为小镇对他们有过“很大意义”(Robinson, 2004: 36-37),而艾姆斯却只是安静地听着,没有任何不安,也没有想过小镇对他们有过什么意义、这一意义后来又怎么消失了。可以说,基列德这一从喧闹到安静的变化过程就是对黑人的态度由热情到冷漠的堕落过程。

《基列德》里,发生在现在的最大事件就是杰克的返回。他的返回也与基列德的历史、种族关系、当时发生的民权运动密切相关。不了解杰克而且又相信预定论的艾姆斯以为当年的那个失足青年在出走后的20年里本质上毫无变化,以为他返回后接近他和他的家庭是为了引诱和伤害他的妻子和儿子。直到杰克再次离开基列德之前,艾姆斯才了解到,杰克接近他的目的是想求他帮他及其黑人妻小在曾有光荣废奴传统的基列德安一个家。杰克是在种族隔离普遍、黑白通婚被视为重罪<sup>②</sup>的情况下与黑人姑娘迪莉娅相识相爱,私自结婚。在此过程中,他忍受了许多打击,品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坚定不移地爱着自己的家庭。杰克的真实故事让艾姆斯看到了自己在宗教虔诚、思想境界、对黑人和失足者等他者的了解和态度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意识到自己没有像平时说的那样保护而不是踩踏生命,开始认真反省自己对于基列德堕落的责任。

《基列德》的这些有关回顾喧闹的光荣传统、破除安静的封闭冷漠等的主要内容和文化意义,似乎是很难用崇尚安静文化和批判喧闹文化等说法来概括的。赛克斯也承认基列德的安静中的政治意味非常“复杂”,仅靠“草率的阅读”难以把握;提到基列德忘记其废奴历史,过去的那些“喧闹、行动和事件”已退变成今天的“低声细语”;谈了基列德的“最安静居民”如何“最脱离现实”。但她没有从这些方面来看待《基列德》的文化角色,不认为它们的文化意义大于她所理解的安静。她的论文的最后一句话是:“然而,最重要的是,基列德小说把安静看作一个有着严重伦理道德局限

的别致而又正当的研究对象,检视和探讨了它的不同形态。”这就是说,她还是认为基列德小说“最重要”的文化角色在于建立能够批判喧闹文化的安静文化,而至于这些有着“严重伦理道德局限”的安静的消极面与它的那些积极面会否发生严重冲突、有着这些严重局限的安静文化能否胜任批判喧闹文化的任务,她就没考虑了。

上面谈的是安静文化决定论给理解安静小说及其文化角色所造成的问题。再来看看所谓受喧闹文化决定的喧闹小说。写于20世纪末的《上帝之城》确实像赛克斯的喧闹小说定义所说的那样企图建立一种宏大叙述,在更大规模上表现美国人的经验。但它并非要肯定以消费主义和进步主义目的论为标志的喧闹文化。首先是书里几乎没写商业和消费。对于盲目乐观的进步主义,书里的主要人物也都不同程度地持怀疑态度。可以说,《上帝之城》写的主要是反思。除了潘姆对基督教传统的反思和撒拉对犹太教传统的反思,书里还写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传统的反思、爱因斯坦对科学传统的反思、米德拉什爵士乐四人组合对音乐传统的反思、艾弗瑞特对城市、电影和公园等领域中传统的反思、越战老兵对战争传统的反思,等等。所有这些反思所得出的结论基本相似,那就是传统不能固守,必须不断改造,以满足人们不断更新的需要。潘姆甚至认为传统的上帝也必须接受改造:“如果我们想改造我们自己,我们就必须改造您,主。”(Doctorow, 2000:268)如果上帝像撒拉所说的那样“总是杀人的许可证”(Doctorow, 2000: 255),那么像耶和书亚所见证的犹太人大屠杀那样的灾难就总会发生,奥古斯丁(Augustine)<sup>③</sup>在1600年前所描绘的充满爱与和平的上帝之城(Augustine, 1998: 1180)就总也实现不了。

《基列德》里的黑人和《上帝之城》里的犹太人都可被看作比喻,比喻不被现存文化认可和接受的他者。因而可以说,两书所关注和同情对象一样,都是世上不被认可和接受、遭受排斥和迫害的他者。两书揭露不平等、批判现存文化的方法也非常相似,用的都是宗教角度,以上帝的博爱为标准,以反思宗教堕落为出发点。两书的这些写法都有相当积极的文化意义,是很难用积极的安静小说和消极的喧闹小说这样的概念来区分的。这些文化意义集中反映了两书实际表现的思想感情倾向,是正确理解两书文化角色独特性的可靠依据。

文学离不开文化,但并不完全取决于文化。《文学的独特性》的作者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说:“文学也许是文化的产物,但绝非文化的一个部分。”(Attridge, 2004: 6)在他看来,文学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创造性上;文学与文化的差异也主要表现在创造性的强弱上。他指出:“对于从古至今的西方艺术实践和欣赏而言,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但这一事实的意味却很少得到应有的关注。”(Attridge, 2004: 13)他写《文学的独特性》就是要围绕创造性来深入探讨文学的独特性。而要研究文学的创造性,就要关注他者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回答好这样一个问题:“他者是如何通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努力而进入和改变一个文化领域的?”(Attridge, 2004: 19)所谓他者,指的就是“那种在某一特定时刻处于文化为思考、理解、想象、感觉、认知所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东西”(Attridge, 2004: 19)。遭

遇他者,就是察觉它的独特性,感到现有的模式无法充分解释它、自己的思考力和判断力走到了极限,觉得应该为理解他者及其独特性而改变现有的模式。而创造就包含在这种对于他者的积极反应中:“这种似乎由现有思维和判断模式的失效以及对他的突然察觉所引发的反应,就是一种创造。”(Attridge, 2004: 33)因此,说文学与文化在创造性上有差异,也就是说它们在对他者的开放程度、在对现有思维和判断模式的反思和改造上有差异。

按照阿特里奇对文学的上述理解,认识鲁宾逊小说的主要价值就不应看它们是否写了安静、创立了安静美学、批判了喧闹文化,而应看它们是否让安静向喧闹开放了,让基列德和艾姆斯向黑人和杰克开放了,从而写了这些他者所引发的反思和变化。

在《基列德》里,最大的他者要数杰克了。他在消失 20 年后刚一出现,就对艾姆斯的平静生活造成“严重破坏”(Robinson, 2004: 122)。艾姆斯知道“慈悲的上帝能宽容一切罪过”,也知道“判断……是许多错误和残酷的起源和本质”(Robinson, 2004: 155),但是他就是忘不了杰克以前的劣迹,无法不对他作判断。他把杰克判断成不会悔悟的“无耻之徒”(Robinson, 2004: 156),所以见到杰克赢得莱拉和罗比的好感,立即就想到他要伤害他们。布道中,面对着与莱拉和罗比坐在一起的杰克,艾姆斯有意偏离话题引用耶稣关于伤害孩子者将被绑上磨石沉海的说法<sup>④</sup>,对杰克进行谴责和警告,想叫他尽早离开。但杰克作了顽强机智的反击。对于《上帝与美国人》这篇批评美国宗教不合格的文章,艾姆斯不以为然,认为文章作者只是“写者”,不是懂得如何在责备人的同时爱护人的“先知”,而杰克却强调文中一个被艾姆斯忽视的观点——“美国人对待黑人的态度表明他们缺乏宗教虔诚”(Robinson, 2004: 147),以此推翻了艾姆斯认为文章作者不会爱的看法,也质疑了艾姆斯的爱的能力。杰克还提起艾姆斯所崇拜的巴特(Karl Barth)<sup>⑤</sup>,问艾姆斯是否赞同巴特对美国宗教的尖锐批评。艾姆斯试图“回避”,说巴特也批评过欧洲宗教。杰克又问艾姆斯是否想过“为什么美国基督教似乎总等别处的人作真正的思考”,间接地批评艾姆斯不作“真正的思考”,令艾姆斯觉得杰克“总像魔鬼一样聪明,像魔鬼一样严肃”(Robinson, 2004: 172)。艾姆斯对儿子说自己曾无数次走到“理解力的极限”,但杰克所造成的“眼下的困惑”却是“一片新天地”,使他怀疑自己以前是否真的困惑过。他开始承认自己“有限”(Robinson, 2004: 191),说杰克可能是“世上最难对话的人”(Robinson, 2004: 196)。

但艾姆斯也发现杰克跟莱拉说话没有那种“锋芒”,而是相当“放松”,就像“跟朋友说话”(Robinson, 2004: 201)。在他们的谈笑中,艾姆斯听到杰克说回到基列德有点像回到“犯罪现场”(Robinson, 2004: 199),开始同情杰克,思考起杰克的痛苦有多少是来自基列德这个“仍然能令他苦恼或羞愧”的地方,希望自己能帮他“抹去所有被夸大的或误加的或被广泛看作不可改变的内疚与悔恨”(Robinson, 2004: 201)。

这时,艾姆斯也发现自己的写作跑了题。他的原意是想向儿子展示“更好的自己”,而实际写下的却是“一个老人在竭力应对他想弄明白自己在竭力应对什么这一难题”(Robinson, 2004: 202)。艾姆斯质问自己为什么要对杰克如此烦恼,想到“爱也神圣,如同恩惠——对象的价值绝非真正重要的东西”(Robinson, 2004: 209),最终排除了杰克会夺走莱拉和罗比这一烦恼。可他完全没有想到,杰克已经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艾姆斯也完全没有想到,杰克的妻子竟然是黑人。他承认,看了杰克一家三口的合影后,他“确实吃了一惊”(Robinson, 2004: 217)。他问杰克是否担心这件事会“气死”他父亲。杰克就是因为担心才没有告诉他,并说自己虽然有许多跟人作对的经验,但这件事“完全属于另一层面”(Robinson, 2004: 219)。这件完全出格的事使杰克和迪莉娅在当时的文化中遭遇了无数磨难,包括找不到住所、忍受各种辱骂、被公司解雇。杰克回到没有反通婚法并具有光荣废奴传统的基列德,就是想为自己和妻小找一个安身之处。而艾姆斯一想到老伯顿会如何反应就不由得“诧异”,因为他和老伯顿从未谈到过这种事:“它就是没有出现过。”(Robinson, 2004: 221)看到杰克的“疲惫”和“孤独”,艾姆斯同情地夸他是“好人”。杰克坦率地说这世上“还有更坏的人”,并反问道:“这个镇子怎么样?如果我们回来并举行婚礼,我们能住在这里吗?人们会不骚扰我们吗?”艾姆斯“不知如何回答”。杰克又提起黑人教堂失火一事;艾姆斯说那是场“小火”而且是“多年前”的事。可杰克指出“多年来再也没有黑人教堂”;艾姆斯“无言以对”(Robinson, 2004: 231)。

在杰克的追问下看到自己和现有文化的局限之后,艾姆斯开始变了。他对杰克的看法变了,在人们所不喜欢的杰克身上发现了“美”(Robinson, 2004: 232)。他对基列德的看法也变了,对它的堕落开始了认真的反思,意识到镇民们已经忘了“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小镇?”这一问题,忘了小镇是在“紧急关头”建立起来、曾是“沙丘中的一个顽强的小前哨”、曾是“布朗和莱恩(Jim Lane)<sup>⑥</sup>可以退到这里疗伤和休整”的地方,忘了它的“微小和破旧”中蕴含着当年的“勇气和激情”,因而已经变成不辨善恶的“无法之人”(Robinson, 2004: 234)。送杰克再次离开基列德时,艾姆斯说自己“真能理解”杰克为什么不得不走,并为自己讲了“真话”而充满“感激”(Robinson, 2004: 240)。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一直缺乏勇气讲真话、做实事并对其英勇慷慨的祖父敬而远之的牧师终于认同了祖父及其所代表的光荣传统,教育儿子要勇敢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和“慷慨”(Robinson, 2004: 246)的人。

艾姆斯的这一因对他者开放而发生的变化令人联想到《上帝之城》里潘姆的变化。潘姆因作为神秘他者的十字架窃贼的闯入而陷入了精神危机,开始了神学侦探活动。在此过程中,他又接触到一些新的他者,使他对世界和宗教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些他者包括乔舒亚和撒拉这对进化派犹太教拉比夫妇、乔舒亚生前所读的肖莱姆(Gershom Scholem)<sup>⑦</sup>和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sup>⑧</sup>等反思宗教的犹太宗教哲学

家、犹太隔离区日记所再现的德国纳粹及其反抗者、参加撒拉的犹太教传统研讨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塞利格曼。塞利格曼的发言对潘姆的冲击很大。他在发言中指出,拒绝现代知识的“正统派崇拜”其实是“祖先崇拜”(Doctorow, 2000: 251),而古希伯来人的知识非常有限,不知道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50亿年,不知道宇宙包含多个由数百万星球构成的星系、星系群和有待认识的黑色物质,因此他们所用的“主”“圣父”和“牧羊人”等敬语已“不足以充分赞美”(Doctorow, 2000: 253)上帝了。塞利格曼使潘姆对宗教革新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光明前景又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我们生活中有一种宗教力量,它必须以我们时代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很隐秘,只能慢慢地、逐渐地去发现,最后依靠集体的力量去理解,就像科学规律一样。”(Doctorow, 2000: 254)

正是在向这些他者的开放中,潘姆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走出了危机,找到了可信的上帝和新的希望。在潘姆与撒拉的婚礼上,潘姆的主教对埃弗瑞特说,潘姆身上“充满令人吃惊的东西”(Doctorow, 2000: 262),他认识潘姆都30年了,还经常受他惊吓。主教常受潘姆惊吓的原因与艾姆斯常受杰克惊吓的原因相同,都是他们的长期封闭。与艾姆斯不同的是,主教始终也没有开放,因而始终都被潘姆惊吓。就在这个婚礼上,潘姆在发言中宣布,他将退出主教领导的教会,加入撒拉领导的教会,因为他过去信奉的那个上帝已被传统所封闭和异化,丧失了帮助人类制止灾难的作用,不再可信。其实,更换教会并非潘姆的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改造上帝来改造人类,使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人为灾难不再发生。而撒拉所领导的进化派犹太教教会思想开放、面向未来,完全符合他的这一目的。因此,他做出了这一决定,实现了他当神学侦探以来的最大转变,也给了主教以最大惊吓。听了潘姆的决定,主教面色“煞白”,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仿佛被绑在它上面”(Doctorow, 2000: 267)。显然,束缚主教的并非别人的绳子,而是他自己的僵化脑子。

#### 4. 结语

赛克斯紧密联系安静文化和喧闹文化,用安静小说和喧闹小说来划分小说,为当代美国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她把罗宾逊的基列德小说看作安静小说,试图在它们对当代喧闹文化的批判中强调它们的文学价值和文化角色,对于拓展罗宾逊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由于多从文化和概念而不是作品实际出发、使用安静小说和喧闹小说等概念过于严格,她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小说由于相对喧闹而被轻视、安静小说里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喧闹成分被忽略和误解、安静小说的文化角色与其实际情况不尽相符。本文强调尊重文学及其文化角色独特性的必要性,赞成将这种独特性主要看作勇于向他者开放和改变文化现状的创造性。通过对文本的具体分析,本文试图说明:①束缚和解放都可以有安静和喧闹两种形态;②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化角色独特性更多地表现在批判束缚创造性的封闭文化和建设解



放创造性的开放文化上,而不是用安静文化批判喧闹文化上。

注释:

- ①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1855开始在堪萨斯领导武装废奴运动,1859年被捕就义。他所领导的运动极大地激化了内战前的南北矛盾。
- ②从1691年弗吉尼亚州最先通过反通婚法开始,美国共有41个州有反通婚法。从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最先废除反通婚法至今,共有25个州先后废除反通婚法。基列德所在的衣阿华州1839年通过反通婚法,1851年废除。截至杰克返回基列德的1956年,仍有25个州有反通婚法,包括与衣阿华接壤的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塔三州。
- ③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413至425年间用拉丁文写成有“基督教的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之称、对西方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多克托罗的《上帝之城》的书名就是借自奥古斯丁,并做了一点变动,包括去掉定冠词,添加副标题“A Novel”。
- ④见《新约·马太福音》(*Matthew*)18:6和《新约·路加福音》(*Luke*)17:2。
- ⑤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瑞士神学家,被广泛视为20世纪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
- ⑥莱恩(Jim Lane, 1814—1866),美国废奴主义者,内战前在堪萨斯参与领导了武装废奴运动,内战中担任过北方军将军。
- ⑦肖莱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现代喀巴拉(犹太教神秘哲学)研究的创始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位犹太教神秘哲学教授。
- ⑧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 1916—2003)生于德国的加拿大犹太哲学家,改革派犹太教拉比,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Attridge, Derek.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2]Augustine, Saint.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M]. Dyson, R. W. (ed. &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Bawer, Bruce. The Faith of E. L. Doctorow[J]. *The Hudson Review*, 2000,53(3):391-402.
- [4]Doctorow, E. L. *City of God; A Nov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 [5]Keeling, Julian. You Want God? [J]. *New Statesman*, 2000(129):56.
- [6]Robinson, Marilynne. *Gilead*[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4.
- [7]Sykes, Rachel. Reading for Quiet i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Novels[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7(2):108-120.
- [8]Williamson, Eric Miles. A Great American Notebook[J]. *Houston Chronicle*, 2000.

责任编辑:陈宁

# 《卡彭塔利亚湾》远古“梦幻” 世界观的当代叙述

冷 慧 宫红英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历经五万年左右的澳洲原住民“梦幻”世界观,是当代澳洲原住民作家创作的底层代码。澳洲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凭借《卡彭塔利亚湾》摘得2007年澳洲最高文学奖。国内外对《卡彭塔利亚湾》的评述主要是以后殖民主义、女性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狂欢化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作家对原住民悲怆命运的叙述。本文以认知语篇学为依据,探讨作家本人“梦幻”世界观所蕴含的别样的时间观、土地观、历史观、教育观、神灵观在建构文本的叙述支撑力及阐释主题的意义反叛力,为评论原住民文学主体性提供一个新路径。

**关键词:**澳洲原住民;“梦幻”世界观;《卡彭塔利亚湾》

## Contemporary Narrative of Ancient Australian Aboriginal “Dreaming” Worldviews in *Carpentaria*

LENG Hui GONG Hongying

**Abstract:** The ancient Australian aboriginal “dreaming” worldviews of nearly 50,000 years underpin the writings of the aboriginal writers. Alexis Wright won the most prestigious Australian literature award in 2007 with *Carpentaria*. Comments on and criticisms of *Carpentaria*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focus on post-colonialism, female literature, magic realism, and carnivalism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ir analyses are about the writer’s narrative of Aboriginal people’s life and destiny. Based on cognitive discourse theo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unique Aboriginal concepts of time, land, songlines, walkabout and spirituality embedded in the “dreaming” worldviews substantiate the structure of *Carpentaria* and the rebellious theme of the work. Therefore, worldview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世界观认知模式下民族叙事的解读研究”(13YJA850007)和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澳洲原住民叙事的世界观认知模式研究”(L15BY012)的后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冷 慧,女,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认知语用学、文体学研究。

宫红英,女,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analyzing indigenous works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Australian aboriginals; “dreaming” worldviews; *Carpentaria*

## 1.《卡彭塔利亚湾》与国内外的评论综述

澳洲原住民女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凭借如史诗、如画卷般的《卡彭塔利亚湾》，于2007年摘得澳大利亚文坛桂冠，荣获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该书以位于澳洲东北部昆士兰省卡彭塔利亚湾上的一座虚构的港口小镇德斯珀伦斯为背景，以原住民为保护古老文明，保存祖先留下的土地不受国际矿业公司的毁灭性开发而进行的奋力抗争为主线，在叙述现代文明与原住民文明互相撞击的同时，为澳洲原住民的悲怆命运呐喊，展现了澳洲古老神话、神秘传说的纯美与真实性，以及原住民信奉的“梦幻”时代原始图腾的超脱，彰显了小说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该书获奖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书的评论纷至沓来。国内外评论者对该书的多重主题给予首肯，如关于原住民在后殖民时期经历的悲凉命运及凄凉现实（武竞，2014）、梦幻时代的政治宣言（Devlin-Glass，2007：392-407）、失去土地之殇痛及土地权索求（叶胜年、华燕、杨永春，2013）、彩虹蛇创世视角下的生态保护、原住民寻求精神和解、创造自己想象的完整世界（武竞，2014；Ashcroft，2009：205-241）、原住民主权的诠释及主体性建构（邢春丽，2014：17-32）、女性原住民抗争（向晓红、兰兴武，2014：85-98）、原住民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等内容。同时，对其出神入化的神秘主义表现手段（黄源深，2014），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徐显静，2010：90）赞不绝口，对口述文学特有的读者与作者对话互动风格（邢春丽，2014：17-32）、作品的狂欢化表现手段（Molloy，2012：1-8；詹春娟，2014：43-54）、反传统的人物塑造及迷人的叙述声音（Eagle、龚静，2015：266-281）等表现形式交口称赞。然而，也有评论者指出，虽然亚历克西斯·赖特使用澳大利亚标准英语进行写作，但整部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令人困惑不解（Syson，2007：85-86；Aitken，2008：21），其中蔓生的不平行、不规则的扩展（张炜，2011），庞杂的故事及混乱的人物关系（李尧，2014）使阅读和翻译具有很大难度。

瑞文斯科劳特（Ravenscroft）在梳理了澳大利亚白人学者对《卡彭塔利亚湾》的评论后，指出以魔幻现实主义为标签来界定关于原住民作品《卡彭塔利亚湾》是一种误读。首先，她斧正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使用语境，提出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于1925年最早使用的魔幻现实主义并非用于评论文学作品，而是评论绘画等艺术作品。因此，把后殖民主义时期文学作品中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的距离看作是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使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后殖民理论的辩论提喻，混淆了杂糅和阈限问题。其次，瑞文斯科劳特指出，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弱化了“他者”形象，其危险在于把原住民的真正现实想象为魔幻，从而忽视了他们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遭受种族歧视和失去土地的痛苦（Ravenscroft，2010：194-224）。

冷慧(2014)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视原住民“梦幻”世界观为联结澳洲几百个原住民部落为统一民族的特有认知模式。她认为,“梦幻”世界观是作者创作小说的底层代码,读者需要依照作者的“梦幻”世界观为理解依据,在貌似不连贯的语篇特征中找到相互的隐性关联性,达到解读文本思想内涵、感知文学效果、体验审美情感的目的(冷慧,2014:11-16)。

## 2. 认知语篇学视角下的《卡彭塔利亚湾》

### 2.1 认知语篇学

认知语篇学将语篇的生成纳入人类的一般认知模式,以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为视角,以语境为支点,从认知角度解释语篇的内部结构。认知语篇学认为语篇的组织方式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认知理据性,是语篇生成者认知活动的昭示(朱长河、朱永生,2011:35-39)。语篇结构的认知理据观秉承了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因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是一个由语言符号或语言表达所构成的开放集(Langacker,1987)。语言的象征性源于人类的心智表征能力,意象、意象图式把语言符号中的语义表征和音位表征结合起来(Palmer,1996),因此凡是具有可分析性的语言表达,皆为非任意性。语言符号的意义,即语音、词汇、语法的意义取决于概念化,取决于人类对世界的识解,表达的是人类心理经验各种结构及认知过程(文旭,2007:36)。认知语篇学将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拓展到语篇层面,在语篇层面否定了语言符号、篇章结构、语篇衔接策略的任意性(Dijk,2000),把词汇—语法连续体的认知建构提升到宏观语篇的组织层面。

语境在认知语篇学中意义重大。以语境为支点研究语篇是认知语篇学的研究方法之一(朱长河、朱永生,2011:35-39)。认知语篇学对语篇的分析,不仅仅依靠物理语境、上下文语境,更要依靠生成语篇的作者和理解语篇的读者/听者的认知语境。认知语篇学认为作者所建构的语篇意义、词句意义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王寅,2005:6-12),而是作者心智中对客观世界的范畴化、图式化、概念化的结果,是作者“心理经验的各种结构和认知过程,而不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值条件”(文旭,2007:36)。作者的心路历程、社会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世界观等心理经验,是作者建构语篇的心智框架,也为读者/听者在解读语篇时建造了助推概念形成的“认知域”(Langacker,1987)。

本文以认知语篇学为理论框架,凸显认知语境的语篇建构意义,视“梦幻”世界观为澳洲原住民的认知域,从人类的一般认知模式出发,为评价《卡彭塔利亚湾》提供一个新的认知视角。

### 2.2 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

欧洲殖民者在1788年到达澳洲大陆遇见原住民以后,一直试图解读原住民神秘、神圣、复杂、全能、无处不在的世界观。100多年以后,当时在北领地爱丽丝泉做邮寄—电报站站长的弗朗西斯·基伦(Francis Gillen)通过长期与原住民接触,学会了阿瑞恩

特(Arremte)部落(原拼写为 Arunta)的语言,成了人种学者。他把欧洲人对梦的概念化投射到具有非现实特点的阿瑞恩特部落宗教信仰体系 Ülchurringa (“Alcheringa” “Altyerrengge” 或“Altyerr”)上,于19世纪末第一个使用英文“dream times”并把 Ülchurringa 翻译为“梦幻时代”。在澳洲从事科学考察的英国植物学家、人类学家鲍德温·斯本瑟(Baldwin Spencer)记录了基伦的翻译,并在1896年出版的系列学术成果《洪恩科学考察》把“梦幻时代”介绍给学术界与世人。澳洲人类学家彼得·埃尔金(Peter Elkin)在1938年出版的《澳洲原住民:如何理解他们》一书中,交替使用“梦幻”(dreaming),与“梦幻时代”互为同义词;另一位著名的澳洲人类学家斯坦纳(Stanner, 1953)按照原住民英语的习惯,则仅仅称之为“梦幻”(dreaming, 或 the dreaming)。

在澳洲原住民的语言中,“梦幻”不是睡梦,也不是梦境,这种自始至终渗透到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与欧洲人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思维底层代码是原住民的世界观(Stanner, 1953)。斯坦纳指出,“梦幻”是指在时间尚未产生的远古时期,原住民神灵祖先创世造人的神圣而伟大的时代。但斯坦纳及时指出,在“梦幻”世界观里,不存在西方人所熟知的“时间”“历史”概念,因为在原住民的语言中,“时间”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历史”也是个陌生的概念。“梦幻”是原住民所理解的意义复合体,包括图腾、神灵出生地、传统习惯、生命法则等。对原住民来说,“梦幻”的精神层面的、主观的意义大于物质层面的、客观的意义。

认知科学所理解的世界观具有认知功能,是人类经验的高度抽象和背景知识的综合概括,等同于莱科夫(Lakoff)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式(ICM)(Lakoff, 1987)。“梦幻”世界观是澳洲原住民在其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源于他们的“梦幻”创世传说、神话等叙事。多种形式的澳洲原住民“梦幻”叙事的抽象成为他们的“梦幻”世界观(冷慧, 2014: 11-16)。“梦幻”世界观包含了规范原住民行为的准则、标识原住民身份的图腾、传承原住民智慧的教育、理解原住民思维的逻辑等等,是多体合一的综合体(Stanner, 1953)。

### 3. 远古“梦幻”世界观的当代叙述

《卡彭塔利亚湾》“成功创造了一种具有梦幻特色的土著话语体系”(詹春娟, 2014)。整部小说蕴涵着丰富的原住民梦幻故事、传说,在口头文学传统的跳跃组织结构和宏观格局中,一个超越现代人理性思维界限的精神世界和概念时空,即“梦幻”世界观被前景化,而欧洲人心智中的现代化时空在小说里被背景化、边缘化。语篇伊始,其古老的“梦幻”世界观充分彰显着卡彭塔利亚湾为彩虹蛇创造之物,“祖先之蛇,来自天空的星星,力大无比,胜过暴风雨……它优雅地前行着……那湿漉漉的身体,因沐浴过古老的阳光而熠熠生辉。那还是比人类学会思考时间概念要久远许多的年代。在无数亿年前,它从天而降,沉甸甸的肚子匍匐在卡彭塔利亚湾湿润的土地上”(Wright, 2006: 1; 本段翻译改自伊戈尔·龚静, 2015: 266-281)。同时也昭示着原住民在海湾被创造之初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古老海湾的男男女女,他们曾带走我们

没有说出的记忆,会从泥土中爬出来,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发生的真实的故事”(Wright,2006:11)。现代社会理性的读者难以把蟒蛇想象为人类和世间万物的创造者,难以把陆地蟒蛇的行踪与天边彩虹的绚丽叠加认同。然而如同许多欧洲人相信上帝造人一样,澳洲原住民部落坚信彩虹蛇是原住民的造物主,是庇护他们子孙、繁衍他们后代、看护他们家园的保护神。如同许多欧洲人遵守《旧约》和《新约》一样,原住民承传和践行着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彩虹蛇承诺(或约定)”(Wright,2006:11)。自己的历史、神话、叙事被淹没蹂躏与践踏,但源远流长在彩虹蛇创造的这片土地上,虽然土地被剥夺,但他们却凭借“彩虹蛇承诺”的精神支撑而抗争着。

### 3.1 池塘的时间观

西方的认知理念把时间要么比喻成一条绵延但有终点的长河,线性伸展;要么比喻成可利用但会枯竭的资源(Lakoff,1987)。然而在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中,神灵祖先的创世壮举时代虽然始于遥远的过去,但持续到现在,还将延续到未来(Stanner,1953),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梦幻时代”从来不是固定在编年史上的某一特定时段。詹卡和布伦(Janca & Bullen)解释了原住民对时间概念认知的特殊性。她们指出,在澳洲原住民的心智中,时间被认知为以水塘式存在,过去-现在-将来循环往复,非线性永恒。个人可以上下左右穿梭游动于水塘式的时间圈内。在原住民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依照与个人及家庭、族群的重要性,被赋予了不同时间圈的位置。重要性程度高的事件将位于水塘式时间圈的中心,而与个人及家庭、族群关系不紧密的时间,虽然发生在眼下,却被放置于时间池塘的边缘(Janca & Bullen,2004:40-44)。通过“梦幻时代”神灵祖先的媒介,原住民把现代所发生的事件与远古神灵祖先从未间断的创世事件整合为一体,以事件为视角描述时间(Malcolm,1999)。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因神灵祖先的超验性而具有现存性和永恒性,可以视为当下时间(Walker,2010)。

超大跨度、灵活跳跃的时间为《卡彭塔利亚湾》奠定了原住民小说特有的叙事风格,表现了作者解构西方叙事的诉求,也为读者营造了解读异域文学作品的思维基础。“梦幻时代”神灵祖先的功绩无处不在,不需要确定的时间维度加以框架,因此《卡彭塔利亚湾》的叙事时间弹性伸缩,不拘一格,例如,主人公诺姆的年龄即是扑朔迷离的:“老人们说,鳕鱼已经在这儿的大海和大河里游了几百年,诺姆可能也已经活了这么多年……”(Wright,2006:6)。小说中另外一位主要人物——踏浪而来的白人埃利亚斯·史密斯,与原住民诺姆结为故交挚友。他到达小镇的时间是虚实交错的,“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从前,在一个海上异常漆黑的夜晚,一位强壮的水手,他曾乘风破浪飘荡在许多海洋上……与比参天大树高的浪头竞赛奔跑着”(Wright,2006:43)。

诺姆年龄与埃利亚斯·史密斯的登陆时间使小说具有了原住民思维的时间非确定性,拓宽了小说的时间域。同时,在“梦幻”世界观中,日月并非如梭,光阴并非似箭。在原住民的精神世界里,代表理性世界中的时间可以凝固,现代的产物钟表可以

停摆,只有古老的“梦幻”传说及其力量才会永恒地留在历史,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古老的传说中,伫立于小城中央的那棵大树也经历过雷电的洗礼。巨雷曾经在这棵大树上炸响!据说,万钧雷霆穿过巨蟒般翻腾的乌云,从天而降……与之相伴的是无法想象的豪雨。那以后,时间仿佛停顿了。”即使原住民的生活中被强挤进了线性时间,比如“时钟,滴答滴答,如此走着,好像匆匆忙忙”,也不会中断原住民的历史及对未来的希冀,因为“幸运的是,老人们记忆中的神灵在倾听,告诉人们谁都可以在故事里找到希望——长长的故事和其中短短的故事”(Wright,2006:12)。

斯坦纳认为西方人的“时间”“历史”并非存在于原住民的“梦幻”时间所指示的意义中,因为原住民的“时间”“历史”蕴含在“梦幻”时代的故事中(Stanner,1953)。“梦幻”使澳洲原住民对于西方语境的历史、起始/发展/结束的概念相当陌生(徐显静,2010:90)。赖特运用原住民的非线性、非定位时间观不仅建构了原住民语篇的跨时空特性,还通过前景化原住民时间观,淡化了现代线性时间观,甚至嘲讽现代时间的无用性,因为现代时间虽然前行,但是却不能隔断或中断原住民的历史及古老传说的承传,调侃了殖民者历史的短暂性,彰显了原住民文化精神的悠久性和永恒性。

### 3.2 血亲的土地观

土地虽是看得见的实体,但是在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里,每个部落、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与土地合二为一。土地,特别是母亲受孕的地方,与原住民有着血亲关系。新诞生的生命意味着婴儿与象征着神灵祖先的动物或植物同体,因为这些动物或植物是母亲受孕地的图腾。原住民,特别是成年男子,每年都得在他/她的图腾地举行生殖仪式,以延续他们的生殖能力(石发林,2010)。因此原住民所“拥有”的那块土地,并非需要购买才能拥有,而是来自于神灵祖先的馈赠,是原住民自我与祖先的纽带,是原住民的命脉,是原住民生命的一部分,因而在“思想深处,他(莫吉)拼杀得像发了疯的狗,把自己想象成一条八爪鱼,每一只‘胳膊、腿’都会引导他走向伟大的荣耀和成功。以这样的观点看世界,就没有余地去怀疑去干涉伟大神灵祖先的命运,他们永恒的家园早已携刻在这块土地上,携刻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收买这些只属于莫吉的‘胳膊、腿’”(Wright,2006:414)。

在欧洲人的视野里,土地意味着耕作与收获,意味着矿场与开发利用,意味着楼房与地产,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资源 and 财富。但是土地及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巨岩、洞穴、河流、海洋等等,不论是在原住民彩虹蛇创世的神话里,还是在崇拜图腾的部落里,或是在不同方言的叙事里,都具有特殊的、超越实体本身的精神价值,寄托着原住民的情感:“威尔爬上一座又一座高山,直到来到一个很大的岩洞。岩洞里,洞壁上留下祖先用赭石一遍又一遍绘制的人类历史的壁画,有如先人们轻声讲述这块土地的宪章。威尔在这些壁画前毕恭毕敬,深情地抚摸着洞壁几个地方,感觉自己与祖先在一起的永恒。路过禽鸟、走兽以及很早以前部落成员呆过的岩洞家园,他感到既卑微又荣耀。”(Wright,2006:181)由于土地与原住民的这种亲情关系,成年原住民多能谙熟大自然风云变幻的规律,拥有超凡的自然知识:“他(诺姆)对天空的了解就像对大

海的了解一样多。普瑞克尔布什的人们说,他一直追赶星群。他们确信他知道上天的秘诀;他们认为海上刮起风暴,海天相连的时候,他一定和石斑鱼一起到星星上了。”(Wright,2006:6-7)

五万年来,澳洲的土地虽然贫瘠,气候虽恶劣,却养育了世代代的原住民,为原住民带来了物质给养和情感归宿。原住民自觉地承担起保护土地、看护家园的责任和义务,成为土地的守护者,安吉尔·戴即是这样的人物之一,“她认为自己接替诺姆的祖父,成为这块土地的守护者。在她的心目中,不管是谁,要想进入这块土地,须先和她这个‘守护者’打招呼,说明来意……她像女王统治着这块土地”(Wright,2006:27)。

原住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源于他们对土地社会功能的识解。人们把对待、照看、守护神圣土地的模式投射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成为人们相处之时所要遵循的法律(Graham,1999:105-118)。“自从时间的肇始,关于这条河和沿海地区的秘密就是祖先传下来的‘原住民律法’。”(Wright,2006:3)“法律与大地相伴而生,两情缱绻。用帕特·道森的话来说,法律在‘原住民及其领土间建立了如胶似漆的亲昵关系’。”(马修·杭特、查尔斯沃斯,1998:350)

通过原住民血亲的土地观,赖特展现的是原住民源于土地的律法与西方土地法的差异。源于土地的律法是“梦幻”神话与传说中规约人们在大自然、在土地上、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准则,而非仅仅是关于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条文。原住民土地律法秉承“彩虹蛇承诺”,敬重的是彩虹蛇的创造力,惧怕的是彩虹蛇的破坏力,这种敬畏感为原住民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遵从“彩虹蛇承诺”,爱护生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便得到神灵祖先庇护。正如主人公莫吉所说:“我(莫吉)不在乎是否有人照顾我。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律法。律法会照顾我们大家的。”(Wright,2006:443)

血亲的土地观建构了《卡彭塔利亚湾》原住民护卫家园的反叛主题。在莫吉的影响和帮助下,原住民青年威尔承担了保护家园免遭践踏资源免遭掠夺的责任,冒着巨大的危险,成功地破坏了矿业公司的输油管线,并炸毁了矿业公司的所有设备。在“梦幻”世界观里,土地、自我、律法全部统一在神灵祖先的创世伟业中。基于神灵祖先的媒介,土地即为祖先,祖先即为律法,即为原住民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土地即为全体原住民的统一身份。因此,小说中,炸毁矿业公司可以说是原住民的希冀,看护住每一寸土地即是看护住了每一位原住民,整个民族犹如大海航行中拥有灯塔的船只,生活有了方向,精神层面有了归属和依托。

### 3.3 吟唱的历史观

作为没有书面文字的民族,澳洲原住民渊远的历史只能以口传心授的形式代代相传。因此吟唱在原住民的文化、教育、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代一代土著人的吟唱犹如录音机,记录了“梦幻时代”神灵祖先在大地上行走,创世造物的丰功伟绩。吟唱使赋予自然万物各种名称的神话得以传承。吟唱是与祖先沟通交流的行为,吟唱是习得祖先留下宝贵知识的行为。在澳洲原住民神话中,“歌声形成了世界”(李尧,2012:41):“护卫队如蜥蜴般地沿着他们伟大祖先曾经走过的道路蜿蜒前行。



他们崇拜祖先,吟唱着流传了多年的祖先梦幻故事。”(Wright,2006:124)这种形式“虽然神秘,但是土地上歌声飘荡,为这块被水浸泡过的土地唱出新生。诺姆和巴拉手拉手,走出那座曾经的小城,沿着那条路,向西边走去,向他们的家走去”(Wright,2006:516)。

这些蜿蜒的道路即是原住民的“吟唱线路”(Songline),也被称为“梦幻轨迹”。诺里斯和哈内(Norris & Harney)认为吟唱线路实际上是澳洲原住民口述的地形地貌图,以天体星象为参照,为没有文字的澳洲原住民提供了海陆上的导航图。部族中的智者能凭吟唱歌词和旋律所描绘的路标,或通过舞蹈再现神话故事,表现风暴、洪水等自然现象,追随吟唱线路,在炙热干旱的沙漠、峰峦叠嶂的森林、波涛汹涌的海上找到水眼、食物、出路、避风港,找到导航参照系,找到某一块土地所归属的部落(Norris & Harney,2014:141-148)。威尔的岳父“迈德纳特老人想起他一辈子也没有举行过的一种仪式。现在,连他自己也十分惊讶,居然把它传给了威尔。他唱啊唱啊,相信自己按照正确的顺序唱出至少一千公里以内几百个地名。”“唱吧,只有这个地方叫这个名字。记住,不要弄混。然后下一个地方,唱。现在听我唱。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像那轮明月,哦,比它稍微低一点儿。继续,再练。记住,不要出错……”“这首歌那么长,那么复杂,而且必须按前后顺序准确地记住每一个地名,记住哪里海水翻滚,哪里波涛汹涌,哪里洋流滔滔,哪里乌云遮天”(Wright,2006:372)。年轻的主人公威尔在迈德纳特老人的鼓励下,沿着老人传授给他的标示了顺序、方向的“梦幻”吟唱线路走下去,他虽然孤身一人,但是靠着吟唱线路中神灵祖先所给予的独特智慧,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历经艰险躲开矿业公司的追杀,最后与原住民护卫队一起,炸毁矿山,寻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赖特通过主人公追寻的“梦幻轨迹”前景化了吟唱的历史观,昭示着原住民的反叛主题,即原住民虽然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但只有遵循祖先的吟唱线路才能安全前行,因为拥有本民族的历史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与归宿。

#### 3.4 游走的教育观

以游走的方式熟悉吟唱线路是原住民与祖先联系的另一种方式(Peterson,2004)和重要的教育手段。不需耕种的原住民,为狩猎和采集果实进入丛林的游走仅是澳洲原住民游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人生历程中的出生、成年、结婚、死亡仪式及重大节日庆典,都是许多原住民游走的动因。游走使原住民更接近神灵祖先栖息的圣地,聆听长者讲述的祖先的创世事迹,了解部落的历史。经过游走的原住民青年将在部落文化传承中担当重要角色,保障古老文明的延续。“他们的挑战是要一直处于游走之中——跟随老人走遍那块土地上至少一千个老人记忆里的地方。那也是一场考验,考验他们对家乡的土地究竟了解多少,然后才能找到正在等待他们的白胡子。每一个家庭都必须知道的历史,必须走过一条条各不相同的、漫长的道路。”(Wright,2006:31)

赖特通过对费希曼朝圣车队游走的描写,向世人宣告原住民游走的精神意义在

于以返璞归真的方式寻觅原住民的真我,巩固原住民身份,心怀感恩,认祖归宗,实现延续传统的道德教育。到神圣的地方举行宗教仪式也是原住民实现宗教教育的目的。如费希曼穿过黄尘漫天的风暴驱车回家:“长长的一队破旧的汽车跟在他身后艰难地爬行。车身上覆盖着一层干旱荒原刮起来的厚厚红色尘土。车队后面留下的废气和尘土犹如轮船在海面留下的尾迹。这‘绝色奇观’是跟随莫吉·费希曼始终游走的宗教信徒车队创造的。现在,他们又一次驶向家乡,要在州的边境举行一个盛大的宗法典礼。”(Wright,2006:119)这种为了举行重大仪式的游走有如朝圣之旅,庄严而令人敬畏,“……人们觉得他们的的确是跟着‘梦幻’前进……横跨大陆,游走到东北部的海湾完成他们的仪式是一项严格的律法……车队行朝圣者知道他们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这个仪式,确保‘律法’长盛不衰,而这个仪式是为冈瓦纳土地护卫者举行的”(Wright,2006:124)。

赖特以生动、直观的游走舰队形式,在文本中使读者了解原住民的“梦幻”历史、生活环境,古老的民间智慧、生存技能,以及原住民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价值体系的根源。赖特所叙述的游走过程,也是原住民体会祖先神明,感激祖先恩泽,体会土地意义的过程。游走的教育观是对当今社会流行的封闭的、书本化、数字化教育观念的反叛。游走的教育观敦促人类要成为自然的真正护卫者,呼吁人们要加强个人与自然的统一身份认同。

### 3.5 物质的神灵观

在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里存在两个实在体系或两个实体世界:一个是可见的“具体物质体系”;另一个是不可见的“神灵物质体系”。“具体物质体系”遵循物质运动规律,而“神灵物质体系”则遵循“前逻辑”规律,认为不存在原因和结果的分离,即“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是统一的,在任何时刻里,看得见的事件都取决于看不见的力量”(不留尔,1985:418)。例如,诺姆因周身骨疼而责怪是妻子“把房子建在一个蛇精的巢穴之上。他对她说,他怎么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地下升起,一直钻进他的骨髓”(Wright,2006:13)。同时,“梦幻”世界观里无形的力量也被视为神灵祖先的化身,神灵与祖先、土地同体,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因此“普瑞克尔布什人看到巨大有力的神灵造物祖先占据了陆地和海洋,跨越了每一条江河,每一座山林,甚至走进那些不同民族的人的家门”(Wright,2006:59)。这些神灵无处不在,不仅庇护保佑着原住民,也令人敬畏和恐惧。精神领袖“费希曼自从回到德斯珀伦斯,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且一直挥之不去。他还在苦思冥想那种预感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越想那答案越难以捕捉。‘该走了,’他对安吉尔说。‘不能让那些鬼怪追上我们。’……这些神灵在每一幢房子里,听人家聊天儿,还会插嘴发表点自己的看法”(Wright,2006:362)。正因为如此,原住民会进行驱鬼活动,而这需原住民中的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做,因为他们谙熟祖先古训,能与神灵祖先沟通及驱鬼。“凡特姆家经常做各种‘法事’,和另外那个世界的事务沟通。有时候,他们在这里施巫术驱邪,更多的时候是满脸严肃的祈祷者和令人尊重的长者在他家举行宗教

活动。”(Wright,2006:139)

对于十分强调精神世界的原住民来说,物质的神灵观蕴含的宗教和社会功能为原住民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奠定了精神基础。对鬼神的敬畏框定了人们的行为,制定了是非善恶价值标准,也是“梦幻”世界观重叠性认知特点的折射(冷慧,2014:11-16)。这种重叠性包括神性与人性的重叠、先人与后人的重叠、历史与现在的重叠、神话与律法的重叠、人类与自然的重叠、个人与他人的重叠、名称与实体的重叠,心智、灵魂与身体的重叠等等。凭借物质的神灵观,《卡彭塔利亚湾》冲击了西方文化、西方世界观和西方话语,挑战了以西方标准所定制的殖民者语篇,为原住民争取了话语权,拓展了申述渠道。

#### 4. 结论

赖特通过池塘的时间观、血亲的土地观、吟唱的历史观、游走的教育观及物质的神灵观建构了原住民语篇的特色性和神秘性,昭示了原住民话语的主体性,揭示了原住民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反思能力不断增强的主题,同时也解构了后殖民文本中的话语霸权主义与文化的霸权主义,表明殖民者自以为高尚、文明的价值体系不见得就一定比原住民文化更高明,不见得能够为原住民所接受。支撑原住民世界观、土地观、历史观、教育观和神灵观的“梦幻”世界观,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别样的视角重新审视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也促使读者反思欧洲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中存在的差异及冲突,帮助理解原住民的虽显异样却又真实存在的宗教观及其独特的认知模式。《卡彭塔利亚湾》揭示了欧洲文明曾以一维的价值取向对澳洲原住民做出了简单的判断,产生了反人类的灾难性结果。原住民所经历的沧桑与悲凉促使读者理解原住民作家积极书写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努力及寻求在政治、信仰、土地权利等方面更多理解的诉求,同时帮助读者突破西方殖民者欲求同质化世界观的束缚,学会尊重他者,尊重差别。在理解原住民精神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打破定型化效应,看到文化多元共生的迫切性,同时更看到原住民和谐的生态观的重要性。

#### 参考文献:

- [1] Aitken, Tom. A Mine in Desperance [J].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008(5): 21.
- [2] Ashcroft, W. D. Stories of the Old Country: Reinventing Dreamtime Tropes in Poor Fellow My Country, Benang, and Carpentaria [J]. *Intimate Horizons: The Post-Colonial Sacred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delaide, SA: ATF Press, 2009:205-241.
- [3] Devlin-Glass, F. A Politics of the Dreamtime: Destructive and Regenerative Rainbows in Alexis Wright's Carpentaria [J].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2008(23): 392-407.
- [4] Graham, M.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s of Aboriginal Worldviews [J]. *Worldviews: Environment, Culture, Religion*, 1999 (3): 105 -118.
- [5] Janca, A. & Bullen. C. The Aboriginal Concept of Time and Its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J]. *Australasian Psychiatry*, 2004(1): 40-44.

- [6] Norris, R. & Harney. Songlines and Navigation in Wardaman and Other Aboriginal Cultures [J]. *Journal of Astronomical History and Heritage*, 2014(2):141-148.
- [7] Peterson, N. Myth of the Walkabout: Movement in the Aboriginal Domain [G] // Taylor, John & Martin Bell.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Australasia and North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223-238.
- [8] Ravenscroft, A. Dreaming of Others: Carpentaria and Its Critics [J].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2010(2):194-224.
- [9] Stanner, W. *White Man Got No Dreaming* [M].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53.
- [10] Syson, Ian. Uncertain Magic [J]. *Overland*, 2007(187): 85-86.
- [11] Walker, R. Eternity Now: Aboriginal Concepts of Time [J/OL]. Corps Resources Produced by the Salvation Army Australia Southern Territory Corps Programme Department [2010-08-27]. <https://www.army.org.au/Resources/Articles/reforming-society/Eternity-Now-Aboriginal-Concepts-of-Time/>.
- [12] Wright, Alexis. *Carpentaria* [M]. NY: Arta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iramondo Publishing, Sydney), 2006.
- [13] 纪秀明. 传播与本土书写: 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14] 凯斯特·伊戈尔, 龚静. 歌唱澳大利亚: 读艾丽西斯莱特的《卡彭塔利亚湾》[J]. 大洋洲文学研究, 2015(1): 266-281.
- [15] 李尧. 从《卡彭塔利亚湾》到《光明行》, 我对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一点体会 [J]. 大洋洲文学研究, 2014(1): 174-182.
- [16] 冷慧. 世界观的认知机制: 解读《卡彭塔利亚湾》中隐性连贯语篇现象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4(3): 11-16.
- [17] 李尧(译). 卡彭塔利亚湾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2012: 41.
- [18] 列维·不留尔. 原始思维 [M]. 丁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418.
- [19] 马修·杭特, 查尔斯沃斯. 法律与历史: 黑白之间 [J]. 比较法研究, 1998(4): 350.
- [20] 石发林. 澳大利亚土著人研究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 [21] 文旭. 语义、认知与识解 [J]. 外语学刊, 2007(6): 36.
- [22] 王寅. 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 [J]. 外语学刊, 2005(4): 6-12.
- [23] 武竞. 《她们自己的声音》——澳大利亚土著女作家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24] 邢春丽.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神秘的河流》和《卡彭塔利亚湾》中的土著主题 [J]. 大洋洲文学研究, 2014(1): 17-32.
- [25] 向晓红, 兰兴武. 安吉尔戴人文形象分析 [J]. 大洋洲文学研究, 2014(1): 85-98.
- [26] 徐显静. 梦幻魔幻隐喻——评小说《卡奔塔利亚》[J]. 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0(6): 90.
- [27] 詹春娟. 边缘的想象——论《卡彭塔利亚湾》中的狂欢化表现 [J]. 大洋洲文学研究, 2014(1): 43-54.
- [28] 张炜. 来自澳洲最杰出的歌者——序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冯革

# 亨利·詹姆斯与他异性小说美学： 他者化梅西(下)

多萝西·J. 黑尔<sup>1</sup> 著 王长才<sup>2</sup> 译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英语系, 美国 94720-1030; 2.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 本文认为, 亨利·詹姆斯对小说美学的贡献超出了通常认为的他在形式和写作上的发现。对詹姆斯来说, 叙述形式的问题与将虚构人物当作自主存在者进行再现的伦理问题密不可分。《梅西所知》是为英美文学传统最明确地定义了此任务界限的詹姆斯小说。本文分析了詹姆斯明确的伦理目标, 即寻找正确叙述形式以最好地再现一位年轻女孩身份的内在性。詹姆斯美学方案采用的特定用语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强烈反应: 他们因其虚构的这个孩子的叙述命运, 或赞美或谴责作者詹姆斯。

**关键词:** 他异性; 人物自主性; 伦理; 亨利·詹姆斯; 意识形态; 自由人文主义; 托妮·莫里森; 小说美学; 视点; 种族他者性; 20 世纪英美小说; 《梅西所知》

## Henry James and the Novelistic Aesthetics of Alterity: Othering Maisie

Dorothy J. HALE trans. by WANG Changcai

**Abstract:** This essay argues that Henry James's contribution to novelistic aesthetics exceeds the formal and compositional discoveries with which he is typically credited. For James, the problem of narrative form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ethical problem of representing fictional characters as autonomous beings. *What Maisie Knew* is the James novel that most clearly defines the stakes of this task for the Anglo-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This essay analyzes James's explicit ethical goals in finding the right narrative form to best represent the intrinsicality of a young girl's identity. The terms of James's aesthetic project elicit emphatic responses from critics who either praise or blame James as author for the

---

**基金项目:** 本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自然叙述学研究”(16BZW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多萝西·J. 黑尔, 女, 美国著名小说理论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小说、小说理论和叙述理论研究, 尤其对小说形式及与之相关的美学、伦理和政治价值问题感兴趣。  
王长才, 男,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文艺学博士, 硕导, 主要从事叙述学研究。

narrative fate of his fictional child.

**Key words:** alterity; characterological autonomy; ethics; Henry James; ideology; liberal humanism; Toni Morrison; novelistic aesthetics; point of view; racial Otherness; twentieth-century Anglo-American novel; *What Maisie Knew*

(接第五辑)《梅西所知》最明确提出、驱动所有行为的伦理问题,是由人物不断提出的问题:有谁能好好照顾梅西?但照顾的意义在于小说中没有坚实的(monolithic)伦理条件。在伦理性的发展模式,梅西需要有人照顾,直到获得成人独立的条件。的确,在此问题上,大多数的批评对是否有人照顾看法不一,如果有,谁自愿为她牺牲自己的自由。读者要么倾向于支持作为最终道德中心的成年人,要么认为,小说中所有成年人都有罪过,试图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梅西,詹姆斯的意图是——带着由巧智和喜剧引起的同情——将成年人世界描绘为无赖的世界(McCall, 52)。尽管在特定情况下难以明确评判,并且尽管这种含混可能意味着自私和慷慨的动机的不可分,在这种解释中,照顾的伦理是由人格的自由人文主义观念所驱动的,此观念优先考虑人格的自主,并将照顾界定为受约束、独立的成年人自愿、慷慨的行为(Booth, 2001:26)。

当然,许多小说的巧智来自詹姆斯的描述,即在自由人文主义框架内如何轻易地将照顾的伦理吸收为一种验证成年人不负责任的策略。小说表明,那些成功摆脱自己监护人身份的人物通常声称,他们的独立状态是由高贵的自我牺牲实现的(Kaston, 1976:31; Tanner, 1985:13)。例如,当艾达(Ida)在福克斯顿(Folkstone)追踪梅西和克劳德爵士时,她对梅西宣布:“我是来牺牲我自己的”(172),“原谅你”(173),“饶恕你的一切”(172)。这意味着,通过屈服于道德成熟的梅西做出的、与克劳德爵士在一起的决定,艾达已经饶恕自己的一切,她可以自由地如她所愿地生活。自我牺牲的道德语言因此成为遗弃本应受照顾的孩子的虚伪手段。正如克劳德爵士生动地描述的:艾达对她女儿的遗弃“……这是最可恶的事。她把我们在这一带的朋友随意丢弃,不亚于把尖叫着和恳求着的她从窗户推出去,摔到两层楼下的铺路石上”(190)。詹姆斯确立的自我牺牲的连续体(continuum)处于滑稽虚伪与潜在高贵之间,使读者的伦理判断变得困难,这判断需要剖析慷慨和自私的动机,以及判断单独的虚伪个案到底是琐碎还是深刻。

这些滑稽场景通常伴随着辛酸,这种辛酸是对梅西施加压力,让她用自由意志选择行动的结果,这些行动只对提议做决定的成年人有利。例如,在让莫里森感兴趣的与伯爵太太在一起的场景中,梅西父亲要求她选择未来的父母监护人。比尔(Beale)的措辞将梅西定位为一个自由人——当然,通过强调他没利用父亲的权力逼梅西做出决定,事实上他正强迫她提前成为自由人,恰恰由此他可以放弃对她有权力的身份,放弃作为父母要照顾她的责任,并通过将遗弃归于她自由意志的决定,让她负责。

如果梅西还不是大人们当作的能负责的人——如果她父亲给幼小孩子的最后通牒看起来不公平,如果我们注意到,威克斯太太不再要求梅西去谴责,而是建议梅西“只要相信我,亲爱的;这就行了!”时又重新将梅西当孩子(219)——这些场景可以说是梅西伦理教育的一部分,这些经验培养她确立一种伦理标准,也通过他们的情感困境,帮助她发展了独立性<sup>①</sup>。当然,叙述者通过评论加强了这种观点,这些评论不仅强调梅西的成长,甚至还强调她成熟的进度。例如,梅西准备和克劳德爵士一起去法国时,叙述者谈到了恰当处理梅西经验的细节和复杂性的困难:

此刻她的预感有如此充分的依据,以致如果我想追踪她推想的每个阶段,我就没有足够篇幅完成最终目标了;因而基于这一情况,我必须要说,我们对克劳德爵士的行为所做的最充分的表达只是它呈现给他年轻朋友的图景的一幅可怜、苍白的复本。(159)

因而,叙述者将自我描述为追踪梅西意识发展线性进程的历史学家,并暗示,虽然小说中成年人可能过早将梅西当作完全成熟的大人,如果运用正确,发展的伦理模式仍然是评判的标准。的确,大多数读者将它视为成长小说。许多接受自由人文主义框架的人将叙述者视为他所说的历史学家,梅西在小说结尾的孤独(她与威克斯太太站在一起,但感情上却远离她)是她伴随着完全的成年人见识状态的独立性的象征。<sup>②</sup>前提是梅西已经长大无需照顾,她获得的自主性价值,源自成熟伦理判断的独立性价值,表现为她的孤独(Mitchell,1972:169)。

但是,将这部小说只当作成长小说也拒绝了另一些方式,在这些方式中,詹姆斯让认为梅西成长为大人的观点成问题,从而不断削弱一种伦理作用的自由人文主义模式。在这种相反的意见中,梅西从一开始就拥有彻底一致的性格,她的经历是展示一种身份永远不变的机会。<sup>③</sup>成年人却将梅西看作拥有如此清白的纯真,不管暴露于多严重的堕落都不会受损,或者她从一开始就天生地向堕落开放,没什么可以让她更糟。

虽然叙述者对梅西的再现归因于对她性格有所发展的看法,但在小说对她行为、言语或思维方式的再现中没有这种见识的确切证据。与《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中的弗洛拉(Flora)不同,梅西没有因知道得“最多”的道德重负或所有要知道的她都知道的错误罪名而精神崩溃。<sup>④</sup>简而言之,小说代表可发展的伦理模式所做的断言很难得到证实,因为梅西艰难实现的伦理成就没有显示出拥有积极的成分。梅西的预感可能有很多——但对她从一开始就没什么重要意义。

如果用心灵的伦理内在性模式来解释最后的场景,我们会注意到梅西如何保持引人注目的一致,以及她的一致性如何引起关于照顾的伦理意义和社会性表现的另一种观点。对于梅西而言,转折点不是她的任何行动,甚至不是她觉得必须坚持的任

何立场,而是克劳德爵士的转变,而这决定性地让她别无选择。

在最后场景中,那些成年人坚持只将梅西视为他们一直认为的样子。对于比尔太太,梅西还是道德上的怪物。克劳德爵士一直认为在梅西身上看到了“致命的美的天分”,这是“性格的魅力”。

因此,伦理身份的内在模式认定成人的照顾要么具有强大影响,以致六岁前就决定了梅西的身份,要么是一种培育的力量,对梅西的成熟及其精神生活至关重要。通过后一种方式,内在性模式可以促进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使之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没有将依赖当作临时的、阻碍伦理性的不成熟情况,克劳德对梅西的持续关心使得“生活”得以欣欣向荣。通过这一方式,梅西的孤立没有带来任何道德补偿。它更是被遗弃者的孤独,为了并不想要的自由放弃了赋予其生命的依靠。

告别克劳德爵士后,梅西的视点不再被描绘。叙述者描述了梅西和威克斯太太既“喘不过气来”又“惊恐害怕”,但既然是小说特性的对梅西意识的亲密展示突然结束了(274)。在此,我们可以开始欣赏詹姆斯的叙述如何表明他异性美学的情况。读者通常会把詹姆斯叙述上的变化理解为承载有伦理意义。一些读者可能将不再采用梅西视点解释为暗示着梅西自给自足的幸福结局。其他人可能解读为她的自由免受堕落的成人影响;她现在置身社会世界之外,超脱于卑污行径。或者它可以被解读为她堕落精神的形象,那些已是、也应是她的恰当同伙的恶棍们被夺走了。其他读者可能将她视点的消失解释为其精神的最终灭绝,要么理解成不再关心,要么理解成一个空洞灵魂的应有下场(Silverman, 1988: 162)。或者,那些道德模范生来就具有美丽人物的“致命天赋”(98),他们的困境对社会而言全然是太好了。他异性美学更具体地出现在此时:小说的美学成功关联于在这最后一页中废除梅西视点的正确抑或错误。他异性美学开始于詹姆斯的纽约版《梅西所知》序言,它将对梅西的再现概括为一种他者化的叙述行为。转向序言,我们可以看到,我所描述的竞争性的伦理模式如何对詹姆斯起作用,他另类地描述了他与梅西的关系,作为作者他只是地位平等的伦理代理人之一;作为养育者,他在她立场上的关心,实现了她作为生命主体的伦理境况;作为她内在本性的观察者;作为她饱满主体性必要的阐释者;以及作为将她人格工具化的冒犯者。詹姆斯在序言中完全清楚地表明,写《梅西所知》时他致力完成一种伦理行为,但在他试图清晰地从总体上描述艺术的伦理力量和更具体地描述小说美学的伦理力量之时,他冒着不知不觉地被牵扯进来、成为在他自己的小说之家中不道德的代理人的风险。

莫里森对詹姆斯的批评依赖于这样的解释:在她看来,叙述大师被意识形态方面的盲视致残了,这种盲视将他引向对美国伯爵太太的不道德的处理。但无论我们是否赞同詹姆斯,认为他写的小说展现了一种正面的伦理的善,或者我们是否同意莫里森,认为詹姆斯无法控制的力量显示了他对其人物的不道德的处理,由詹姆斯开始、莫里森继续的对话理所当然地认为,小说艺术与对人物他者性恰当再现密不可分。



《梅西》序言中,詹姆斯主要通过给自己布置这样的任务发展了他异性美学:这部小说完全从单个人物的视点讲述。詹姆斯说明,他的全部动机是实现对梅西理解活动的生动表现。通过选择让其故事成为人物身份的故事,然后通过选择孩子作为这个身份,詹姆斯增强了小说人物的他者性的风险。他怎么能进入人物的主观世界,而这个人物的主体立场与他自己的如此不同?他解决此问题的第一个念头是负责地自我限制:他寻求“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限制到”梅西主观世界的“用语以及经验上”(8)。他小说方案的核心将会是这样的伦理价值:将梅西作为不同于他自己的人带入小说存在,这个人既拥有她自己的内在身份(她自己的用语)也拥有她自己的自主理解(她为自己看待一切)。

但詹姆斯进一步思考后也指出,他发现自我限定和引用的策略对于再现梅西全部特性是不够的。坚持以内在性(intrinsicality)的严格标准再现梅西的自主性会付出将她置于社会关系世界之中的代价。用她自己的话说,透过她的眼睛看,世界“在最好的情况下会留下大的缺口和空白”:詹姆斯宣布,结果将是“一种可能无可指摘的系统化的表面,然而[这]应该仍达不到感觉的清晰性”(7)。要系统忠实于梅西的视点,会让读者不能理解她的体验。这种再现方法可能纯粹,但纯粹的特定前提将导致一种激进的自主性,会使她的经验没人能懂。要完全且只通过她的眼睛看世界,会获得她身份的真实性,她的身份对于詹姆斯而言是一个社会性他者,一种特殊种类的社会性他者,但会牺牲掉社会关系和附属关系,这些使她作为生命有意义,也让她的生活能为别人所辨识。她应该被视为一个自治主体,以被描绘为属于任何人的社会世界的一员为代价。实际上,她在整部小说中都独自站在一边,就如小说结尾那样。

詹姆斯在序言中宣告,他找到了克服这种再现难题的办法——即他作为作者承担起梅西看护人的角色。他指出,更深切地考虑孩子天性的话,严格使用他们貌似可信的语言再现他们,事实上对他们并不公平。因为“小孩子们有更多的感知是他们无法用术语表达的;在任何时候,比起他们及时的、仅仅是能说出来的(producible)词汇,他们的观察力都更为丰富,他们的理解力甚至不断强大”(8)<sup>⑤</sup>。那么如何最恰当地忠实再现梅西感知在语言上和直觉上的特性?除了使用她的用语,詹姆斯决定,作为作者他可以帮助梅西走出困境,维护她的利益,为了她可再现的善而行事:他将她富于直觉的感知转化为语言,为她找到词汇和表达方式,这样梅西对生活视野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会得到公平对待:

……是她的关系,她的精神活动,决定了所有我们自身的关注——我们只是比她自己运用得更好。只是,即使主要是她的兴趣让我们感兴趣的有意义,我们不可避免用这些手法记录下这些,这些手法她尚不能掌握,然而还是必需的,每当此时,她理解的关于她和她的经验指向了黑暗的解读(darken off into others),而这是痛苦的她

想不到的。(8)<sup>⑥</sup>

在这个修正后如何最恰当地再现梅西他异性的看法中,詹姆斯采取了克劳德爵士的伦理观。在效果上,通过对她可行的、持续的照顾,通过领会她精神活动的能力,他将梅西作为一个“生命”创造出来。詹姆斯相信他的语言全都为了梅西。他的词汇使读者得以理解梅西视点的丰富复杂性:通过运用“她尚不能掌握的手法”(8),他“参与并放大”了梅西的感知。詹姆斯因此相信,通过确立照顾梅西的关系,他也解决了将她的经验置于与故事世界的社会性他者的关系之中这一问题:他可以充分再现她感知的一切,也为那种理解、那种她并不直接明白的社会现实划定界限。

但是,梅西的视野在不被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变得更宽广、更有力吗?用亨利·詹姆斯的语言讲了这么多,梅西的精神还是她自己的吗?这个作者是又一个成年人吗,就像克劳德爵士和比尔太太所做的,“让她成为你的任务——让她成为你的生命”(90),然而这仁慈与猥亵很难区分?

恰恰是这些问题成为梅西的叙述再现的诸多方面,使这部小说对巩固小说文类的他异性美学如此有影响。语言有时是她创造者的,有时是她自己的——有时同时是两者的——用这样的语言只再现梅西主体性,这一小说方案在文本中确立了作者和人物的极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为小说中几乎每一个词都注入了道德风险(Poirier, 1960:9)。詹姆斯为了梅西或作为梅西发言时,会邀请读者对梅西人格的可行的或缩减的效果进行估量,小说形式的一种全新维度因此向美学价值敞开。

这种美学的整体特征是,它复杂地创建的动力存在于特定实例中,并在贯穿叙述整体的各种关系中发展。<sup>⑦</sup>要充分讨论这些需要更多篇幅。但我至少可通过聚焦一些段落,以显示詹姆斯建立的人物和作者间给予和取走的范围,开始归纳一下詹姆斯由《梅西所知》调动起来的他异性美学效果的特点。这些例子包括詹姆斯通过使用“她”的用语试图公平对待梅西的他者性;詹姆斯以她的语言作为媒介表达自己的巧智时对梅西的利用;他赋予梅西成人的语言;以及与梅西的这种世故有关的情色暗示:通过让她说成人的话,詹姆斯用叙述破坏了梅西童年的纯真。

詹姆斯的叙述程式支持了序言中的主张,即:用梅西用语表达她能用语言呈现的感知。这在小说一开始尤其引人注目,詹姆斯采用的比喻明显源自对小孩子尤为突出的经验。克劳德爵士的承诺“像圣诞树一样明亮”(55)。她母亲的朋友“眉毛拱起像跳绳,漂亮白手套上又粗又黑的缝隙,像画音符的五线谱”(31)。但只要描写方案变得更复杂,这些孩子气比喻的归属就更难确定了。例如,她母亲的眼睛被描写为像“在节日的拱门下摇摆的日本灯笼”(117),这些标明为梅西的用语,使叙述者对比喻的引申变精致了。同样,佩瑞恩(Perriam)先生的脸在梅西看来像“眼睛上长了胡子”,眼睛“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好像被艾达有名的一击打得四散的台球”(79)。在这个句子中,将她的母亲作为艾达进行塑造转换了视点,使得叙述者从梅西使用的短

语,转为添加取笑梅西母亲的笑话填充了这一比喻。

段落越长,叙述性的引语、详述以及詹姆斯和其人物的伦理关系的作用就越突出。比如,梅西第一次必须离开威克斯太太时,叙述者称,近来看牙医的经历为梅西提供了“和这个神经紧张的场景作比较的用语”(33)。但事实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用语”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形象化比照,而是作为叙述者对看牙医的冗长叙述而展开。要再现梅西的内在经验,要使用她的用语,就必须描述看牙医的整个过程。但比照的用语因此成为通过借用表现詹姆斯式夸张的机会。不仅看牙医展现为优雅构造的轶事,它也充满喜剧性,这种喜剧性取代了叙述者对梅西身体疼痛实际经验的再现。这则轶事的笑点在于滑稽的真相:梅西牙齿被拔掉时,威克斯太太充满同情的尖叫取代了梅西斯多葛式的沉默。相比之下,叙述者将他的关系定位于这一立场:强调和梅西的感受差别,不同于通过父母关切和心理认同产生的主观融合。但在此段落中,尽管叙述者用梅西用语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亲属关系的经济性质,通过这样的替换,叙述者对梅西损害或帮助使他在和梅西的伦理关系中保持“嵌入”状态,就“像她的牙被插在(socketed)牙龈上”。

但重要的是要看到,这里的利害关系不是叙述者拒绝同情,而是詹姆斯在叙述立场上最大范围和动态地发展。比如,当他用她的用语来再现她纯粹直观的情绪状态时,叙述者在认同方面展现了复杂的技艺。叙述者不是引用梅西表达自身经历的语言以再现梅西的他者性,而是复杂地想象,如果她要把直觉讲出来这语言会怎样。在这些情况下,叙述者也在表现他对作为假想的模仿行为的他者性的感知能力。比如,叙述者将梅西的内心描绘成一个储物柜,填满了小孩子的经验,她还不能理解,只是存放在那里。叙述者是在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些梅西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这使得游戏的比喻,是叙述者替她所做的明喻,而不是引用的实际用语。叙述者因而增强了梅西经验的用语的表达力,为她能理解的世界中的物体——如储物柜、游戏——浸透了她能感觉到但不理解的意义。

另一个例子正相反:叙述者把自己所有精细分析性区分都赋予了梅西。詹姆斯在序言中将上尉的场景当作梅西“坚定信念”转化力量的典型例子,在此,叙述者强调明确区分梅西的思想过程和引发这些思想的感受(序言,5)。对区分的关注将叙述者定位于梅西明确思想和感受的报告者,而感受必然要求他用语言再现。在上尉对艾达表示称赞之后,

梅西……发现自己反应强烈,比起上尉赞赏的重要,因欢乐而来的悸动仍然更难说出。她完全平静地听他提到她母亲,如同她从来没听任何人说起一样。她默默地坐着,突然产生这种感觉。毕竟,这种钦佩和尊重是很新的词语,与这样的事实相区别:在品质上没有一点像在任何场合从她父亲、比尔太太、克劳德爵士,甚至威克斯太太的嘴唇中说出的东西。似乎对她来说出现的是关于她小姐大人(ladyship)的主题,

这是她听到的第一次真正的善意,以致触碰到这之后,一些奇怪、深层的、怜悯的东西,在她内心升腾起来——一种启示,实际上,到目前据她所知,除了这一点,她母亲只是不被人喜欢而已。(122-123)

梅西的思考过程显然由这些暗示所阐明:她“发现自己”和她母亲给她的“新感觉”。她有意对比的行为也表现了她思想的如实过程,这个过程最后归结为“启示”。虽然梅西因此具有了作者的精确区分的分析能力,叙述者用语言表达了促使这些思想产生的情感,但这些情感不一定是思想的一部分:快乐的悸动,她安静的感觉,伴随用语言形式形成她思想结论而升起的“奇怪、深层的、怜悯的东西”。

这些段落虽都为梅西而写,虽正式凿刻出其感情和思想的差异,结合起来的效果既分析入微,又情感丰富,似乎很难让人相信这种感受出自孩子,并不仅因为它颠覆了儿童认知的刻板印象,还因为它颠覆了除了亨利·詹姆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对感受的期望。在这些瞬间,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梅西这孩子如此罕见,她拥有其作者所有的非凡能力,或者詹姆斯未能用他自己的形象想象梅西以表现他者性。<sup>⑧</sup>

在由小说他异性美学建立的伦理关系的光谱中,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段落,在其中,詹姆斯将其成年人智慧给予了梅西。他没有那么多地将她的用语与他的喜剧意义聚拢在一起,而是更复杂地将成年人的成熟与雅致和梅西联系起来。分开一段之后,梅西看到新婚的比尔太太,叙述者告诉我们:“孩子知道,她父亲的妻子之一,是位时尚女人,但她总是朦胧地加以区别,而不是毫无保留地把那个修饰用到别人身上”(102)。词汇都是叙述者的,表面上他是为梅西刚刚产生的新想法而使用的。但这妙句(mot)更适合鸡尾酒会上的闲谈,用于小女孩反思母亲和继母的服装似乎并不恰当。在这个例子中,他异性美学并没有提供明确证据说明梅西的堕落,或者叙述者不适当地将自己的感受赋予小梅西,而是让这两种可能性相互循环,这加强了由叙述承载的道德重负,提升了读者这样的需求:在其他章节中寻找更多证据,以推断梅西到底是好是坏,她到底是叙述者巧智的受害者,还是像他一样老成,能够在她心中与他的社会复杂性旗鼓相当。

梅西少年老成地学说成年人的语言,詹姆斯让这成了她性格的一个特点——但这也在他异性美学中起作用。有时通过暗示她以某种方式在语言或直觉上理解了重复的话,这些成熟的语言和机智的思考幸福地提升了她。

梅西的鹦鹉学舌同样可以意味着她道德堕落,除了成年人语言的魅力之外,也嵌入了其他价值。梅西坚持她明白自己说什么(例如,她将在特定情况下“杀死”比尔太太),这是为何威克斯太太一遍遍地宣称,她确定梅西事实上毫无道德感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何比尔太太确信没什么事是梅西不知道的,无需让她远离成人行为以保护她,她实际上就是成年人中的一员。当克劳德爵士承认自己对梅西说谎,为了让她避开比尔太太和他在布洛涅住一间卧室这一事实:

“但你相信我,你这个淘气鬼,不是吗?”克劳德爵士问这个孩子。  
她看着他;她露出微笑。“她的名声的确受到损害。我发现你到过这里。”  
他不无懊恼地笑起来。“亲爱的,看看你说到那种事的方式!”(103)

比尔太太的声誉受损意味着什么,在梅西心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但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带来的犹豫,即梅西肯定更为厌倦而非天真,即使是克劳德爵士,这位梅西道德美的捍卫者,在此刻也至少有点懊恼。

由于詹姆斯在序言中做出的更重大的主张,即艺术家的想象力作为社会进步、甚至社会转型的代理,詹姆斯和梅西关系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詹姆斯告诉我们,他第一次产生《梅西所知》的想法是来自别人向他“偶然提及”的“离婚夫妇的一些不幸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命运首先是被争夺,然后被争相拒绝(3)。詹姆斯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采取这种“丑陋的事实”“通过想象之光”,超越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什么,而去看看可能会发生什么:超越可预见的“退化状态”的现代社会生活,以通过小说为孩子们带来“幸福和提升的机会”(4)。艺术家的美学方案因此与伦理想象力相结合,被定义为这样的能力:超越自私行为的规范的运作去观察,以断定人类繁荣的可能性和条件。对詹姆斯来说,为了让“丑陋的事实”“变得精美、丰富”,就是为了“小小生物能安全和轻松地安心生活”(4),而这是由詹姆斯的伦理介入所提供的。而艺术家代表孩子发挥伦理想象力的转化效果,是由其伦理价值所支撑的,这种伦理价值内在于对小说写作和形式设计的艺术处理。詹姆斯也将“精美、丰富”(4)的价值归于实现的形式美:艺术使生活完全改观,用“高度稳定的逻辑”取代了生活的丑陋事实,这种逻辑来自综合设计,来自“确切和慎重的形式运用”,这种运用创造了艺术作品形式整体的“可控的优雅”(8)。

但尽管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间的联系推动了《梅西所知》再现方案,我们在序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努力:保持它们的作用,并让它们作为詹姆斯不间断压力的源泉。例如,当他描述如何发展梅西情节时,他诉诸“适当的对称”的形式价值,而不是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适用于梅西寻求安全和幸福的主观能力(3)。当他考虑将梅西作为人物进行再现的最佳方式时,他暴露了这种担忧,即:就叙述技巧来说,过多“高度稳定的逻辑”可能导致“我的主题被极端严谨所扼杀”的后果(7)。在他权衡可能引向这部小说最成功的效果时,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去描绘什么对于梅西最好——这些在小说世界中会确保她的安全和轻松——或者什么对于他的艺术性设计最好,这些会确保它形式上的美和优雅。结果是经常似乎由审美效果的结果推动了梅西的再现,就如同在以下对詹姆斯正当性讨论中,他将梅西经验限制在自私的成年人的肮脏活动中:

这个孩子……用世界上最好的忠诚编织了世故的密网;这个孩子成为不当行为的新系统的中心和借口,而且是一种本性传播和扩散的系统:那里会有“完全”的嘲讽,那里我最初找到的迹象所指向的有希望的主题会合乎逻辑地发展成熟。(5)

詹姆斯将梅西置于堕落社会的正当理由是,他可以描述她对此世界的内在伦理优越性,在詹姆斯看来,这不仅在于她不受腐蚀,还在于她自身的能力,她借此想象和实行积极的社会性改变。詹姆斯赋予了梅西一种伦理能力,与他归于自己的伦理能力相似。正如詹姆斯试图让真实社会生活的丑陋事实完全改观,成为真实生活的精美、丰富的社会性可能,他也认为梅西具有一种“创造惊奇的”(wonder working)的想象力,一种通过她不可亵渎的“清新”(freshness)去创造积极未来的能力,一种不可削弱的期望:不管在她世界中成年人多自私,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证实,具有慷慨和爱的能力会让她与他们相遇时,“多于”(超过)他们已知的道德能力。梅西因此为人们做了詹姆斯通过再现她的主观可能性试图为梅西做的事:“不是简单屈服于遗传的束缚和被强加的复杂情况,被它们折磨,我们的创造惊奇的小小代理人不用设计,就会创造出这种秩序的相当新鲜的元素……”(5)。因此,梅西道德上的成长与她蒙受的社会风险有关:这“以许多习俗和规范,甚至道德准则为代价”,当她把“美德的火炬举在空中,无限趋向于闷灭它;通过穿过自私的气味吸入理想的游离香味,通过出现的琐屑事实在贫瘠的河滩播种道德生活的种子,总之,的确使混乱变得更为糟糕,令人困惑”(6)。

重要的是,詹姆斯序言对梅西的描述中,她无需“设计”的能力使她和她身边操纵别人的成年人保持隔离状态并截然不同。詹姆斯的艺术设计恰好让他试图为梅西提供“安全和轻松”,这种梅西与詹姆斯艺术设计的混合在结构上与成年人的虚伪辩解很相似,他们打着为她利益着想的幌子却为自私目的利用她。詹姆斯毫无保留地宣称“美德的火炬”是他创造奇迹的社会改变的自身能力的源泉,他通过小说艺术进行这种改变,但却因将梅西当作小说形式的功能成分的工具主义态度而大打折扣。《梅西》的序言强调了詹姆斯和梅西的相似,也突出了詹姆斯的美学方案通过重新使用火炬的比喻侵蚀伦理方案的方式。詹姆斯试图将对梅西主体性的伦理描绘投入美学形式中,而这将促成伦理方案的转化力量,结果却是突出了为自己的美学目的剥削生命的艺术家形象。美德的火炬被重塑为“狂喜和胜利的火炬,因为艺术家坚定的手握住了它,并摆弄它”(4)。

詹姆斯在序言中抱怨那些评论家,他们欢迎《梅西》的出版,却在其中只看到自己的身份为他们准备好的东西。这些早期评论家看不到作家想象力的转化力量,在詹姆斯看来,因他们缺乏回应能力,不能从另外的角度观察,德里克·阿特里奇将这描述为不能向新事物开放导致的自体文化(idioculture)的复制(Attridge, 2004: 21)。詹姆斯记得1897年波士顿的期刊《文学世界》上的评论。匿名评论者将《梅西知道》

定级为“法国小说最糟糕的流派”,既反对小说人物行为的“不道德”,也反对詹姆斯让梅西顺从于这种行为的不道德。在这篇评论中,詹姆斯的道德行为问题直接关系到他对叙述形式的处理。对于这位评论家,由于詹姆斯的美学目标侵蚀了他与梅西的关系,他未能改变他描绘的丑陋事实。

这位评论家批评的核心是这样的假设:虚构人物无论如何不是作者的材料,作为人他们理应被特别再现,要为他们的安全和舒适提供条件,这明显表现在作者确切的论断,反对那些企图利用梅西的人,也表现在更为间接地传达的“男人的感觉”,这种情感在此理解为具有男子气概的作者对其人物困境所做的富于同情的认同。对这位评论家,不管以哪种方式詹姆斯都未能在其小说的社会世界中在场,简而言之(tout count),这暗示了詹姆斯作为一位艺术家的终身职业生涯已使他脱离了社会。根据这种观点,对艺术的终身追求扼杀了他异性的伦理准则。终身献身艺术被归于一种让人堕落的力量;它不仅将詹姆斯从社会中移除,这社会是他将自己封闭在研究中试图去描绘的,还使他把那个世界视为可能服务于美学方案的工具。对评论家来说,詹姆斯美学设计的成就因此就等同于其设计性。詹姆斯不是在“他和同类”间培养社会关系,而是发展出强硬手腕,控制并摆弄创造的虚构人物,因此未能把他们当作真人对待。<sup>⑨</sup>

把这位同代批评者当作头脑简单的读者,认为他过于盲信小说式模仿才去抱怨詹姆斯,从而对他不予理会的做法是有诱惑力的。但我们发现一个世纪之后,在充分了解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之后,詹姆斯的批评家甚至对其道德品德提出更为激烈的控诉,这种控诉基于一种作者应如何对待虚构人物的伦理标准。

希拉·蒂汉(Sheila Teahan,1995)和那位波士顿评论家一样,将《梅西所知》的美学方案理解为从根本上与对梅西主体性的伦理再现相对立。对蒂汉来说,榨取式唯美主义的表现被设置在对逻辑设计的不恰当的奉献中,这种逻辑设计使得詹姆斯采用主人公作为视点,并相信以这样的方式,梅西独有意识的再现作为已实现形式的一种要素,也可以方便地发挥作用。对于蒂汉,梅西形式功能的可感知性将我们引回到她创造者的伦理局限之上:它暴露了詹姆斯的“模棱两可的道德感”(Teahan,1995:63)。

在《梅西》序言中,詹姆斯为自己设定的美学问题对英美传统是个新问题,即发展一种小说的艺术。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内心,詹姆斯对这一问题的描述是如何成问题地与他异性的成就相关,这种他异性决定艺术的社会价值。换句话说,詹姆斯自己,既在其关于小说作为形式的著述中,也在其小说采用的形式中,为建立新老读者对他个人攻击的伦理基础助了一臂之力。在其故事世界中,他提供了竞争性的伦理性模式,由此读者会对詹姆斯做出伦理判断。他相信发展叙述技巧会加强将人物当作作者的他者进行再现的一般能力,詹姆斯最终也促成了这样一种小说艺术的确立:作为一种对其投射的社会有敌意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小说家成功地掩盖了其

艺术设计,冒着被指责为意识形态的同谋,以及在掩盖叙述形式的意识形态运作之后假装再现真实的风险。<sup>⑩</sup>在某种程度上,詹姆斯让他的设计明显可知,他可能就像阿特里奇称赞库切(Coetzee)那样,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另一种选择,一种不同的文学实践,乐意显露自己对习俗的依赖和在权力运用中自己的作用”(Attridge, 2004:17)。<sup>⑪</sup>朱迪思·巴特勒在这些方面称赞詹姆斯,认为他的叙述策略吸引读者进入伦理事件。但对于亚当·扎卡里·牛顿(Adam Zachary Newton)来说,因为叙事技巧的“极权主义”,在其中“作者‘权威’的运用……令人物受到文本的‘奴役’”(Newton, 1995: 129),詹姆斯的叙述安排理应受到道德谴责。再次申明我的观点:关于小说阅读的价值,我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或新伦理的批评、甚至列维纳斯式的批评家是正确的,而其他的自由人文主义者是错误的。我的目标是重温詹姆斯在促进小说形式理解中的作用,这种小说形式是一场角逐,发生在被界定为一种他异性的虚构人格的实现和损害、抑制或消灭这种实现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角逐。通过重温如此强有力地用小说形式运送他异性伦理价值的文学史,我们发现:创造“活生生的他者”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价值继续存在,即使对这种他异性效果最好在哪里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问题,小说家们已经在20世纪改变了我们的看法。

(译者注:因篇幅所限,本译文对原稿有所删减。)

#### 注释:

- ①见利维斯(Leavis)的“*What Maisie Knew*”,特别是第126、128页;班塔(Banta),第492页。
- ②比利(Bewley)称梅西最后已经“确实从精神上拯救了自己”,见第141页。
- ③加尔加诺(Gargano)支持发展模式,特别是第39页。
- ④比利也与《螺丝在拧紧》做了这种比较,见第108页。
- ⑤瑞安(Ryan)认为詹姆斯的意识模式与威廉·詹姆斯开创的意识模式相一致,见第860页。
- ⑥本段翻译得到华东师范大学金雯教授、云南大学王浩博士、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梁建华老师等学者的指点、启发,特此致谢!——译者注。
- ⑦参见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理解自由间接引证的例子,第18页,自由间接引语缩减了詹姆斯确立的叙述者和人物间的复杂和动态定位。
- ⑧康拉德(Conrad)将这种复杂性与美德关联起来,见第65页。
- ⑨参见克洛克(Krook),第59页。参见弗里德曼(Freedman)对世纪唯美主义(century aestheticism)转向的讨论。
- ⑩凡·根特(Van Ghent)是为数不多的认为詹姆斯的美学意识和道德意识哲学性地共存的批评家之一,见第218页。
- ⑪也参见艾克斯坦(Eckstein)对詹姆斯“收买”其人物的伦理批评,第177页;以及福斯(Foss)对詹姆斯和克劳德爵士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比较,第254页。
- ⑫文中只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梅西所知》(Heary James. *What Maisie Knew* [M]. New York: Oxford UP, 2008)。——译者注

#### 参考文献:

- [1]Attridge, Derek. J. M. *Coetzee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 Literature in the Event* [M].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2]Attridge, Derek. J. M.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3]Bewley, Marius. *The Complex Fate: Hawthorne, Henry James and Some Other American Writers* [M].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67.
- [4]Booth, Wayne C. Why Ethical Criticism Can Never Be Simple [G]// Todd F. Davis & Kenneth Womack. *Mapping the Ethical Turn: A Reader in Ethics,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1:16-29.
- [5]Conrad, Joseph. Henry James: An Appreciation (1904) [G]// Allan Ingram. *Joseph Conrad: 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hadow-Line*. New York: Methuen, 1986:63-66.
- [6]Eckstein, Barbara. Unsquaring the Squared Route of What Maisie Knew [J]. *The Henry James Review*, 1988(9):177-187.
- [7]Foss, Chris. Female Innocence as Other in The Portrait of a Lady and What Maisie Knew: Reassessing Feminist Recuperation of Henry James [J]. *Essays in Literature*, 1995(22):253-268.
- [8]Freedman, Jonathan. *Professions of Taste: Henry James, British Aestheticism, and Commodity Culture* [M].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0.
- [9]Gargano, James W. What Maisie Knew: The Evolution of a “Moral Sense”[J].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961(16):33-46.
- [10]James, Henry. *What Maisie Knew* [M]. New York: Oxford UP, 2008.
- [11]Kaston, Carren Osna. Houses of Fiction in What Maisie Knew [J]. *Criticism: A Quarterly for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1976(18):27-42.
- [12]Krook, Dorothea. *The Ordeal of Consciousness in Henry James* [M].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67.
- [13]Leavis, F. R. What Maisie Knew: A Disagreement by F. R. Leavis [G]// James, Henry et al. (eds.). *The Complex Fate: Hawthorne*. 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67:111-131.
- [14]McCall, Dan. What Maisie Saw [J]. *The Henry James Review*, 1995(16):48-52.
- [15]Mitchell, Juliet. What Maisie Knew: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Girl [G]// Goode, John. *The Air of Reality: New Essays on Henry James*. London: Methuen, 1972:168-189.
- [16]Newton, Adam Zachary. *Narrative Ethics* [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5.
- [17]Poirier, Richard. *The Comic Sense of Henry James: A Study of the Early Novels* [M]. New York: Oxford UP, 1960.
- [18]Ryan, Judith. The Vanishing Subject: Empirical Psychology and the Modern Novel [J]. *PMLA*, 1980(95):857-869.
- [19]Silverman, Kaja. Too Early/Too Late: Subjectivity and the Primal Scene in Henry James [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988(21):147-173.
- [20]Tanner, Tony. *Henry James: The Writer and His Work* [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5.
- [21]Teahan, Shelia. *The Rhetorical Logic of Henry James*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95.
- [22]Van Ghent, Dorothy. *The English Novel: Form and Function* [M]. New York: Harper, 1961.
- [23]Wood, James. *How Fiction Works*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 英语物理学语篇中的言据性动词<sup>①</sup>

杨信彰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言据性作为一种独特的语法范畴,关注的是信息的来源。由于英语语言缺少表示信息来源的形态标记,言据性主要通过其他词汇语法手段来体现。鉴于物理语篇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本文在韩礼德(Halliday)有关言据性论述的基础上,选取物理学教材和论著作为语料,借助语料库软件观察和分析感知动词、认知动词、意愿动词、情感动词和言语动词作为言据手段的行为,从而说明言据性动词在不同语篇类型呈现信息来源的特点。

**关键词:**言据性;言据性动词;物理学语篇

## Evidential Verbs in English Physics Texts

YANG Xinzhang

**Abstract:** As a unique grammatical category, evidentiality is concerned with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Since English lacks the morphological markers t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evidentiality is chiefly realized by other lexicogrammatical devices.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s in education and based upon Halliday's ideas of evidentialit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corpus-based study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vidential behavior of perceptive verbs, cognitive verbs, desiderative verbs, emotive verbs and verbal verbs in a physics textbook and academic articles, in the hope to show the way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presented by evidential verbs in different text types.

**Key words:** evidentiality; evidential verbs; physics text

### 0. 引言

言据性作为一种独特的词汇语法现象,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研究的角度也较多。言据手段散见于各类语篇之中,成为一种交互元话语标记(Hyland, 2005: 49),但言据手段的选择也受到语篇体裁的影响(Aikhenvald, 2004:379)。在词汇上,

---

作者简介:杨信彰,男,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研究。

动词的使用可看作言据手段的一种选择。由于物理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点科目,认识和掌握物理教材和论著的言据手段使用模式可帮助学习者更有效地获取物理知识,提高论文的写作能力。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基于以上思路,选择英语物理学教材和论著中表示言据的感知动词、认知动词、情感动词、意愿动词和言语动词进行探讨,旨在说明这些动词在物理教材和论著中呈现信息来源的特点。

### 1. 言据性的定义

言据性属于一种语法范畴,其基本作用是表示信息来源(Aikhenvald, 2003:25, 2004:3, 2006:320)。艾亨瓦尔德(Aikhenvald)(2003:7)认为言据性独立于情态和语气范畴,但也认为言据手段的延伸意义可与情态或或然性重叠,取决于具体的系统或言据手段的意义。

一些学者(如 Palmer, 1986, 2001; Aikhenvald, 2003, 2004)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言据性进行深入探讨,专门研究了作为语法范畴的言据性。由于各种语言都有表示信息来源的方式,艾亨瓦尔德(2003:2-3)根据世界上 500 多种语言的语法将言据系统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没有标明言据来源,只说明信息是间接获得的;第二类标明言据来自视觉、推论或他人报告。第二类还可细分为若干小类。语言不同和研究视角不同,言据的分类也不同。据艾亨瓦尔德(2003:3-6)的归纳,有的语言把言据性分为两类(如目睹与非目睹),有的语言的言据性分为三类(如视觉、推论和报告),有的语言分成四类(如视觉、非视觉、推论和报告),还有的语言分成五类,甚至更多。帕默(Palmer)(2001:22)的言据系统包括了感知言据和报告言据。感知言据分为视觉类、非视觉类和听觉类言据。报告言据进一步分为第二手报告、第三手报告和传言(Palmer, 2001:40)。帕默(2001:43-51)通过对诸多语言的观察,区分了直接言据和间接言据,指出在一些语言中常用的言据手段是视觉言据,而在其他一些语言视觉和听觉言据最常用,其他感知言据用得较少。阿勒斯(Arrese)(2011:206-210)的言据性分为经验言据、认知言据和交际言据,都属于认识立场标记语,每一种包含着直接言据和间接言据两个小类。可见,感知、推论和报告都是语言中重要的言据策略。

言据手段的使用反映了人们谈论知识和经验的方式。按照惠特(Whitt)(2009:20)的解释,视觉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手段,也是最可靠的手段,因此视觉感知动词自然就会使用得最多。惠特(2009:11)把通过感知获得的证据看作直接言据,把通过传言或者推论得到的证据看作间接言据,认为两者都和感知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用于推论的言据也是需要通过感知获得。感知是直接言据的突出代表,而传言则是间接言据的代表(Whitt, 2009:9)。

## 2. 言据手段和言据性动词

虽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语法范畴上的言据性,通过词缀来体现言据性,但所有的语言都有表示知识来源的词汇手段(Aikhenvald, 2003:1, 2004:10)。由于英语缺少呈现信息来源的固定形态手段,词汇手段成为英语表示言据的一种方法。切夫(Chafe)(1986:261)在研究英语会话和学术写作的言据性时认为英语的言据手段十分丰富。除了 say, hear 等感知动词之外,英语还有表示言据的其他手段,如情态动词、系动词以及 clearly、reportedly、surely 等副词(Aikhenvald, 2003:2; Whitt, 2009:15-19)和一些名词化的名词(Arrese, 2011:208-209)。在阿勒斯(2011)的模式中,感知动词(如 see、witness)成为经验言据的一种表达策略,心理动词(如 believe、know)属于表达认知言据的一种手段,言语动词(如 say、state)成为交际言据的一种表达手段。阿勒斯(2011)的心理动词相当于韩礼德(Halliday)(2014)的认知动词。

韩礼德(2004:604, 2014:676)把投射句、角度(angle)环境成分以及情态附加语看作表示信息来源的体现手段,但未对言据性做出专门的论述,而是将之放在投射现象的讨论中。韩礼德(2004:380, 2014:447)把投射分为言辞投射和思想投射,每一类再进一步分为并列型和主从型。在韩礼德(2014:509)看来,言语小句投射言辞,心理小句投射思想。这种言辞或思想在词汇语法上通常由限定性或非限定性小句所体现。韩礼德(2004:208, 2014:256)把心理小句中体现心理过程的动词分为四类:感知(如 sense、hear)、认知(如 think、know)、情感(如 like、please)和意愿(如 want、wish)。具体说来,英语中表示言据性的动词主要有言语小句中的言语动词以及心理小句中的感知动词、认知动词、情感动词和意愿动词等。由此可以看出,言语动词在言语小句能够帮助投射言辞,而心理动词在心理小句则能够帮助投射思想。

在感知动词和言语动词的研究方面,莱文(Levin)(1993)根据英语动词的句法行为和意义区分出了感知动词和交际动词。感知动词表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意义,包括 see、sound、feel、smell、taste 等动词(Levin, 1993:185-188)。莱文(1993:202-212)的交际动词相当于功能语法中的言语动词,包括 argue、ask、e-mail、tell、say、warn 等。这些动词包含了信息传递、说话方式或者交际工具方面的意义。惠特(2009)把感知动词分为两类:以主语为导向的感知动词和以宾语为导向的感知动词。在惠特(2009:21-22)看来,以主语为导向的感知动词属于描写施事者感知行为的及物动词,小句的语法主语为感知者。这类动词分为体验者感知动词和施事感知动词。前者关注感知行为,后者关注感知意图。以宾语为导向的感知动词的感知对象是句子的主语,属不及物动词。在认知动词方面,韩礼德(2004:206, 449)把投射和心理小句联系起来,认为心理小句投射了思想的内容,但还可呈现动作事件和事实(Halliday, 2014:251)。实际上,这类投射主要通过认知动词、感知动词、情感动词和意愿动词来体现言据。

可见,感知动词、认知动词、情感动词和意愿动词和言语动词在言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感知动词可呈现动作事件和事实,认知动词、情感动词和意愿动词可投射思想,而言语动词则可投射言辞。由于英语的言据性与具有言据性语法范畴的语言不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通过英语的这些动词及其施事,我们可看到言据是源自说话人/作者还是源自他人,了解言据是属于心理言据还是言语言据。

### 3. 物理教材和论著中的言据性动词

许多学者(如 Chafe, 1986:267; Aikhenvald, 2004:373; Hyland, 2005:96; Van Dijk, 2011: 38)把言据手段在学术语篇中的使用看作是观点可靠性的一种方法。例如切夫(1986:267)提到英语使用感知言据来表达推论的根据,使用 see、hear、feel 等显性的动词来表示信息的可靠性。但是语篇类型和学科领域不同,言据手段的使用也会存在差异。一些学者(如 Aikhenvald, 2004; Hyland, 2005; 陈明芳, 2008; 杨林秀, 2015)研究了言据手段的使用与类型语篇的关系。艾亨瓦尔德(2004)讨论言据手段在故事中使用时指出叙述习惯和内容会影响言据手段的选择。海兰德(Hyland)(2005)的研究表明科普文章和教材使用的言据手段比学术论文少。陈明芳(2008)根据研究动词、认知动词和话语动词的分类,对英语博士学位论文中的转述动词进行了研究,发现话语类转述动词出现最多。杨林秀(2015)探讨了英语学术论文中的研究手段,发现转述言据手段在英语为母语的学术论文的使用频率最高,在论文的引言部分使用最多。鉴于动词在英语言据性中的作用,同时考虑到物理语篇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选取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公司2005年出版的物理学教材《物理学:原理及问题》(*Physic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借助 AntConc 软件观察和分析教材中五类动词作为言据手段的行为。教材的正文部分共有 393141 个词,不包括教材中的目录、索引和附录。此外,为了便于参照,本文还分析了物理论著。这些论著包括坎农和史瓦莫吉(Cannon & Shivamoggi)(2006)编著的论文集《湍流的数学及物理学理论》(*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Theory of Turbulence*)以及《自然材料》(*Nature Materials*)、《自然光子学》(*Nature Photonics*)和《材料科学与工程报告》(*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期刊近三年发表的六篇论文(见 Berson et al., 2015; Gupta et al., 2015; Lesne et al., 2016; Berloff et al., 2017; Cole et al., 2017; Leijten et al., 2017),总词数为 183786 词。由于言据语义的复杂性,以下的分析主要依据韩礼德(2004, 2014)关于心理动词和言语动词的分类。

#### 3.1 感知动词

感知动词表示感知活动或者状态。韩礼德(2014:257)将感知动词看作体现心理过程的一类动词,列举了十个感知动词。拜伯(Biber)等人(1999:368-369)把感知动词归入心理动词,并通过语料库检索出词频大于每百万词 300 次的英语常用心理动词 23 个,其中有感知动词 see、feel、hear、listen。本文根据韩礼德(2004, 2014)和拜伯等人(1999)

的分析,结合语料检索所显示的词频列表 word list 和人工识别,检索教材中表示感知意义的动词。教材和论著中词频大于(或等于)2 的语料检索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感知动词的分布

感知动词	教材		论著		感知动词	教材		论著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detect	73	0.19331	11	0.05985	observe	168	0.42733	79	0.42985
examine	32	0.0814	11	0.05985	perceive	10	0.02544	0	0
feel	32	0.0814	3	0.01632	see	235	0.59775	157	0.85425
hear	54	0.13736	0	0	sense	6	0.01526	3	0.01632
listen	11	0.02798	0	0	sound	12	0.03052	0	0
look	148	0.37646	11	0.05985	touch	80	0.20349	0	0
note	107	0.27217	116	0.63117	watch	14	0.03561	2	0.01088
notice	90	0.22893	12	0.06529					

注:%指动词分别在两个原始语料中每一千个词的出现次数,下同。

从表 1 可以看出,视觉感知动词出现最多,而听觉感知动词和触觉感知动词出现很少,嗅觉感知动词和味觉感知动词不出现。这表明物理教材和论著主要关注的是视觉、听觉和触觉所感知的现象。但是,两类语篇也存在着差异。例如,hear 和 touch 在教材中分别出现 54 次和 80 次,但在论著中却未出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言据性指的是信息来源,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观察作为言据手段的动词,因此,分析需要排除感知动词的非言据用法。例如:

(1) Most people cannot hear sounds with frequencies below 20 Hz or above 16,000 Hz. (McGraw-Hill, 2005:406)

上例中的“hear”虽然是感知动词,但整个句子呈现的是个事件,作者并没有明确表示获知事件的途径和来源,因此本文未统计动词的这类用法。但在下例的“as perceived by our sense of hearing”中,“perceive”可看作言据手段的感知动词。

(2) The loudness of a sound, as perceived by our sense of hearing, depends primarily on the amplitude of the pressure wave. (McGraw-Hill, 2005:406)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主要考察表示言据意义的 V + 小句、as + Ved 以及作为插入

语的 N + V 结构,包括它们的变体。词频大于(或等于)2 的感知言据动词在物理教材和论著中的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感知言据动词的分布

感知动词	教材		论著		感知动词	教材		论著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examine	4	0.01017	0	0	perceive	3	0.00763	0	0
note	98	0.24927	78	0.42441	see	80	0.20349	48	0.26117
notice	60	0.15262	6	0.03265	watch	2	0.05087	0	0
observe	9	0.02289	15	0.08162					

从表 2 的情况看,两类语篇均使用视觉感知动词,但总体说来,两类语篇使用的感知言据动词不多,教材使用了七个,而论著只使用四个。论著更多地使用 see 和 note 这两个视觉感知动词,教材偏爱使用 note、see 和 notice。有趣的是,听觉动词、触觉动词、嗅觉动词和味觉动词作为言据手段的情况均未出现。因此,视觉感知动词构成物理语篇的一个显著特征。

### 3.2 认知动词

韩礼德(2014:517)列出了 21 个认知动词。拜伯等人(1999)未专门区分出认知动词,而是将认知动词归入心理动词这一类里。以下结合语料检索产生的词频列表,本文采用分析感知动词的方法,排除认知动词的非言据性用法,主要观察认知动词作为言据手段在两个语料库中的分布,词频大于(或等于)2 的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认知言据动词的分布

言语动词	教材		论著		言语动词	教材		论著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assume	105	0.26708	23	0.12515	imagine	14	0.03561	1	0.00544
believe	17	0.04324	7	0.03809	know	59	0.15007	28	0.15235
check	6	0.01526	0	0	predict	32	0.0814	0	0
conclude	26	0.06613	12	0.06529	realize	12	0.03052	3	0.01632
confirm	5	0.01272	6	0.03265	recall	68	0.17297	5	0.02721
consider	9	0.02289	2	0.01088	recognize	8	0.02035	1	0.00544
decide	13	0.03307	1	0.00544	remember	40	0.10175	2	0.01088
determine	55	0.1399	1	0.00544	study	3	0.00763	1	0.00544
discover	19	0.04833	0	0	suppose	164	0.41715	10	0.05441
estimate	4	0.01017	1	0.00544	think	16	0.0407	6	0.03265
expect	12	0.03052	30	0.16323	understand	11	0.02798	6	0.03265
find	56	0.14244	24	0.13059	wonder	9	0.02289	0	0

从表3可看出,物理教材使用了24个认知动词,论著使用了20个认知动词,表明物理语篇分布了多种认知心理过程,物理知识的构建涉及了多种认知心理活动。但是,表3显示,物理教材中认知动词的比重比论著要高,动词suppose和assume尤其明显。Suppose和assume主要出现在教材的习题和叙述里,句子使用的大多是祈使语气。教材编者通过认知动词的使用要求学习者进行假设推理,从而培养学习者这方面的能力。在例(3)中,动词“suppose”表示后接小句的命题内容来源于假设。

(3) Suppose a chimpanzee swings through the jungle on vines.  
(McGraw-Hill, 2005:309)

论著也有类似的情况。例(4)通过认知动词“suppose”使用祈使语气邀请读者共同假设所出现的事件。

(4) Now, suppose we repeat the experiment many times and ...  
(Cannon & Shivamoggi, 2006:169)

### 3.3 意愿动词和情感动词

韩礼德(2014:257)列出了15个意愿动词。拜伯等人(1999)未专门区分出意愿动词,而是将之归入心理动词。以下采用上述方法,着重考察意愿动词作为言据手段在两个语料库中的分布。语料中词频大于(或等于)2的意愿言据动词使用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意愿言据动词的分布

意愿动词	教材		论著		意愿动词	教材		论著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agree	2	0.00509	0	0	wish	6	0.01526	7	0.03809
plan	2	0.00509	0	0	would like	1	0.00254	4	0.02176
want	64	0.16279	5	0.02721					

从表4可以看出,作为言据手段的意愿动词在物理语篇中出现较少,但教材使用的意愿动词比论著多。want在教材中出现了64次,用以表示事件或动作出自于作者或读者的意愿。例如:

(5) You want the door to fit well on a cold winter day. (McGraw-Hill 2005:363)



例(5)通过意愿动词“want”来表示事件“the door to fit well on a cold winter day”源自于“you”的意愿。

韩礼德(2014:257)列出了 54 个情感动词。拜伯等人(1999:743)将之称作情感立场动词,并列出了语料库中的动词 38 个。结合语料检索的词频列表,本文考察情感动词作为言据手段在两个语料库中的分布,结果发现教材只出现两例的动词 prefer。这表明情感动词不是物理语篇的主要言据手段,叙述极少有情感介入。

### 3.4 言语动词

拜伯等人(1999:368-370)将言语动词称作交际动词,根据语料库的检索列出了词频大于每百万词 20 次的英语常用言语动词 67 个。韩礼德(2014:514)也列举了体现言语过程的动词 45 个。与感知动词一样,并非语料中所有的言语动词都用于表示信息来源而具有言据意义。因此,本文结合语料检索所显示的词频列表,采用以上分析言据性感知动词的方法,排除了非言据性用法,重点检索了言语动词作为言据手段在物理教材和论著中的分布情况。词频大于(或等于)2 的语料检索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言语言据动词分布

言语动词	教材		论著		言语动词	教材		论著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次数	%
argue	0	0	6	0.03265	propose	14	0.03561	10	0.05441
ask	9	0.02289	4	0.02176	remark	0	0	3	0.01632
claim	7	0.01781	3	0.01632	report	1	0.00254	7	0.03809
describe	64	0.16279	16	0.08706	say	52	0.13227	10	0.05441
discuss	4	0.01017	17	0.0925	state	59	0.15007	3	0.01632
explain	187	0.47566	3	0.01632	suggest	9	0.02289	3	0.01632
mention	1	0.00254	7	0.03809	tell	27	0.06868	5	0.02721
point out	0	0	15	0.08162					

表 5 说明,两类语篇在言语动词的使用上有细微的差别。与感知动词相比,教材和论著由于叙述和论证的需要,使用的言语动词比较丰富。但从次数和千分比来看,论著使用的言语动词相对比教材少。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使用 explain、describe、state 和 say。动词 explain 主要出现在教材的练习部分,使用的是祈使语气。教材编者通过动词 explain 要求学习者用语言解释一些物理问题,如下面的例(6):

(6) Explain how the significant digits were determined ... (McGraw-Hill, 2005 :25)

而 explain 在论著却出现在陈述语气中。例如:

(7) As explained in the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properties of transported fields involves the analysis of ... (Cannon & Shivamoggi, 2006:10)

例(7)使用的是陈述语气,通过言语动词 explain 说明了信息的渠道和来源。

以上观察了五类动词作为言据手段在物理教材和论著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在不同语篇,这些动词的使用也不相同,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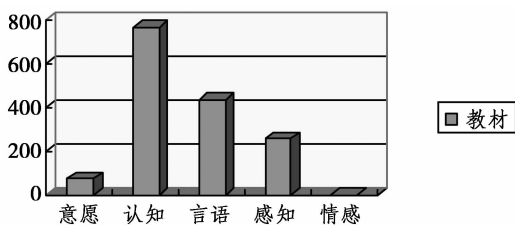


图 1 教材中的五类动词(单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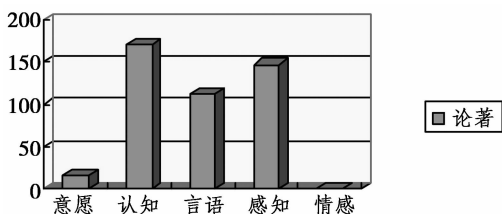


图 2 论著中的五类动词(单位:次)

图 1 和图 2 显示了五类动词作为言据手段分别在物理教材和论著中出现情况。认知动词在两种语篇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教材中,认知动词使用次数最多,其次是言语动词。在论著中,认知动词使用次数最多,其次是感知动词。这说明,物理知识不是全部能通过复杂的心理活动呈现的,还需要借助言语活动。

#### 4. 结语

以上分析并讨论了言据性动词在物理语篇中的大体分布情况。虽然言据性动词在物理语篇中的比重不大,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这些动词的使用趋向。首先,五类动词在教材中总共出现 1530 次(占教材语料的 3.8917%),在论著中出现 445 次(占论著

语料的 2.4213%)。可以看出,教材使用的言据性动词比论著多。同时我们还看到,言据性动词的使用与语气有着密切的联系。物理教材和论著较多使用视觉感知动词作为言据手段,通过视觉言据来表示通过视觉获得的信息以及可观察到的事实(Aikhenvald, 2004:373)。第二,物理教材和论著使用了多种认知心理过程,但物理教材使用的认知动词比论著多。教材编者通过认知动词的使用培养学习者的推理分析能力。第三,物理语篇使用较为丰富的言语动词,但教材使用的言语动词相对比论著多。第四,教材使用较多的认知动词和言语动词,而论著使用较多的感知动词和认知动词。这说明,物理知识不是全部能靠感官直接感知出来的,还需要通过言语和其他心理活动来表征。此外,这些动词在具体的使用中并非都具有言据性。了解和认识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了解物理学使用言据性动词的话语习惯,认识物理教材和论著呈现观点和物理知识的方式,能增强学习者的学科识读能力。

英语言据手段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英语缺乏表达言据意义的形态手段,许多言据意义是通过隐性方式体现的。例如:

(8) This is an inhomogeneous linear stochastic equation whose solution is easy to express via the matrix  $W(t)$ . (Cannon & Shivamoggi, 2006:14)

例(8)没有使用言据手段,其言据类型和来源比较模糊,取决于语境和读者的认识,可能是认知言据,也可能是言语言据或感知言据。

#### 注释:

①本文系作者根据第15届中国功能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写成。

#### 参考文献:

- [1] Aikhenvald, A. Y. Evidentialit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G] // Aikhenvald, A. Y. & R. M. W. Dixon (eds.). *Studies in Evidentialit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 [2] Aikhenvald, A. Y. *Evidential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Aikhenvald, A. Y. Evidentiality in Grammar [G] // Brown, K.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sup>nd</sup> edition) (vol. 4). Oxford: Elsevier, 2006.
- [4] Arrese, J. Effective vs. Epistemic Stance and Subjectivit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Legitimising Strategies and Mystif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G] // Hart, C. (e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1.
- [5] Berloff, N. G., Silva, M. et al. Realizing the Classical XY Hamiltonian in Polariton Simulators [DB/OL]. [2017-09-25]. *Nature Materials*, <http://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ncurrent/full/nmat4971.html>.
- [6] Berson, J., Burshtain, D. et al. Single-layer Ionic Conduction on Carboxyl-terminated Silane

- Monolayers Patterned by Constructive Lithography[J]. *Nature Materials*, 2015, 14: 613-621.
- [7] Biber, D., Johansson, S., Leech, G., Conrad S. & E. Finegan.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99.
- [8] Cannon, J. & B. Shivamoggi.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Theory of Turbulence* [G]. Raton, Boca. FL: Chapman & Hall/CRC, 2006.
- [9] Chafe, W. Evidentiality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and Academic Writing [G] // Chafe, W. & J. Nichol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1986.
- [10] Cole, D. C., Lamb, E. S. et al. Soliton Crystals in Kerr Resonators [J]. *Nature Photonics*, 2017, 11:671-676.
- [11] Gupta, S., Mahapatra, M. K. et al. Lanthanum Chromite Based Perovskites for Oxygen Transport Membrane [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 2015, 90: 1-36.
- [12]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3<sup>rd</sup> edition)* [M]. Revised by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4.
- [13] Halliday, M. A. K.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sup>th</sup> edition)* [M]. Revised by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14] Hyland, K. *Metadiscourse* [M]. London: Continuum, 2005.
- [15] Leijten, J., Seo, J. et al.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Controlled Hydrogels for Tissue Engineering [J].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 2017, 119:1-35.
- [16] Lesne, E., Fu, Y. et al. Highly Efficient and Tunable Spin-to-charge Conversion through Rashba Coupling at Oxide Interfaces [J]. *Nature Materials*, 2016, 15: 1261-1266.
- [17] Levin, B. *English Verb Classes and Altern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18] McGraw-Hill. *Physic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M]. Columbus, Ohio: Glencoe/McGraw-Hill, 2005.
- [19]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0]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2<sup>nd</sup> ed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1]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 J. Svartvik.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85.
- [22] van Dijk, T. A. Discourse, Knowledge, Power and Politics [G] // Hart, C. (e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1.
- [23] Whitt, R. J. *Evidentiality and Perception Verbs in English and German* [M]. Bern: Peter Lang, 2009.
- [24] 陈明芳. 学术语篇的转述和视角——基于英语博士学位论文文献综述的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25] 杨林秀. 英语学术论文中的言据性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责任编辑: 郭建辉

# 隐喻识解过程中可能性特征 提取的心理现实性:来自 ERPs 的证据

廖巧云<sup>1</sup> 胡 权<sup>2</sup> 潘 翔<sup>3</sup> 邱 晋<sup>4</sup> 姜 孟<sup>5</sup>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3. 重庆学为贵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 400010; 4.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74;  
5. 四川外国语大学 教务处, 重庆 400031)

**摘 要:**本文基于 ADRIM 模型,采用 ERPs 技术,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为被试,探讨了隐喻识解过程中可能性特征提取的心理现实性。实验采用单因素三水平被试内设计,实验材料以随机方式呈现。每组实验材料包括语境句、关键句(隐喻句或直义句或无关句)、探测词和陈述句;被试对探测词的真假做出判断,并判断陈述句的内容是否与前面语境句和关键句相符;实验记录被试判断探测词的反应时和脑电。实验结果显示:①对三类句子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进行比较,隐喻句条件时间最短,直义句条件居中,无关句条件最长;②对三类句子条件下探测词诱发的 N400 波幅进行比较,隐喻句条件诱发了显著的 N400,其波幅显著大于直义句,而且隐喻句和直义句条件均小于无关句条件。研究得出了如下初步结论:①汉语母语学习者在隐喻话语理解中的可能性特征提取具有心理现实性;②关于语义修辞话语识解机制的思辨性探讨获得了初步的电生理学证据支持。

**关键词:**隐喻;识解机制;事件相关电位;可能性特征提取;心理现实性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修辞的神经认知语言学研究”(11XYY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廖巧云,女,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认知神经语言学、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

胡 权,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

潘 翔,男,重庆学为贵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师,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

邱 晋,女,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和 ESP 教学研究。

姜 孟,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务处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应用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语言学及英语教学法研究。

##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the Possible Feature-Deriving Process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 Evidence from ERPs

LIAO Qiaoyun<sup>1</sup> HU Quan<sup>2</sup> PANG Xiang<sup>3</sup> QIU Jin<sup>4</sup> JIANG Meng<sup>5</sup>

**Abstract:** Based on ADRIM (the Annotation-Denotation Relevance-Inheritance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s ERP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the possible feature-deriving process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 with the ESL students as subjects. The experiment adopts “one factor-three levels within-subjects design” with randomly presented testing materials, each of which includes a context sentence, a key sentence (a metaphorical sentence, a literal sentence or an unrelated sentence), a probe word and a declarative sentence. While the participants are supposed to judge whether the probe word is true or false and whether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 is relevant to the previous context sentence and key sentence, the reaction time and the EEG data are record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As for the reaction times of the probe-word testing for the three types of sentences, metaphorical sentences are shorter than literal sentences, and unrelated sentences are longest; ②As for the N400 amplitudes, metaphorical sentences elicit more negative amplitudes than literal sentences, and unrelated sentences have the most negative amplitud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①Possible feature derivation is psychologically real in the subjects’ 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s; ②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is preliminarily verified in Liao’s speculative study of the construal mechanism of semantic rhetorics.

**Key words:** metaphor; comprehension mechanism;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possible feature-deriving process; psychological reality

### 0. 引言

隐喻修辞话语一直是众多领域关注的对象,许多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认知语用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语言学等角度对隐喻修辞话语的理解框架进行过探讨。所有这些研究均从不同角度对修辞话语识解机制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各自视角内部展开的,主要属于自洽性的论证过程,而较少将理论思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论证。

本文在 ADRIM(廖巧云,2015)框架理论性思辨的基础上,以近年来出现的语言理解涉身认知理论模型即“索引假设”(the Indexical Hypothesis, IH)(Glenberg & Robertson,1999,2000;Kaschak & Glenberg,2000;Glenberg & Kaschak,2002)这一理论框架及其在语言理解中的应用(鲁中义等,2009;姜孟、赵思思,2014)为参考,采用可供性提取的实验范式,通过 ERPs 技术,从心物随附性作用下进行可能性特征提取的角度对隐喻修辞话语的识解过程进行探讨,从可能性特征提取的心理现实性角度探究隐喻识解机制,即以实验验证思辨性研究结论,以期为理论探讨和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提供借鉴。

## 1. 隐喻修辞话语研究现状

### 1.1 隐喻修辞话语识解过程思辨性研究进展

近年来,概念整合理论(Lakoff & Johnson,1980;Lakoff & Turner,1989)、关联理论(Sperber,1984;Sperber & Wilson,1981,1995)、“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理论(徐盛桓,2007)等理论均先后被用于修辞话语分析(Croft & Cruse,2004:198,208-209;徐盛桓,2008;蒋严,2009;江晓红,2011),为修辞话语识解机制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理论对语义修辞的语义变异现象未能给予充分的解释,特别是“映射”“关联”等抽象概念需要进一步具体化。针对现存语言学理论及分析框架在解释语义修辞话语的识解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针对语义修辞识解机制不够具体和针对性不够强的问题,廖巧云(2015)采取“优势互补”的方法,运用内涵外延传承说(徐盛桓,2009)对 HCPM(整体性认知语用模型)(廖巧云、孟利君,2011)下辖的话语识解机理分析框架进行修补,提出了语义修辞识解模型 ADRIM(内涵外延关联传承模型)(廖巧云,2015)。根据该模型,隐喻修辞话语的识解机制可简述为:依靠相似性寻求最佳关联,通过关联—传承手段寻求事物间的内涵—外延关系,并依靠在心—物随附性作用下形成的能体现 A 与 B 两事物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特征,以构建“A 是 B”表达式,获得相对完备的表达,最后推导出讲话人交际意图的过程。其中,隐喻修辞话语识解过程中关键环节是可能性特征提取,这也是语义修辞话语与一般话语识解过程的主要区别。该模型对语义修辞话语识解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过,还没有人从实验研究的角度进行过验证。

### 1.2 隐喻修辞话语识解过程实证研究现状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隐喻修辞话语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关于隐喻修辞话语的 ERPs 研究主要涉及隐喻识解过程中的“映射”“联想”等机制的探讨。品特(Pynte)等(1996)应用 ERPs 手段考察隐喻理解的时间进程,刺激语料为在相关或不相关语境之后视觉呈现熟悉隐喻句、不熟悉隐喻句和直义句,研究发现,隐喻句较直义句诱发了更大的 N400 波幅,隐喻句需要认知主体付出更多的认知资源。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了语境效应,即无论隐喻句的熟悉程度如何,和处于相关语境的隐喻句相比,处于不相关语境的隐喻句会诱发更大的 N400 和较小的晚期正成分(LPC)。塔特尔(Tartter)等(2002)以字面义、语义违反义和隐喻义为刺激语料来验证隐喻理解的平行观假设,研究结果显示,隐喻句比字面义句诱发的 N400 波幅大,而比语义违反句诱发的 N400 波幅小。该结果支持隐喻理解的平行观假设。赖(Lai)等(2009)通过 ERPs 技术考察了常规隐喻和新异隐喻加工的神经机制,结果显示,与字面义句相比,语义违反句、新异隐喻句和常规隐喻句均诱发了更大的 N400 波幅。

赖和科伦(Lai & Curran,2013)通过句子启动和比喻启动两个实验进一步考察常

规隐喻和新异隐喻在识解过程中涉及的映射方式,实验要求被试在相关或不相关映射启动后阅读字面义句、常规隐喻句、新异隐喻句或语义违反句。研究表明,采用句子启动的映射更有利于常规隐喻的认知加工,采用比喻启动的映射在早期有助于新异隐喻的认知加工,而在晚期则更有利于常规隐喻的认知加工。他们认为,隐喻理解涉及两个不同概念域的映射(Coulson & Van Petten, 2002),且新异隐喻句的映射过程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心力。另外,赖和科伦的研究结果与阿祖安(Arzouan)等(2007)的研究发现一致,均验证了隐喻生涯模型(Bowdle & Gentner, 2005)。戈德斯坦(Goldstein)等(2012)以 N400 和 LPC 为研究指标,探讨相同刺激语料在经过被试自身解释后,新异隐喻和常规隐喻的认知加工过程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相较于没有释义的新异隐喻,已释义的新异隐喻诱发较小的 N400 和较大的 LPC 波幅,而常规隐喻则诱发了较大的 N400 和较小的 LPC 波幅。

王小潞(2009)进行的汉语隐喻识解机制 ERPs 研究结果显示,隐喻加工和本义加工诱发的 N400 存在显著差异;本义句、隐喻句、假句的大脑加工在某个时段或在某个特定脑区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情况是隐喻句比本义句诱发了更大的 N400,隐喻句的识解需要认知主体付出更大的处理努力。吴念阳等(2012)运用 ERPs 技术考察了汉语字面义与隐喻义理解时间进程的异同,结果显示,熟悉隐喻句和新奇隐喻句诱发的 N400 波幅均显著大于本义句,证明隐喻句的识解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资源。范琪(2014)进行了三个 ERPs 实验,得出结论认为,具身效应对隐喻认知加工有明显影响,体现为促进或延缓的作用。

上述关于隐喻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实验研究结果大都显示,隐喻句比字面句诱发了更大的 N400 波幅。总体而言,隐喻句较直义句理解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资源;新异隐喻比常规隐喻理解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资源。

综上所述,隐喻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从不同层面做出了较多合理的解释。但是隐喻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的空間还很大。第一,已有实验主要是对隐喻表达和字面义表达进行直接对比,这样的实验结果主要反映了两种表达方式的差异,而很难体现认知神经机制本身。第二,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作为基础。以往的研究多数未能提出一个隐喻识解机制研究的统一框架作为指导进行实验研究,即未提供一个隐喻识解框架并通过实验研究来证明其可行性。本文希望能够在隐喻修辞话语的实验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 2. 隐喻识解过程中可能性主特征提取的心理现实性研究

### 2.1 实验目的

实验基于 ADRIM,采用 ERPs 技术,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为被试,探讨隐喻识解的神经机制,即探讨隐喻修辞识解过程中可能性主特征提取的心理现实性。



## 2.2 实验方法

### 2.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是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 26 名研究生(17 名女生和 9 名男生),年龄在 22~28 岁,平均年龄 25 岁,汉语为母语,英语都已过专业八级,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神经或精神障碍。实验结束后每一名被试均获得适量报酬作为奖励。

### 2.2.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共有 28 组,包括 21 组探测词为真词的语料和 7 组探测词为假词的填充材料。28 组材料重复一次,最终实验材料有 56 组,每组 3 个刺激材料,共计 168 个刺激材料;每个刺激材料包含一个语篇(语境句+关键句)、一个探测词和一个陈述句;所有的语境句为 19~23 个字符,关键句为 5~7 个字符,探测词为 2 个字符,所有陈述句为 7~15 个字符。

为了确保实验材料的有效性,请 30 名不参加正式实验的被试在阅读完所有实验材料后,判断探测词与关键句的相关性,从极度不相关到极度相关共有 5 个等级。经过反复修改,最终所选的句子以及探测词都是被试高度熟悉的,即所有材料均是清楚、连贯、容易为被试所理解的。实验材料样例如下:

语境句:北京自古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具有重要地位,在当今中国,

关键句 a(隐喻):北京是心脏。

关键句 b(直义):北京是首都。

关键句 c(无关):北京是城市。

探测词:核心 (Yes)

陈述句:北京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地位。 (Yes)

## 2.3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三水平的被试内实验设计,设有三种条件的句子:隐喻句、直义句和无关句。这三种句子可进一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可能性特征可提取,该类又可分为可能性特征需提取(隐喻句)和可能性特征无需提取(直义句);另一类是可能性特征不可提取(无关句),具体由关键句中的关键词决定。隐喻句属于可能性特征需提取的类型;可能性特征可提取句的关键词可以提供相应的可能性特征,被试在识解隐喻句时,若能成功提取体现本体和喻体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特征,则对探测词的真假判断具有促进作用,从而表现为隐喻句和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诱发的脑电波幅差异较小。相反,无关句属于可能性特征不可提取的类型,关键词在可能性特征不可提取句中不能提供可应用的可能性特征,因此,被试在识解无关句时,由于可能性特征不能被提取,语篇显得不连贯,对探测词的真假判断无法产生促进作用。

## 2.4 实验过程

### 2.4.1 刺激呈现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 500ms 的注视点“+”提醒被试注意,然后呈现空屏 500ms,接下来在屏幕中央呈现语境句,呈现时间为 3500ms,之后自动消失;之后呈现空屏 500ms,接着呈现关键词,2000ms 后自动消失;之后呈现空屏 500ms,接着呈现探测词 500ms,设置为“反应消失”(若被试未能在 500ms 内完成判断,呈现设置为“反应消失”的空屏以供被试判断),并记录探测词的脑电、反应时和准确率。之后,再呈现空屏 500ms,接着呈现陈述句,同时设置“反应消失”,被试理解并判断该陈述句的意思与先前的语境含义是否一致,记录准确率数据。最后,呈现空屏 600~800ms,进入下一试次。每个试次均要求被试在阅读理解语境句与关键词后,对探测词与陈述句分别做出“真假”和“正误”判断,并按“F”或“J”键做出反应,分别表示“真/正”和“假/误”。对于两个任务,被试的按键反应均在“F”与“J”之间做了平衡设计。实验前设有练习,中间设有休息。

### 2.4.2 脑电记录

本实验采用 Neuroscan 64 导联 Ag/AgCl 电极帽。双侧乳突作为参考电极,记录水平眼电和垂直眼电。脑电分析时程为 1200ms,含刺激前 200ms 的基线矫正。滤波带通为 0.05~200Hz,采样频率为 1000Hz,电极与头皮接触电阻小于 5k $\Omega$ 。离线分析行为数据和脑电数据。

## 2.5 数据处理和分析

### 2.5.1 行为数据结果

26 名被试参加实验,其中 2 名被试的结果伪迹过多,被删除,最终对 24 名被试的行为数据结果进行分析。通过 SPSS19.0 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得到表 1 所示结果。

表 1 隐喻句、直义句和无关句三种条件下  
探测词真假判断的行为数据结果

句子类别	被试数	平均反应时/ms	探测词正确率/%	陈述句正确率/%
隐喻句	24	782.33 $\pm$ 115.92	99.80 $\pm$ 0.573	81.20 $\pm$ 3.665
直义句	24	882.96 $\pm$ 180.65	99.53 $\pm$ 0.841	81.99 $\pm$ 3.851
无关句	24	957.38 $\pm$ 320.73	100 $\pm$ 0.000	80.88 $\pm$ 4.884

从表 1 可以看出,直义句、隐喻句和无关句三种条件下的陈述句正误判断准确率都较高,表明被试认真参与实验,理解句子的意思。三种句子条件下的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结果为:隐喻句条件下的探测词反应时为 782.33ms,直义句条件下为 882.96ms,无关句条件下为 957.38ms。很明显,被试对于隐喻句条件下探测词的反应

时间最短,其次为直义句条件下,无关句条件下反应时间最长。

对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隐喻句和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t(23) = -3.189, p = 0.004 < 0.01]$ ,隐喻句和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存在非常显著差异 $[t(23) = -3.226, p = 0.004 < 0.01]$ ,而直义句和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 $[t(23) = -1.260, p = 0.220 > 0.05]$ 。总之,隐喻句条件下反应时间最短,直义句条件次之,无关句条件最长。

### 2.5.2 ERPs 数据结果

本实验采用 Neuroscan 4.5 对采集的脑电数据进行离线分析。对 15 个电极(FPZ、FP1、FP2、FZ、FCZ、F3、F4、CZ、C3、C4、CPZ、PZ、P3、P4、POZ)的脑电数据进行分析,图 1 显示了探测词真假判断时部分电极上的脑电图。由于三种句子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类型在顶区未显示差异,所以未呈现脑电图,只呈现其中 9 个电极的脑电图。

脑电数据分析采用  $3 \times 3 \times 3$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即三种条件(隐喻句、直义句、无关句)、脑区(额区、中央区、顶区)与半球(左、中、右)。最后,我们选择 310 ~ 560ms 时间窗对脑电数据展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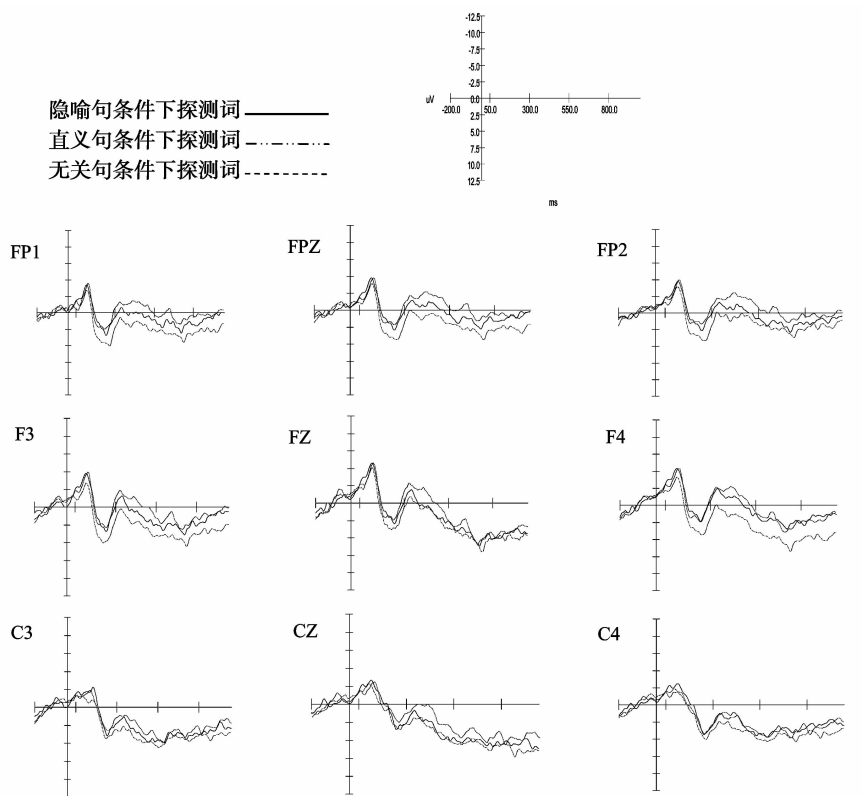


图 1 隐喻句、直义句和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诱发的脑电图

在 310 ~ 560ms 时间窗内,主要 ERPs 成分是涉及语义加工的 N400。对隐喻句、直义句和无关句三种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诱发的 N400 平均波幅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句子主效应非常显著[ $F(2,46) = 5.707, p = 0.006$ ],脑区主效应极其显著[ $F(2,46) = 106.829, p = 0.000$ ],半球主效应非常显著[ $F(2,46) = 6.266, p = 0.004$ ],句子条件和脑区交互作用极其显著[ $F(4,92) = 7.326, p = 0.000$ ],句子条件和半球交互作用显著[ $F(4,92) = 2.774, p = 0.032$ ],脑区和半球交互作用极其显著[ $F(4,92) = 18.073, p = 0.000$ ],句子条件、脑区和半球三者交互作用非常显著[ $F(8,184) = 2.737, p = 0.007$ ]。

由于句子条件和脑区交互作用显著[ $F(4,92) = 7.326, p = 0.000$ ],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表 3 和表 4 所示。表 2 表明,隐喻句和直义句加工在额区(FP1、FP2)上存在显著差异,且隐喻句比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诱发的 N400 波幅更负。表 3 表明,隐喻句和无关句加工在额区(FP1、FP2、FZ、F3)和中央区(CZ)上呈现显著甚至非常显著差异,且无关句比隐喻句条件下探测词诱发的 N400 波幅更负。表 4 表明,直义句与无关句加工在额区(FPZ、FP1、FP2、FZ、F3、F4)和中央区(CZ、C3)上呈现显著甚至非常显著差异。综合上述三个表的结果,发现三种条件下探测词诱发的 N400 波幅:无关句最大,隐喻句次之,直义句最小。

表 2 隐喻句与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诱发的  
N400 平均波幅配对样本 T 检验

指标 电极	隐喻句	直义句	T 值	自由度	显著值(双尾)
FP1	-2.94 ± 2.32	-1.37 ± 2.66	-2.140	23	.043*
FPZ	-3.53 ± 2.44	-2.12 ± 3.02	1.816	23	.082
FP2	-3.34 ± 2.75	-1.82 ± 2.69	-2.439	23	.023*
F3	-2.79 ± 1.89	-1.69 ± 3.52	-1.548	23	.135
FZ	-3.38 ± 3.36	-3.44 ± 3.51	0.094	23	.926
F4	-3.79 ± 2.24	-2.19 ± 3.71	-1.905	23	.069
C3	0.10 ± 1.51	0.72 ± 2.26	-1.473	23	.154
CZ	-0.64 ± 2.31	-0.52 ± 2.82	-0.224	23	.825
C4	-0.55 ± 2.09	0.19 ± 2.59	-1.745	23	.094

\* 差异显著( $p \leq 0.05$ )

表 3 隐喻句与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诱发的  
N400 平均波幅配对样本 T 检验

指标 电极	隐喻句	无关句	T 值	自由度	显著值(双尾)
FP1	-2.94 ± 2.32	-4.29 ± 3.02	2.547	23	.018*
FPZ	-3.53 ± 2.44	-4.74 ± 2.86	2.058	23	.051
FP2	-3.34 ± 2.75	-4.62 ± 3.05	2.136	23	.044*
F3	-2.79 ± 1.89	-4.30 ± 2.47	2.852	23	.009**
FZ	-3.38 ± 3.36	-5.21 ± 4.01	2.739	23	.012*
F4	-3.79 ± 2.24	-4.81 ± 3.16	1.644	23	.114
C3	0.10 ± 1.51	-0.64 ± 2.17	1.735	23	.096
CZ	-0.64 ± 2.31	-2.13 ± 2.64	2.503	23	.020*
C4	-0.55 ± 2.10	-0.74 ± 2.80	0.360	23	.722

\* 差异显著( $p \leq 0.05$ )

\*\* 差异非常显著( $p \leq 0.01$ )

表 4 直义句与无关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诱发的  
N400 平均波幅配对样本 T 检验

指标 电极	直义句	无关句	T 值	自由度	显著值(双尾)
FP1	-1.37 ± 2.66	-4.29 ± 3.02	5.244	23	.000***
FPZ	-2.12 ± 3.02	-4.74 ± 2.86	4.947	23	.000***
FP2	-1.82 ± 2.69	-4.62 ± 3.05	6.157	23	.000***
F3	-1.69 ± 3.52	-4.30 ± 2.47	3.924	23	.001***
FZ	-3.44 ± 3.51	-5.21 ± 4.01	2.963	23	.007**
F4	-2.19 ± 3.71	-4.81 ± 3.16	3.836	23	.001***
C3	0.72 ± 2.26	-0.64 ± 2.17	2.785	23	.011*
CZ	-0.52 ± 2.82	-2.13 ± 2.64	2.806	23	.010**
C4	0.19 ± 2.59	-0.74 ± 2.80	1.936	23	.065

\* 差异显著( $p \leq 0.05$ )

\*\* 差异非常显著( $p \leq 0.01$ )

\*\*\* 差异极其显著( $p \leq 0.001$ )

### 3. 讨论

#### 3.1 隐喻识解过程中可能性特征提取的心理现实性

##### 3.1.1 行为数据结果反映的可能性特征提取情况

行为数据结果证实了隐喻识解过程中可能性特征提取具有心理现实性,可能性特征提取有助于促进修辞话语的识解。对反应时的分析发现,探测词在无关句条件下反应时最长,直义句条件下其次,隐喻句条件下最短。这一结果表面上看似与以往研究结果不相符合,或者不符合一般预期,但这一结果恰好证明了本研究要论证的思辨性结论,即被试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发生了可能性特征的提取。

根据本实验的原理,被试需要先阅读语境句,然后对随机呈现的关键句进行理解并完成探测词真假判断的任务;被试在语境句的作用下,对关键句的语义信息产生了预期的心理期待。因此,当所呈现的关键句为符合该语境下最常用的隐喻性表达时,被试成功提取了该隐喻信息的可能性特征,因此被试在完成了完整的语义通达之后,即当探测词与被试在理解隐喻时提取的可能性特征相符时,探测词的真假判断的反应时间会缩短,更快速地做出判断。此时的直义句虽然在语义通达难度上最低,但是却不是该语境下所期待的话语类型,因此探测词真假判断的反应时要长于隐喻句条件下的情况;无关句条件下的探测词判断反应时最长,这主要是因为当呈现的关键句与语境信息无关时,被试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该冲突,因此在进行探测词判断时会受到前面“适应”过程的影响,因而所需反应时最长。

直义句和隐喻句属于可能性特征可提取的类型,它们的反应时均比可能性特征不可提取的无关句反应时短,因此,行为数据结果总体上能够支持以下结论:隐喻识解过程中可能性特征提取具有心理现实性,可能性特征提取有助于促进修辞话语的识解。

##### 3.1.2 反映语义加工阶段的可能性特征提取情况

本研究的 N400 波幅与预期基本一致,无关句条件下的 N400 波幅最大,隐喻句条件下次之,直义句条件下最小;隐喻句和直义句条件下探测词真假判断诱发的 N400 差异只体现在 FP1 和 FP2 两个电极,存在的差异相对较小。这一结果与品特等(1996)的结果有相似之处:和处于相关语境的隐喻句相比,处于不相关语境的隐喻句会诱发更大的 N400。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是,戈德斯坦等(2012)的研究显示,与没有释义的新异隐喻相比,已释义的新异隐喻诱发较小的 N400。这些研究均表明语境对话语理解有限定作用。(姜孟等,2016;亚瑟·M·格琳柏格等,2017)

本研究的实验过程中,由于语境的作用,被试对隐喻所隐含的可能性特征已经有

预期,当出现探测词时,被试能够很快实现探测词与关键词的语义匹配,也就是说,语境句和关键句对探测词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直义句条件下的探测词来说,探测词与关键句中的关键词的语义几乎是对等的,属于同义词,被试可直接联系起来。与此相反,无关句则无法为其探测词真假判断提供可能性特征的预期,无法实现探测词与关键词的语义匹配,也就是说,语境句和关键句对探测词真假判断不具有促进作用。本实验中被试通过提取可能性特征,有效促进了探测词真假判断的过程。

以上几个方面的结果显示,可能性特征可提取话语对探测词“真假”判断任务产生了促进作用。这说明,被试成功地为理解隐喻话语提取了所需要的可能性特征,即说,可能性特征提取过程,对于修辞话语理解具有心理现实性。

### 3.2 对语义修辞识解过程的思辨性结论的证实

#### 3.2.1 可能性特征提取反映了修辞理解的心智过程

语义修辞识解过程中的可能性特征提取是一种心智活动。听话人需要将显性表述补足阐释为隐性表述,将显性表述隐含的内容甚至许多在该语境中难于用语言明言的知识呈现出来,用以解释修辞的意义和推导说话人的意图。语义修辞表达了主体感觉到了修辞对象 A 之后所产生的那种既不像 A 又在某方面有点像 A 的感受;用这种感受来解释语义修辞话语,就成为体现了主体意向性的解释。

可能性特征提取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受到意向性操控的一个选择过程,是在一个系统中进行的选择。韩礼德认为(Halliday,2004),能够进入“同一个系统”的入列条件就是所有选项“既相同又相异”,既要有共同的语义域,也要有差异,否则就无法进行选择。也就是说,“相异点”为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也是进行选择的原因之一。我们能够在众多不同特征中进行选择,是可能性特征提取的必要条件;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受意向性操控的过程。

语义修辞识解过程中的可能性特征提取是人类基于心物随附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外界纷繁复杂的世界认知性的关联总结,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和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对人类有限的语言表达的创造性拓展。

#### 3.2.2 修辞话语的通达体现了格式塔效应

在修辞话语加工过程中,格式塔效应将具有常规关系的对象表征为一个整体,依靠“相关关系”(徐盛恒,2016),“使得零碎的、不相关的、缺乏逻辑关系的对象形成一个具有良好形状的整体”(廖巧云,2008)。

修辞话语识解过程有效依赖格式塔转换。在该过程中,可能性特征提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心物随附性作用下的概念内涵多次的传承转换等过程。不过,对熟悉修辞而言,这样的转换过程较为快速而不被特别关注。格式塔转换涉及到可能

性特征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说,认知主体需要在心物随附性作用下选择合适的可能性特征并依此构建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

基于“依赖”与“自主”并存的心物随附性,一方面,一个物理事件不能随意激发出任何的心理属性,以避免让世界变得不可知;另一方面,一个物理事件能够激发出不同的心理感受,从而使语言表达丰富多彩。正因如此,我们能够基于一定语境,有效提取修辞相关的可能性特征。

### 3.2.3 内涵外延关联传承是修辞识解的有效手段

语义修辞是语义变异的结果,也就意味着认知关系的改变,是一种非常规的认知方式。语义变异意味着修辞表达与常规意义是不同的,由此也带来识解过程的差异,特别是可能性特征提取过程就更为复杂。所谓语义变异,其实就是人们关于大脑中已有心理模型受到一定方式或一定程度的改变。内涵外延关联—传承在修辞话语识解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因为有内涵外延关联—传承的主导作用,修辞话语所涉及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能够得以构建因而可能性特征得以提取。例如,“The surgeon is a butcher”中,“A is B”是“把A看作B”。“外科医生”这一概念与隐喻有关的部分内涵内容,“是以百科知识为基础的”(Croft and Cruse, 2004:208);“屠宰者”也一样。通过“外延内涵传承”,人们便能提取反映“外科医生”和“屠宰者”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特征。

## 4. 结语

本文基于ADIRIM,采用ERPs技术,对隐喻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了探索。首先,行为数据和脑电数据的分析结果都能够支持隐喻识解过程中可能性特征提取具有心理现实性这一假设,即是说,在隐喻修辞话语识解过程中可能性特征提取具有心理现实性。其次,廖巧云(2015)对修辞话语识解机制的思辨性探讨获得了初步的电生理学证据支持。可能性特征提取反映了修辞理解的心智过程;修辞话语的通达体现了格式塔效应;内涵外延关联传承是修辞识解的有效手段。第三,本实验研究对已有研究结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我们的研究说明修辞性话语加工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许多因素如熟悉度和语境等都不是单一地影响它们的加工,这些因素通常会交织在一起,对隐喻修辞话语的加工产生影响。本研究为其他修辞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 参考文献:

- [1]Arzouan, Y., Goldstein, A. & M. Faust. Brainwaves Are Stethoscopes: ERP Correlates of Novel Metaphor Comprehension [J]. *Brain Research*, 2007(1160): 69-81.



- [2] Bowdle, B. & D. Gentner. The Career of Metaphor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5 (112): 193-216.
- [3] Coulson, S. & C. Van Pette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Metaphor: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J]. *Memory & Cognition*, 2002 (6): 958-968.
- [4] Croft, W. & D. A.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5] Glenberg, A. & D. Robertson. Indexical Understanding of Instructions [J]. *Discourse Processes*, 1999 (28): 1-26.
- [6] Glenberg, A. & D. Robertson. Symbol Grounding and Meaning: A Comparison of High-dimensional and Embodied Theories of Meaning [J]. *Journal of Memory & Language*, 2000(43): 379-401.
- [7] Glenberg, A. & M. Kaschak. Grounding Language in Action [J].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2002 (9): 558-565.
- [8] Goldstein, A., Arzouan, Y. & M. Faust. Killing a Novel Metaphor and Reviving a Dead One: ERP Correlates of Metaphor Conventionalization [J]. *Brain and Language*, 2012, 123(2): 137-142.
- [9]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 [10] Kaschak, M. P. & A. M. Glenberg. Constructing Meaning: The Role of Affordances and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0 (43): 508-529.
- [11] Lai, V. T. & T. Curran. ERP Evidence for Conceptual Mappings and Comparison Processes During the Comprehension of Conventional and Novel Metaphors [J]. *Brain and Language*, 2013, 127(3): 484-496.
- [12] Lai, V. T., Curran, T. & L. Menn. Comprehending Conventional and Novel Metaphors: An ERP Study [J]. *Brain Research*, 2009(1284): 145-155.
- [13]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4] 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15] Pynte, J., Besson, M., Robichon, F. H. & J. Poli. The Time-course of Metaphor Comprehension: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J]. *Brain and Language*, 1996, 55(3): 293-316.
- [16] Sperber, D. Verbal Irony: Pretense and Echoic Mention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84, 113(1): 130-136.
- [17] Sperber, D. & D. Wilson. Irony and the Use-mention Distinction [G] // Cole, P. (ed.) *Radical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295-318.
- [18]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5.
- [19] Tartter, V. C., Gomes, H., Dubrovsky, B., Molholm, S. & R. V. Stewart. Novel Metaphors Appear Anomalous at Least Momentarily: Evidence from N400 [J]. *Brain and Language*, 2002, 80 (3): 488-509.

- [20] 范琪. 汉语隐喻具身认知加工神经机制的 ERP 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 [21] 姜孟, 田莉莉, 曹颖. 人类概念系统[J]. 英语研究, 2016(1): 92-110.
- [22] 姜孟, 赵思思. 话语理解过程的可供性提取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4): 584-595.
- [23] 江晓红. 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探究: 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整合分析模式 [J]. 现代外语, 2011 (1): 34-41.
- [24] 蒋严. 关联理论与汉语修辞研究 [G] // 陈汝东. 修辞学论文集(第 12 集).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76-84.
- [25] 廖巧云. 基于“心理模型”的语篇识解模型 [J]. 外语学刊, 2008 (4): 91-95.
- [26] 廖巧云. 语义修辞识解机制分析框架: ADRIM. 第九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论文 [G].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15.
- [27] 廖巧云, 孟利君. 因果构式研究的整体性认知语用框架: HCPM [J]. 外国语文, 2011 (6): 58-63.
- [28] 鲁忠义, 陈笕桥, 邵一杰. 语篇理解中动允性信息的提取 [J]. 心理学报, 2009 (9): 793-801.
- [29] 王小潞. 汉语隐喻认知与 ERP 神经成像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30] 吴念阳, 陈俊卿, 居银, 白洁, 马子凤. 汉语隐喻理解时程的 ERPs 研究 [J]. 心理学报, 2012, 35 (4): 811-816.
- [31] 徐盛桓. 基于模型的语用推理 [J]. 外国语, 2007 (3): 2-9.
- [32] 徐盛桓. 隐喻为什么可能 [J]. 外语教学, 2008 (3): 1-7.
- [33] 徐盛桓. 外延内涵传承说——转喻机理新论 [J]. 外国语, 2009 (3): 2-9.
- [34] 徐盛桓. 第四范式: 语言研究的新理念 [J]. 英语研究, 2016(2): 76-87.
- [35] 亚瑟·M. 格林柏格. 阅读理解的涉身性及其意义 [J]. 姜孟, 等译. 英语研究, 2017(1): 105-117.
- [35] 张辉. 熟语表征与加工的神经认知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朱晓云

# 英语小句及物性的语义偏离路径

王惠静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及物性作为动词特征的观点有其局限性。本文将及物性看作小句特征,及物性高低不同的小句共同构成一个典型范畴,体现典型效应,有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之分。非典型及物性与典型及物性的差异体现为语义偏离。及物性的意义是及物事件类型及其参与者的概念化,因此及物性偏离可根据小句所勾勒事件的类型、施事、受事语义特征参数缺失情况来判断。参数数量和类型以不同方式引起小句及物性不同程度地偏离典型及物性,并涉及转喻等认知机制。

**关键词:**小句及物性;及物性偏离;语义特征参数

## Semantic Deviation of English Clausal Transitivity

WANG Huijing

**Abstract:** The view of transitivity as a property of the verb has been questioned for its explanatory deficiency. In this paper, transitivity is defined as a property of the clause, and all claus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transitivity constitute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exhibiting prototypical effect with typical and atypical members. The semantic extension from prototypical transitivity to atypical transitivity is called transitivity deviation. As the semantic basis of transitivity i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ransitive event and its participants, the degree and pattern of transitivity deviation could be judged by the semantic factors in terms of event type, agent and patient. Both the number and type of semantic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to find the specific degree and pattern of semantic deviation of clausal transitivity. Metonymy is also found at work in transitivity deviation.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认知语言学理论建设与汉语的认知研究”(15ZDB099)及重庆市2016年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认知语法视角下语言及物性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2016YBY078)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王惠静,女,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重庆市重点文科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言教学、认知视角的英汉对比研究。

**Key words:** clausal transitivity; transitivity deviation; semantic factors

## 0. 引言

早期将及物性看作动词特征、与动词论元数量有关的二分法观点已受到诸多质疑和挑战(如 Rice, 1987; Tsunoda, 1999 等)。到目前为止,学界多数学者赞同将及物性看作小句特征,认为及物性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分概念,而是有不同高低程度的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Hopper & Thompson, 1980; Delancy, 1987; 王志军, 2004; 刘正光、崔刚, 2005; 吴义诚、李艳芳, 2014 等)。那么,及物性的程度高低如何判断?及物性的程度高低差异如何界定?差异方式和路径能否作较为细化地描述?本文拟以认知语法理论为分析工具,将及物性程度差异看作从典型到非典型的偏离,提出及物性偏离程度的判断参数,以此为基础较为细致地描绘及物性偏离的认知路径,以期对及物性的内部体系作出更详细的解释。

## 1. 英语小句及物性与及物性偏离

### 1.1 作为小句特征的及物性

前期的传统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关系语法等都从语言形式出发,将及物性看作动词的特征,根据动词是否带宾语来判断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如 Hartmann & Stork, 1972; La Palombara, 1976 等)。格语法和角色参照语法增加了语义考察,但依然认为及物性是动词特征,只有及物与不及物之分。这些观点与语言事实并不相符,无法解释及物动词的不及物化、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以及相同形式的及物小句却存在不同的句法行为等语言现象(王惠静、文旭, 2017: 13)。

本文以类型学的及物性观点为基础,在认知语法理论框架下,将及物性看作小句特征。认知语法视角的小句及物性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为及物性是及物小句的语义极。兰盖克(Langacker, 1987)指出,语言是象征性的符号单位,每一个语言符号由语义极和语音极构成。英语及物小句属于较为复杂的象征符号,与该符号形式配对的语义极为及物性。第二层含义是及物性以及物事件为概念基础。概念结构和理性不可能用形式逻辑来精确描述,但可以用认知模型来描写(文旭, 2001: 31)。及物性作为一个语义概念,是及物小句句法形式所勾勒的及物事件及事件参与者关系的概念化。典型及物性的概念意义为高度抽象化的典型及物事件模型,该模型的基础为两个移动事体相互接触后产生能量传递,致使一个事体发生性质变化。第三层含义是及物性范畴观。具体使用中的语言存在诸多介于及物与不及物之间的中间地带,形成一个连续体,而不仅仅是及物与不及物的二元对立。所有及物小句构成一个范畴,范畴成员为具体的及物小句,其及物性高低存在不同,因而在范畴中的地位有差异,体现典型效应(王惠静, 2017: 139)。

## 1.2 及物性偏离

及物性的范畴观说明,及物性是一个度的问题,在范畴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及物小句呈现高低不同的及物性,具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典型及物性的意义在概念层次上是两个事体之间具有能量传递的典型事件模型。及物事件以及作为事件参与者的施事和受事在语义特征上都有可能降低及物性的高低,体现为大量非典型及物小句。从实际语言现象观察可看出,在及物性范畴内,具有不同及物性高低的非典型及物小句与典型及物性小句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呈现从典型到非典型的延伸,我们把这种延伸称为及物性偏离。具体而言,有些小句体现的及物性较高,与典型及物性偏离较小;有些小句体现的及物性较低,与典型及物性偏离较大;还有些小句及物性极低或无及物性,与典型及物性存在极大偏离。

及物性偏离程度和路径与事件所处的认知域、事件类型、参与者语义角色等有关,总体可分为认知域之间的偏离和认知域内的偏离。认知域之间的偏离将另文论述,本文主要聚焦同一认知域内的偏离。从事件类型和参与者(施事与受事)的语义角色来看,及物性的域内偏离包括事件类型偏离、施事偏离和受事偏离。

## 2. 及物性语义偏离判断参数

要描述及物性偏离路径,首先需要构建及物性偏离程度的判断标准。如上文所述,客观事件很可能与典型事件不完全一致。即便一致,由于认知主体的识解方式不同,也可能表达为体现非典型及物性的非典型及物小句。显然,及物性偏离典型的现象具有普遍性,英语小句的及物性高低也随之出现高低变化,不同程度地偏离典型。为判断小句及物性高低,霍伯和汤普森(Hopper & Thompson, 1980)列举了一系列特征,但这些特征是语义和句法特征的混合,很难加以判断。角田太作(Tsunoda, 1999)对霍伯、汤普森的特征作了修正,但他的参数列表更多地列举了句法特征,忽略了语义的重要性,导致判断精确度不够(王惠静、文旭,2017)。认知语法主张语义是句法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及物性本是一个语义概念,因此对及物性的判断应主要依赖语义特征或小句内部语义关系,句法特征只是语义特征通过语言编码的外在表现而已。

从语义出发判断及物性语义偏离,我们可以凭小句的典型及物性语义特征为依据。典型及物性的概念语义为典型事件模型。基于该模型,可将典型及物性的语义特征细分为不同的语义特征参数,形成判断语义偏离的标准,这些语义特征参数包括:事件类型、施事和受事。如果小句具有以上三方面的所有语义特征,那么该小句就体现出典型及物性,小句及物性也最高。如果小句只有部分语义特征,那么小句所体现的及物性就偏离典型。典型及物性事件类型、施事、受事语义参数特征列举如下:

事件类型语义特征参数:[完成性]、[瞬时性]、[动态性]、[致使性]、[接触]、[单向性]、[不对称性]、[能量传递]。

施事语义特征参数:[意志性]、[有生命]、[人类]、[施动性]。

受事语义特征参数有:[无生命]、[非人类]、[性质变化]、[个体化]、[已存在]、[受控性]。

根据以上语义特征参数,下例子属于典型及物小句。

(1) John damaged Mary's car.

例(1)中的动词“damage”勾勒出具有单向能量传递的致使性事件。动作发出者“John”与受事“car”发生接触,将能量传递给“汽车”,并导致受事“汽车”发生性质变化。小句勾勒的事件类型及两个参与者的语义特征完全符合所有语义特征参数,是典型及物小句。需要指出的是,这三方面的语义参数并非同等重要,最为核心的参数为[能量传递]。如果小句在语义上无法形成能量传递链,那么小句及物性就较大程度地偏离典型,及物性较低,有时甚至无及物性。

依据典型及物性语义特征参数,可以判断非典型及物小句的及物性高低及其与典型及物性的偏离程度。根据所缺失语义特征参数的多少和类型,不同高低的小句及物性形成一个渐变连续体,包括典型及物性、较高及物性、较低及物性和无及物性。小句缺失的语义特征数量和类型不同,偏离的路径也不相同。

### 3. 英语小句及物性语义偏离路径

基于上述及物性判断参数,小句及物性语义特征缺失情况较多,偏离路径复杂多样,为了更清晰地进行描写,我们首先分别从事件类型、施事和受事三个方面分析语义特征缺失的情况,再综合各方面特征整体描述及物性语义偏离路径。

#### 3.1 事件类型偏离

兰盖克(Langacker, 2008:112)指出,动词勾勒一个过程,因此小句所描写的事件类型由小句中的动词所勾勒。典型及物事件类型语义特征参数包括完成性、瞬时性、动态性、致使性、施事与受事有接触、单向、非对称性地由施事将能量传递给受事。如果具备以上全部语义特征,则该小句的及物性最高,是典型及物性。若缺失某个或某些参数,则及物性降低,其偏离程度与缺失参数的类型和数量有关。从参数类型来看,[能量传递]为最核心的参数。

(2) I carried the suitcase.

(3) We own a nice house.

(4) The laptop weighs 6.2 pounds.

(5) John resembles his father.

与例(1)相比,例(2)在事件类型上有别于典型事件。具体而言,动词“carry”勾勒的过程在时间上具有延伸性,即是说:该动作没有逻辑上的终点,正如万德勒(Vendler)(1967)所举的“push a cart”一样。虽然不可能一直把车推下去,但也没有明确的动作终点。像动词“push”和“carry”勾勒的都是完成过程,各个时间的状态都

不相同,但与典型及物事件的瞬时性不同的是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因此,在事件类型方面,例(2)缺失[瞬时性]和[完成性]特征,其他特征都具备。[瞬时性]和[完成性]特征缺失造成小句及物性一定程度的偏离,但具备[能量传递]的特征,因而及物性较高。例(3)、(4)、(5)中的动词“own”“weigh”“resemble”都勾勒非完成过程事件。兰盖克(Langacker,2008:147)认为,完成过程与非完成过程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变化性(change)和界限性(boundedness)。非完成过程指随时间的推移,各个阶段没有产生变化,是一种保持不变的状态。因此,从事件类型的时间性来看,这两句缺失[动态性]、[完成性]和[瞬时性]特征。例(4)缺失[能量传递]这一重要特征,事件参与者都是静态物,因而没有能量传递。例(2)和(3)虽然都描写非完成性过程事件,但及物性偏离程度却不同,前句及物性较高而后句及物性极低,其被动形式不能接受。例(5)的动词“resemble”也勾勒一种静止状态,但缺失[不对称性]特征,处于这一状态的两个事体具有客观上的平等性。这种平等性阻碍了能量传递链的形成,小句及物性很低,其被动形式难以接受。

从以上分析可见,事件类型语义特征中与时间性有关的特征(如[瞬时性]、[完成性]、[动态性])并不是导致及物性偏离的最重要因素。从例(2)、(3)、(5)的及物性差异来看,[能量传递]是更重要的参数。

### 3.2 施事偏离

施事偏离的语义特征参数包括:施事是否是意志性的、人类、有生命的以及其发出某种动作的施动性。也就是说,如果满足以上四项特征,则是典型施事。其中某一项特征的缺失都会造成及物性偏离。缺失的特征不同,则施事偏离的路径不同。这些所有特征中,[施动性]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因为它与能量传递链紧密相连。

(6) The baby drank all the milk.

(7) The dog broke the case.

(8) The floods damaged several houses.

(9) The square stands a statue.

以上四例从形式上看与典型及物小句没有区别,但因施事语义特征参数的差异存在及物性偏离,且偏离程度不同。例(6)的施事“the baby”满足[人类]、[有生命]、[施动性]特征,缺失[意志性]特征。例(7)的施事“the dog”是有意志性的、有生命的、施动性的,缺失[人类]特征。例(8)的施事“the floods”缺失[意志性]、[人类]、[生命]特征,在其他特征相同的情况下,例(8)的施事缺少的语义特征参数更多,小句及物性偏离程度大于句(6)和(7)。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断例(8)的及物性很低,还需要考察其他两个方面的语义特征。例(9)的施事“the square”缺失[意志性]、[人类]、[生命]、[施动性]特征,偏离程度最大。例(8)的施事虽然也缺少几项语义特征,但具有[施动性],说明施事有能量发出,可能也会有能量传递,而例(9)的施事没有[施动性]特征,表明施事不是能量发出者,不可能存在能量传递。事实上,例(5)、

(6)、(7)的施事虽都是非典型施事,但小句及物性依然相对较高,偏离程度不大,因为三个小句勾勒的都是有能量传递的交互事件,从句法特征来看也都有被动形式。比较而言,例(9)勾勒的是非能量传递的交互事件,其小句及物性程度最低,偏离程度最大。

从以上分析可见,施事语义特征类型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施动性]是与能量传递最直接相关的语义特征参数,直接决定能量源的有无,是影响施事典型性的最重要参数。

### 3.3 受事偏离

受事偏离的考察参数包括:受事是否是无生命的、非人类、已经存在的、独立个体,是否在某种发出动作的控制之下,是否发生性质变化。如果满足以上六项特征,则属于典型受事。如果缺失某项特征,则成为非典型受事,引起小句及物性偏离。

(10) John dug the ground.

(11) Mary moved the table.

(12) The travelers passed a big bridge.

(13) Mary helped John.

以上各例都表现为受事语义偏离典型引起的小句及物性语义偏离,而每例偏离方式又不完全相同。例(10)~(13)中的受事都不满足严格意义上的[性质变化]。[性质变化]的含义为整个受事发生内在的性质变化,比如前述例(1)的受事“car”受到能量传递后形状会发生明显改变。相比较而言,例(10)的受事“the ground”语义上为非典型受事,缺失[性质变化]特征,因为施事“John”发出的动作只对“the ground”的一部分(被挖的那部分土地)产生影响,并非整个受事发生变化。例(11)的“the table”也为非典型受事,不具备[性质变化]特征,只是位置移动,没有性质改变,更准确地说只是移动物受事。例(12)的受事“bridge”没有因为施事发出的动作而产生明显的性质变化,也缺失[性质变化]特征,语义上更像是充当地点角色(locative role)(Quirk et al., 1985)。例(13)的受事“John”是施事“Mary”发出帮助动作的对象,但在得到帮助后不一定产生某种变化,可视为一种潜在变化,更像是帮助的接受者,缺失[无生命]、[非人类]、[性质变化]语义特征。

因此,例(10)~(13)的受事在[性质变化]缺失方面具有不同方式的变体,可能是部分变化、位置变化、潜在变化或无变化。在语义上也有多种变化,可能更像是接受者、地点或移动物等。例(13)还缺失了更多的受事语义特征,在其他特征相同的情况下,例(13)的及物性偏离度稍大。总体看来,这几例语义特征的缺失都未影响能量传递链的形成,因此都属于较小程度的偏离,小句及物性依然较高。

小句也可能缺失其他的受事语义特征,例如:

(14) He brushed his teeth.

(15) She began soup.



(16) He ran a mile in an hour.

例(14)中的受事“his teeth”不是独立于施事的另一事体,而是施事的一部分,缺失[个体性]特征。例(15)被杰肯多夫(Jackendoff)称为充盈结构(enriched composition),施事“he”开始的是做汤的动作(cooking soup),而非汤本身,也就是说此处有一个隐含动词“cook”(Jackendoff, 1997)。这句话应理解为:He began cooking soup. 受事“soup”缺失[已存在]特征,在动作结束后才会出现。但受事[个体性]、[已存在]语义特征的缺失并没影响能量传递链的形成,因此两句的及物性都较高。例(16)中的“a mile”偏离受事角色较远,典型受事一般是有形的、已存在于物质空间的可移动实体,而“a mile”是无形的、表示距离的数量,也不会受“跑”这个动作的影响。该受事缺失[已存在]、[个体性]、[性质变化]、[受控性]特征。这些特征同时缺失,导致“a mile”不能作为事件的参与者,不能成为能量源,因此该小句只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参与者,缺失接受能量的受事参与者,导致能量传递链无法形成,小句及物性偏离度较大,小句及物性极低。以上分析也表明,受事语义特征并非同等重要,[非人类]、[无生命]与[能量传递]关系并不密切,[性质变化]是最重要的特征。

#### 3.4 事件类型、施事、受事共同偏离

上述分析分别聚焦事件类型、施事和受事语义特征,并不表明三种偏离独立存在。小句及物性偏离情况复杂,可能存在事件类型与施事、施事与受事同时偏离,或者事件类型、施事、受事三方面同时偏离。因此,有必要综合性地描写三方面共同偏离的情况。

(17) A stone hurt the boy.

(18) Oliver had hurt himself.

(19) The book sold a million copies.

例(17)中的“stone”在语义上只是外在的致使物,缺失[有生命]、[意志性]、[人类]特征;受事“the boy”缺失[无生命]、[非人类]特征;事件类型语义特征全部具备,属于典型事件类型。虽然施事和受事同时偏离,但这些特征的缺失对能量传递链不造成影响,因此该小句偏离程度并不大,及物性也较高。由此可见,施事和受事是否为有无生命的或是否为人类与能量传递关系较为松散,并非总是同向变化的特征参数。

例(18)也体现了及物性偏离。受事“himself”是反身代词,与施事“he”同指,这与典型受事有差异,受事缺失[个体性]语义特征。施事的语义特征没有缺失。从事件类型来看,由于施事和受事一致,这种反身行为动作的发出者和受影响者指同一个生命体,因此事件参与者只有一个,导致能量接受者缺乏,事件类型缺失[能量传递]、[不对称性]、[单向性]语义特征。因此,该句及物性偏离较大,小句及物性较低。从句法特征来看,该句的被动形式不被接受,进一步说明它的及物性较低。另外,由于及物性很低,偏离程度大,该类小句句法形式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反身代

词作受事难以推广到非生命事体,比如“The house damaged itself”就不合语法。

例(19)的施事和受事都偏离典型。该句句勒的是卖书事件,动作发出者应是卖书的人,“the book”从语义上来说并不是真正的施事,而是买书动作的接受者,是受事。句法形式上的“施事”缺失[有生命]、[人类]、[意志性]、[施动性]特征,出现施事偏离。尤其重要的是,因[施动性]缺失造成没有发出动作的能量源。事件类型缺失[能量传递]、[单向性]、[不对称性]特征。受事缺失[已存在]、[个体性]、[性质变化]、[受控性]特征,也无法成为能量接受者。该句中的两个参与者都是兰盖克所说的独立参与者(Langacker,2008)。小句及物性偏离度较大,及物性极低,可以说几乎没有及物性,这种结构的能产性也很低,如我们不能说“The book bought/borrowed a million copies”。

以上三句虽然都存在及物性偏离,但由于缺失的语义特征数量和类型不同,偏离程度和方式并不相同。例(17)的施事和受事共缺失五项语义特征,例(18)的事件类型和施事共缺失四项语义特征,例(19)的事件类型、施事、受事共缺失11项语义特征。从语义特征数量来看,例(19)缺失最多,例(18)次之,例(17)最少;同时[能量传递]特征更为重要,例(17)小句满足[能量传递],例(18)和例(19)缺失[能量传递],因而例(17)的及物性要高于不涉及能量传递的例(18)和例(19)。综合参数类型和数量,三个小句及物性偏离度大小依为例(19)、(18)、(17),及物性从高到低依为例(17)、(18)、(19)。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发现。第一,判断小句及物性偏离时,语义特征缺失的多少并不是判断及物性偏离度的唯一因素,比如例(18)较例(17)缺失的语义特征更多,但及物性却高于例(17),因为[能量传递]是最为核心的参数,如果没有能量传递,那么小句及物性就较低。第二、三个维度的语义特征之间以及各个维度内部的语义特征间都存在联系,但紧密程度不同,有些关系更为密切,如施事的[施动性]与事件类型的[能量传递]之间,事件类型的[不对称性]、[单向性]与[能量传递]之间的相关度更高。有些关系则较为松散,如事件类型的[瞬时性]与[能量传递],施事和受事的[有生命]、[人类]语义特征与事件类型的[能量传递]语义特征相关性都不太高。第三,小句及物性偏离也涉及认知转喻操作,如例(12)涉及了整体代部分的转喻模型,“桥”(bridge)是施事发出动作通过的地方,动作发出者“the travelers”过桥时仅与桥面发生接触,但桥作为整体比桥面的突显度更高,因此用整个桥代替与动作主体接触的桥面,是整体代部分的转喻模式。第四,小句及物性偏离程度较大、及物性较低时,可能造成小句的句法行为受限,能产性降低,如例(18)和例(19)。

#### 4. 结语

在认知语法框架下,本文认为及物性是及物小句的语义极,其典型概念意义为一个自由移动事体致使另一个事体发生性质变化并产生能量传递的典型及物事件认知

模型。基于该模型,我们构建了判断小句及物性语义偏离的语义特征参数,并从事件类型、施事和受事三方面考察分析了及物性偏离的具体情况和类型。总的来说,及物性偏离方式既与语义特征类型、数量有关,也与语义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关。其中,有无能量传递是最为核心的特征,而某些非核心语义特征的缺失并不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小句及物性。由于影响及物性偏离的语义特征参数较多,小句及物性偏离的路径和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较为典型的语义特征缺失分析了小句及物性在同一认知域内的偏离情况,更为复杂的偏离以及在认知域之间的偏离还可参照本文思路做更深入的挖掘。

#### 参考文献:

- [1] Delancy, S.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Cognition [G]// Tomlin, R. S.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7:53-68.
- [2] Hartmann, R. K. & F. C. Stork.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London: Applied Science Publishers, 1972.
- [3] Hopper, P. J. & S. A. Thompson.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1980, 56 (2): 251-299.
- [4] Jackendoff, 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 [5]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7] LaPalombara, L. *An Introduction to Grammar: Tradition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l* [M]. Ma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1976.
- [8]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 J. Svartvik.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M]. New York: Longman, 1972.
- [9] Rice, S. Towards a Transitive Prototype: Evidence from some Atypical English Passives [J]. *BLS*, 1987(13): 422-434.
- [10] Tsunoda, T. Transitivity [G]// K. Brown & J. Miller (ed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New York: Elsevier, 1999:383-391.
- [11] Vendler, E.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2] 刘正光, 崔刚. 语法原型与及物性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 8-12.
- [13] 王惠静. 及物性的几个核心问题及其认知阐释 [J]. *西南大学学报*, 2017(3): 135-143.
- [14] 王惠静, 文旭. 及物性研究: 回顾与思考 [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1): 12-16.
- [15] 王志军. 及物性的典型研究 [J]. *外国语*, 2004(1): 41-45.
- [16] 文旭. 认知语言学诠释与思考 [J]. *外国语*, 2001(2): 29-36.
- [17] 吴义诚, 李艳芝. 语言及物性的构式研究 [J]. *外国语*, 2014(3): 41-48.

责任编辑: 蒋勇军

# “解读”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英译为例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典籍的翻译过程涉及一些重要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对原文的解读。本文以《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为例子,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解读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分析比较几个有影响的英译文来展示《论语》英译的复杂性,揭示典籍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典籍翻译;《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 The Role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lassics

HUANG Guowen

**Abstrac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mportant step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Using “wei nǚzi yu xiaoren wei nan yang ye” from the Confucian *Lun Yu* (*The Analect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cisive role of interpreting the source text and, by comparing different translated English versions of this sentence, illustrates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ng the Confucian *Lun Yu*, and the discussion helps identify some of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y words:** translating classics; the Confucian *Lun Yu* (*The Analects*); “wei nǚzi yu xiaoren wei nan yang ye”

### 0. 引言

我们在《对原文注释的理解与取舍:典籍外译的一个重要过程》(黄国文,2015)

---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语》汉英对比研究的功能语言学方法”(14BYY027)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国文,男,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

中说到,对典籍的外译,一直都存在着对典故、事件、人物、语言形式等的理解问题。语内翻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所得出的结论或提出的猜测,势必直接影响语际翻译者对原文语言形式及其文化内涵的翻译;语际翻译者如何理解、如何取舍语内翻译者的相关诠释,怎样进行对原文的“解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步骤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解读原文,尽可能把原文的意思作出最合适的理解,这就是解读的过程。但是,汉语典籍的特点是:它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原先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断句。尽管已经有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文史专家作了注疏,但有些解读还是常常存在争议。本文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一句作为例子,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解读的作用,试图通过分析比较几个有影响的英译文来展示《论语》英译的复杂性,揭示典籍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 1. 作为语篇的译文

无论是口头话语、书面语篇,还是译本(translated text),对于话语分析和语篇分析者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的研究对象——语篇;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但从语篇分析角度看,它们都是交际的单位,都传递着带有一定目的的交际信息。

我们(如黄国文2006)认为,进行语篇分析有六个步骤:①观察(Observation);②解读(Interpretation);③描述(Description);④分析(Analysis);⑤解释(Explanation);⑥评估(Evaluation)。这六个步骤构成了一种分析语篇的方法,当然也可用于研究翻译译本和翻译问题。做语篇分析,要求研究者要有一定的观察能力和断定能力;能断定某一特定的语篇是否有被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虽然从理论上讲,所有文本都具有研究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每个文本都会符合分析者的研究目的、都会引起分析者的兴趣,都会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旦分析者观察到能引起自己兴趣并想研究的文本,这就有了研究的开始。

选择了研究对象后,要对文本进行深度、细致的阅读,这样就开始了研究对象“解读”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的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估都是基于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如果研究者没有能力解读和弄明白文本表达的意义,那就不可能有合格的翻译。如果文献中存在明显的争议,那就需要翻译者的判断和取舍。

关于汉语典籍的外语翻译问题,一般说来有两个阶段:“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Jakobson, 1971: 261)。对于《论语》的英语翻译,通常首先是把原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这就是语内翻译,然后再从现代汉语翻译成英语,这就是语际翻译。当然,语内翻译有时并不是有完整的文字文本。我们曾指出,“把用文言文撰写的典籍翻译成现代汉语这个语内翻译过程可以是有明显的实际文本,也可以是只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后源语文本’(post-source-text)(即介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本)。”(黄国文,2012: 70)但是,无论语内翻译是否有文字文本,这个过程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要么存在于外部世界,要么存在于翻译者的内

心世界。

## 2. 解读

像《论语》这样的典籍,是2000多年前问世的文言文文本,没有断句,没有标点,也隐含了很多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社会等领域的事件和知识。又由于当时的信息传递和信息保存等条件限制,后人对一些文本、段落、字句的理解和注释就存在着很多争议。正因为如此,关于《论语》的版本、内容、断句、注解、解释等,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包括古汉语、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讨论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下面我们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例讨论几个不同的解读。

从文献看,很多人都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进行了解释,而且也出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理解。马娜(2015)在讨论前人对这一章节的解读时,列举了九种解说。限于篇幅,下面只引用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解读:①杨伯峻(1980: 81)对此句的解读是“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得同他们共处的”。②杜宏博、高鸿(1998: 165)的解读是“只有家中的妾和仆人最难侍养了!”③吴正中、于淮仁(1999: 28)认为“此章之正确断句当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即:孔子说:‘对!您(这位)先生(说得是对的)啊!小人(实在是)很难对待、侍候、对付的……’”④刘明武(1998: 55)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子”非指“女人”,应理解为“只有你的儿子和小人一样是难以相处的……”⑤董日臣(2001: 72-73)对此句的解读是“唯独女子给小人做事(或共事),是最难侍奉(或相处)的啊!……”⑥牛多安(2002: 121)认为此句应解释为“女子支持、赞助小人,与小人结党营私,小人便会肆无忌惮,任意胡为……”⑦陈冠梅(2003: 86)则是这样解释的:“养在父母家的姑娘,刚出嫁不久未作母亲的年轻妇人,志向浅陋的小辈和下层人物,孔子认为他们缺少一种高贵恒久的精神品德……”⑧闫合作(2006: 56)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解释是:“如果把女儿嫁给道德败坏的小人,亲近他,他就骄横无礼;疏远他呢?却还心系着女儿。近,近不得;远,远不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⑨吴全权(1997: 50)认为这个句子中的“女子”是指“南子”(春秋时期卫灵公夫人)，“小人”指“卫灵公或其类属者”，并断言这种解释“有证有据，昭然若揭”。这里所列的九种解释是大量不同解读中的几种，这足以表明，此句话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表达那么简单的意义。

除这九种解释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解读。这些不同的解释。有些是从文字、声韵、训诂等方面入手,有些是以社会文化、传统思潮、性别平等之议题研究,大家的共同目的都是想提供自己认为最合适或正确的解读,也希望能提供自圆其说的理解。

对于这句话中的词和词组,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据汪秀丽、李跃中(2015)的研究,有下面四种观点:

(1)朱熹(1992)、张居正(2007)、钱穆(2002)等解“女子”为“侍妾”,解“小人”为“仆隶下人”,解“养”为“教养”“畜养”。

(2)刘宝楠(1990)、杨伯峻(1980)、李泽厚(2004)等是这样解释的:“女子”为“妇女”,“小人”为“道德低下之人”,“养”为“相处”“对付”。

(3)杨子彬(2002)认为,这里的“女子”暗指“南子”,“小人”暗指“卫灵公和雍渠之流”,此句的意思是:只有南子那样的女子和卫灵公、雍渠那样的小人是难以相处和教养的。这一观点与吴全权(1997: 50)的看法一样。

(4)吴正中、于淮仁(1999)和张玉卿(2005)都认为,“女子”通假“汝子”,意为“你们这些人”,解“养”为“教育”,因此此句话说的是:只有你们几个弟子和小人一样是不好教育的。

其实,关于这句话的解读,研究文献一直不断在更新。虽然我们所列举的只是学界的一部分观点,但已经足以证明这句话的不同解读。这类讨论还会继续下去,而且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定论的。这一点说明,要翻译典籍,需要翻译者对现有的注疏进行筛选、审视和取舍。这也是对典籍的解读问题。

有学者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与”字进行了研究,认为“‘与’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连词‘和’,而是介词‘跟’”,该句的意思是“女子跟小人相处是很困难的”(高喜田,2015: 8)。廖名春(2012: 113)则认为,从语法结构看,“‘女子与小人’是一个偏正结构,‘女子’是中心词,‘与小人’则是后置定语,是修饰、限定‘女子’的。”,因此“女子与小人”的意思是“象小人一样的女子”,即“女子”中的“小人”。而牛多安(2002: 121)则认为,“‘与’不是连词,而是动词,是赞助、嘉许、参与之意”。

### 3. 不同的英语翻译

上面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不同解释,其实就是它的语内翻译的不同表现。在把它翻译成英语时,就要根据原文和前人对原文的解释来选择意义。下面我们看看这句话的语际翻译(中译英)情况;限于篇幅和讨论重点,我们不研究该句后面“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翻译情况。

#### 3.1 几个不同的翻译

从我们所收集到的多个《论语》英译版本看,大多数人都采取了朱熹(1992)、张居正(2007)、钱穆(2002)和刘宝楠(1990)、杨伯峻(1980)、李泽厚(2004)等的解释,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下面是一些例子:

(1)The Master said, “Of all people, girls and servants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behave to. . . .”  
(Legge, 1861/2011: 330)

在理雅各(James Legge)(1861/2011)的译文中,“女子和小人”和“养”分别翻译为“girls and servants”和“behave to”,这应该是根据朱熹(1992)的解读。对于“女子和小人”,辜鸿铭(Ku, 1898)采取“young women and servants”来翻译,但“养”被翻译为“keep”:

(2)Confucius remarked, “Of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young women and servants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keep in the house. . . .”  
(Ku, 1898: 162)

苏慧廉(Wiliam Edward Soothill)(1910/1995)把“女子”翻译成“maids”,其他的

与辜鸿铭(Ku,1898)一样。

(3)The Master said: “Of all people, maids and servants are hardest to keep in your house. . . .” (Soothill,1910/1995: 110)

下面是另外一些译文,它们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总的说来是大同小异:

(4) The Master said, “Women and people of low birth are very hard to deal with. . . .” (Waley,1938: 216-7)

(5)He said: “Young women and small men [in sense of flappers and house boys] are hard to rear. . . .” (Pound,1950: 279)

(6)The Master said, “In one’s household, it is the women and the small men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 . .” (Lau,1979: 148)

(7)The Master said: “Only women and small men seem difficult to look after. . . .” (Dawson,1993: 73)

(8)The Master said: “Women and underlings are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handle. . . .” (Leys,1997: 89)

(9)The Master said, “Women and servants are particularly hard to manage. . . .” (Slingerland,2003: 211)

(10)It is difficult, said the Master, to deal with women and servants. . . . (Xu,2005: 94)

(11)K’ung Fu-tsze said: “Of all people, women and subordinate men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 . .” (Roberts,2007: 253)

(12)The Master said, “Women and petty persons are the hardest to look after. . . .” (Watson,2007: 125)

从上面 12 个例子可以看出,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几个关键词的翻译,还是存在差异的。下面将一一讨论。

### 3.2 “女子”的翻译

就关键词“女子”的翻译而言,在我们这里所列举的 12 个译文中,有十个人译为“women”(Ku, Waley, Pound, Lau, Dawson, Leys, Slingerland, Xu, Roberts, Watson);但是,还是存在差异的:六人直接译为“women”,两人(Ku, Pound)译为“young women”,一人(Lau)用了“the women”,一人(Dawson)用了“only women”(估计 only 是“唯”的翻译)。在理雅各(1861/2011)的译文中,“女子”被翻译为“girls”,而在苏慧廉(1910/1995)中则被翻译为“maids”。这些翻译的共同点是把“女子”当作复数(指多个女子),既有泛指“女子”(women),也有特指某一类“女子”:年轻的女子(young women)、姑娘(girls)、女仆(maids)。从这里的翻译看,没有一个译者认为“女子”是指“南子”(吴全权,1997;杨子彬,2002)。

### 3.3 “小人”的翻译

“小人”一词的翻译情况是这样的:有五人(Legg, Ku, Soothill, Slingerland,



Xu)用了“servants”,三人(Lau, Pound, Dawson)用了“small men”,其中刘殿爵(D. C. Lau)还使用了定冠词the”。韦利(Arthur Waley)用了“people of low birth”,华兹生(Burton Watson)用了“petty persons”,莱斯(Simon Leys)用了“underlings”,而罗伯茨(H. H. Roberts)则用了“subordinate men”。从这些翻译看,“小人”的意思主要有两个:“仆隶下人”(朱熹,1992;张居正,2007;钱穆,2002)或“道德低下之人”(刘宝楠,1990;杨伯峻,1980;李泽厚,2004)。所有翻译的共同点是把“小人”当作复数,也没有人认为它是指卫灵公和或其类属者(吴全权,1997;杨子彬 2002)。

### 3.4 “难”和“养”的翻译

关于“难”的翻译,我们这里所列的12种译文之间还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形容词的选择和比较级的选用:七人(Legg, Ku, Roberts, Lau, Xu, Dawson, Leys)用了“difficult”,另外五人用了“hard”;两者的选用没有多大的差别。五人(Legg, Ku, Soothill, Roberts, Watson)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the most difficult, the hardest, hardest),另外七人(Pound, Lau, Xu, Dawson, Waley, Slingerland, Leys)用了形容词的“原级”,其中三人(Waley, Slingerland, Leys)还用了副词(very, particularly, especially)修饰形容词。

至于“养”,译者所选择的词语可分为三类:①表示“抚养”意义的:keep(Ku, Soothill)、look after(Watson, Dawson)、rear(Pound);②表示“对付”意义的:deal with(Waley, Xu, Lau)、handle(Leys)、manage(Slingerland)、behave to(Legge);③表示“了解”意义的:understand(Roberts)。这些不同的词语的选用,反映了译者的解读和自己的态度。用“look after”之类表示讲话人(孔子)站在高处,有“施舍”之意,用“deal with”则表示讲话人表示要“应付”或“对付”女子和小人,无“施舍”之意,而且有对“女子与小人”不友好的含义。

### 3.5 关于“与”

在我们见到的《论语》英译本中,都把“与”看作是连接“女子”和“小人”的连词,表示“和”(and)的意思。如果按照高喜田(2015:8)的解释,那一种可能的英语翻译就是“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women to get along with small men”。如果按照廖名春(2012:113)的观点,“女子与小人”的意思被解读为“像小人一样的女子”,可以英译成“The underling-like women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如果按照牛多安(2002:121)的观点,接受“与”是动词,表示赞助、嘉许、参与之意,并把整个句子理解为“女子支持、赞助小人,与小人结党营私,小人便会肆无忌惮,任意胡为”(2002:121),这个句子的英译就可能是“When women are in favour of small men, the latter will not behave themselves”。可见,对原文的理解,直接影响到意义的翻译。

## 4. 讨论

从上面的分析看,我们所选的12个英译文,采用的解读都与朱熹(1992)、张居正(2007)、钱穆(2002)和刘宝楠(1990)、杨伯峻(1980)、李泽厚(2004)等的一样,

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理解为:与妇女和仆隶下人(或道德低下的人)相处很难。但是,就译文所选用的词语看,这些译文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现做进一步讨论。

#### 4.1 泛指与特指

就语法而言,名词词组可以表达泛指意义(例如,*Pandas are lovely.*),也可表示特指意义(*The pandas are so lovely.*)。在上面的译文中,有些译者把“女子”和“小人”当作泛指来处理,例如:“*Women and people of low birth are very hard to deal with*”(Waley)、“*Women and servants are particularly hard to manage*”(Slingerland)。庞德(Ezra Pound)、许渊冲、华兹生和莱斯也都是这样处理的。但也有译者把“女子”和“小人”当作特指来处理,例如:“*In one's household, it is the women and the small men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Lau)这里的特指意义是通过两个定冠词(*the*)的使用来表达的。用了定冠词(即*the women, the small men*)表明说话人心中是特指某些女子和小人,而不是泛泛地说。其实,刘殿爵的译文中还用了“*in one's household*”来限定所谈论的范围:在家里的那些女子和小人。

理雅各、辜鸿铭(Ku, Hungming)、苏慧廉和罗伯茨也都使用了介词短语作为地点状语,限定所谈论的对象的范围。也正因为有了这个限定范围的介词短语,后接的形容词才能用“最高级”来表达:比起其他类型的人,“女子与小人”是最难对付的。但是,这几位译者使用的“*of all people*”和“*of all people in the world*”与刘殿爵的“*in one's household*”是不同的,前者主要用来突出比较的“范围”(在所有人中),后者主要用来限定意义的表达(在家庭的地方),因此前者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后者不属于这种情况。

#### 4.2 全部与部分

泛指与特指的表达与全部与部分有关。像韦利的译文“*Women and people of low birth are very hard to deal with*”是泛泛而谈;它虽然表示“类指”(generic)的意义(即一般说来,这类人不好对付),但并不是指天下所有的女子和小人。相比之下,在道森(Raymond Dawson)的译文“*Only women and small men seem difficult to look after*”中,用“*only*”后就突出了类指意义,排除它类,这样就是表示全部意义了,而且是加强了表达的语气。估计这个“*only*”的使用与原文中的“唯”有关。

#### 4.3 词语的选择

就词语意义的内涵和外延来说,每个选择都表达了不同的意义。例如,“*women*”要比“*young women*”(Ku)、“*girls*”(Legge)和“*maids*”(Soothill)的所指范围广,因为相比之下“*women*”是个上义词;同样地,用“*small men*”(Lau, Dawson, Pound)也要比“*servants*”(Legg, Ku, Soothill, Xu, Slingerland)、“*people of low birth*”(Waley)、“*petty persons*”(Watson)、“*underlings*”(Leys)和“*subordinate men*”(Roberts)所指的范围广。在庞德的译文中,译者特别指明,他所选用的“*young women and small men*”的意义是“*flappers and house boys*”(时髦女子男仆)。

至于“小人”的翻译,无论是用“servants”,还是“people of low birth”或“underlings”,这都表明了译者的态度和评估。把“养”翻译为“抚养”意义(如 keep, look after, rear)或者“对付”意义(如 deal with, handle, manage, behave to)和“了解”意义(如 understand),所表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用“look after”是“‘我’照顾了他们”,用“deal with”则是表示“‘我’要对付他们”,用“understand”则有“抱怨”的含义。

#### 4.4 译文的特点

在原文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女子”和“小人可能是特指,也可能是泛指,可能是表达全部的意义,也可能是表示部分的意义,但在英语中,定冠词的使用、时态的选择、名词单复数的选用,都会表达原文隐含的或原本没有的意义。选择了一定的形式,就表达了一定的意义,所以译者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意义表达的选择。

上面我们说到,吴全权(1997: 48)和杨子彬(2002: 382)认为,“女子”指的是南子,“小人”指卫灵公和雍渠之流或其类属者。马娜(2015: 110)赞同吴全权(1997)的观点,认为这才是正解。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解,那英语的译文可能就是这样:

(13) It is the woman and the small man (and his associat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这里的“女子”用单数形式,并加了定冠词(the woman),因此是特指某一个女子(即“南子”);如果要把“南子”明确说出来,也可直接使用“Nanzi”来替代“the woman”。同样地,“小人”被翻译为“the small man”(名词也是单数,并加定冠词),所以也是用来特指某一个人(即卫灵公)。例(13)的限定动词用了现在时态;如果改为过去时态(即 It was the woman and the small man (and his associates) that we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那就不是谈论“现在”,而是表达“过去”的一种观点了。

#### 4.5 译者的选择

由于年代、历史、文字符号等原因,所有的典籍中的记录都存在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有了不同的语内翻译版本,就可以有不同的语际翻译版本。据统计,《论语》的英译本就有60多种。对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翻译,主要还是根据朱熹(1992)、张居正(2007)、钱穆(2002)和刘宝楠(1990)、杨伯峻(1980)、李泽厚(2004)等人的解释:“女子”指“妇女”,“小人”指“仆隶下人”或“道德低下之人”,“养”表达“相处”或“对付”的意思。即使所有译本都根据基本相同的原文解释,由于要把这一意思通过另一种语码(英语)表达出来,所以也存在着差异,这点从上面的讨论也可以看出。

对于典籍进行诸如断句、解释和注解等的取舍,这取决于译者本人的知识背景、学识、翻译技能、翻译的目的等等,当然也与读者对象有关。进行典籍外译,考验的是翻译者的文化素养、语言驾驭能力等个人综合素质,这点从他相关的注释

进行合理合适的理解和取舍就可看出。

## 5. 结语

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解读,多年来一直是学者热衷的事情,这其中原因之一是:很多人凭这句话就断定孔子歧视女性;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女子”和“小人”的解释。这种解释,导致很多人批评儒家歧视女性,因为这是赤裸裸地宣泄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当然也与孔子乃至儒家的“有教无类”“仁者爱人”“忠恕待人”的博爱精神不一致。

高喜田(2015:8, 10)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考辨后认为,译文应为:“女子跟小人相处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解释,主要是他对句中“与”一词的解释:“在这里,关键词‘与’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连词‘和’,而是介词‘跟’。”因此,他认为:“孔子不但没有歧视妇女的意思,反而表现出对女性性格特点的准确把握和对妇女的关怀之情。”他还断言,“两千多年来,从汉儒到宋儒、清儒以至今人时贤,主流注家的解释是错误的。”“数千年来加在孔子头上‘歧视妇女’的冤案,从此可以休矣。”

《论语》已经出版了60多种英译本,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英语版本出现。对于大多数的《论语》复译者来说,要自己去研究《论语》,并真正理解整部《论语》乃至孔子儒家思想的深刻内涵,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或者说不可能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能依靠和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语内翻译版本和有关注释)。但是,即使这样,也存在着要对现有的语内翻译文本和语际翻译文本进行鉴定、筛选和对有关注释进行取舍,不然就不可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篇第七》)。从这点看,典籍的翻译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它不仅仅是两种文字的转换活动,而且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诠释;翻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做翻译的人要做个合格的翻译者之前,必须努力做个合格的解读者(interpreter)、重写者(re-writer)和创作者(creator)。

### 参考文献:

- [1] Dawson, R. *Confucius—The Analect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G] // Jakobson, R. *Selected Writings. Word and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971: 260-266.
- [3] 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898.
- [4] Lau, D. C. *The Analects (Lun yü)* [M]. Harmondsworth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 [5] Legge, J. *The Chinese Classics* [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861/2011.
- [6] Leys, 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7] Pound, E. *The Analects* [G] // Pound, E. *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0: 189-288.

- [8] Roberts, H. H.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U. S. A. : Anjeli Press, 2007.
- [9] Slingerland, E. G. *Confucius Analect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10] Soothill, W. 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10.
- [11] Waley, A.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8.
- [12] Watson, B.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3] Xu, Yuanchong. *Confucius Modernized* [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 [14] 陈冠梅. 析“女子”与“小人”[J]. 古汉语研究, 2003(1):85-86.
- [15] 董日臣. 孔子“三案”辨证[J]. 深圳大学学报, 2001(2):72-77.
- [16] 杜宏博, 高鸿. 四书译注[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8.
- [17] 高喜田.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考辨——兼论孔子并无歧视妇女意[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8-10.
- [18] 黄国文.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9] 黄国文. 典籍翻译: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J]. 中国外语, 2012(6):64-71.
- [20] 黄国文. 对原文注释的理解与取舍:典籍外译的一个重要过程——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8):1-5.
- [21]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三联书店, 2004.
- [22] 廖名春.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疏注及新解[J]. 人文杂志, 2012(6):108-115.
- [23]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 [24] 刘明武. 为孔子辩:“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子”非指“女人”[J]. 妇女研究论丛, 1998(4):54-55.
- [25] 马娜. 试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本义[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5(6):108-110.
- [26] 牛多安.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释义[J]. 孔子研究, 2002(5):120-121.
- [27]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28] 汪秀丽, 李跃中.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或无涉女性歧视[J]. 社会科学论坛, 2015(12):207-213.
- [29] 吴全权. 《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析辨[J]. 江汉大学学报, 1997(5):47-50.
- [30] 吴正中, 于淮仁.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新解——为孔子正名[J]. 甘肃社会科学, 1999(5):28-29.
- [31] 闫合作. 论语说[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
- [3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33] 杨子彬. 孔子鄙视妇女吗?“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辨析之一[J]. 国学论衡, 2002(2):379-405.
- [34] 张居正. 论语别裁[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35] 张玉卿. 论语新译[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 [36] 朱熹. 论语集注[M]. 济南:齐鲁书社, 1992.

责任编辑:肖 谊

# 伊恩·麦克尤恩的中国脸谱:翻译与研究述论

尚必武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近年来,伊恩·麦克尤恩在国内的译介与研究日渐升温,不断发展。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尚未形成规模与体系,但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本文旨在梳理分析中国学者对麦克尤恩的翻译和研究,展现麦克尤恩在我国的接受与批评轨迹。文章重点考察分析了学者们在麦克尤恩作品翻译以及麦氏作品主题、叙述笔法、语体风格、理论视角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突破,指出当下麦克尤恩研究的不足与缺憾,以期对我国未来的麦克尤恩研究有所启发,进一步拓展关于麦克尤恩的批评空间。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翻译;研究

## Critical Reception of Ian McEwan in China

SHANG Biwu

**Abstract:** Recent years has witnessed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Ian McEwan in China. Despite the inadequacy of McEwan studies done by Chinese scholars, it still deserves a critical men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Chinese scholarship of McEwan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matic concerns, narrative skills, language style, and the critical theories deployed. Along with projecting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China's McEwan studies, it tries to outline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Ian McEwan; translation; criticism

### 0. 引言

1983年,英国知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选出20位“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Best of the Young British Novelists),榜单上赫然在列的除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石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艺术与伦理思想研究”(14BWW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尚必武,男,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叙事学、英美文学和文学伦理学研究。

黑一雄(Kazuo Ishiguro)、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派特·帕克(Pat Barker)、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罗斯·特里曼(Rose Tremain)、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坛名宿外,自然少不了被誉为英格兰“国民作家”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2006)称他为“当代英国小说的主要声音”,是“同时代英国作家中最优秀的”(Quigley, 2006: 436)。自20世纪70年代初登文坛以来,麦克尤恩一共创作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儿童小说,12部长篇小说,以及戏剧、电影剧本、歌剧等多种作品,囊括了包括“毛姆奖”“布克奖”等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以乱伦、谋杀、暴力等为创作题材,因此被批评界冠之“惊悚文学”(literature of shock),他本人也曾一度被戏谑为“恐怖伊恩”(Ian Macabre)。麦克尤恩的后期作品不仅延续了其前期作品中的伦理、女性主义等主题,而且还将视角转向历史与政治,具有更多的社会意识性,叙事笔法也愈加纯熟老练、精致细腻。《二十世纪小说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2011)这样评价麦克尤恩:“从早年作为怪诞和变态作家的声名中发迹”,到现在“树立了自己作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英语虚构散文家,既在批评界赢得了良好口碑,又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Wells, 2011: 250)。毫不夸张地说,当今英国文坛若缺少了麦克尤恩,将会显得非常落寂与黯淡。

自《外国文艺》杂志于1992年首次刊载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临死的瞬间》以来,迄今为止,这位英国文坛巨擘在中国已经“旅行”了20余载的时间。本文旨在回顾梳理20年来国内学界对麦克尤恩的翻译和研究,展现麦克尤恩在我国的接受与批评轨迹。文章重点考察分析我国学者在麦克尤恩翻译及其作品主题、叙述笔法、语体风格、理论视角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指出当下麦克尤恩研究的某些不足与缺憾,以期对我国未来的麦克尤恩研究有所启发,进一步拓展关于麦克尤恩的批评空间。

### 1. 迟来的英伦风景:麦克尤恩作品的汉译

在为麦克尤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中文版撰写《前言》的时候,著名作家余华难掩心中的遗憾,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sup>①</sup>可以说,余华先生对麦克尤恩在国内研究现状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确实,与西方学界的麦克尤恩研究相比,国内学者对这位当代英国文坛要人的关注和研究不仅起步较晚,而且相关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显得非常逊色。不仅在麦克尤恩的研究上如此,而且在其作品的翻译上也同样起步缓慢,因此用“沉默”来形容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界之于麦克尤恩的接受,并不为过。

20世纪90年代之前,麦克尤恩的作品在国内的翻译与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状态。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旗下的《外国文艺》杂志第二期刊发了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

《临死的瞬间》(汪义群译,现译名《既仙即死》)。这是麦克尤恩的作品首次登陆中国。在译者前言中,汪义群先生不仅对作者麦克尤恩作了简要介绍,而且还对该短篇小说作了较为中肯的批评。他认为:这部“作品揭示了一个充满占有欲的富人的变态行为,由于以第一人称叙述,因此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细致而深入的刻划。”<sup>②</sup>

此后,麦克尤恩作品开始缓慢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1998年,《外国文学》杂志第六期刊载了麦克尤恩的两部短篇小说:《两个片段:199-年3月》(*Two Fragments: March 199-*, 1978;左晓岚译)和《周而复始》(*To and Fro*, 1978;张继革译)。令人欣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对麦克尤恩的译介工作迅速升温。就文学期刊对麦克尤恩作品的译介而言,《外国文艺》用力最多。除在20世纪90年代刊载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临死的瞬间》之外,新世纪伊始,《外国文艺》杂志第四期刊发了由杨向荣翻译的麦克尤恩的四部短篇小说,分别是《立体几何》《在被窝里》(现译名《床第之间》)、《蝴蝶》以及《最初的爱情与最后的仪式》(现译名为《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2004年,《外国文艺》杂志将麦克尤恩的经典作品《赎罪》(郭国良译)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以连载的形式在该刊的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刊出。2006年,《外国文艺》第六期又刊载了麦克尤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水泥花园》(裘德译)。此外,国内权威刊物《世界文学》杂志也加入到推介麦克尤恩的行列之中。2005年,《世界文学》第五期刊载了麦克尤恩的五部短篇小说:《关在橱窗里的人对话》(杨向荣译)、《夏季的最后一天》(杨向荣译)、《三月断章》(粟瑞莲译)、《色情作品》(任吉生译)、《一只被供养的猿猴的思考》(任吉生译)。

进入新世纪之后,麦克尤恩作品的翻译开始掀起热潮。一方面,期刊杂志继续翻译麦克尤恩的短篇作品和长篇选段;另一方面,各大出版社开始竞相购买麦克尤恩作品的中文版权,接连推出译作。一时间,麦克尤恩成了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宠儿。迄今为止,麦克尤恩的15部小说作品中,除2014年最新小说《儿童法案》外,其余14部均有了中译本。2001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阿姆斯特丹》(王义国译)。2003年,该社又出版了《时间中的孩子》(何楚译)。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赎罪》(郭国良译)。2007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阿姆斯特丹》(丰俊功译)和《水泥花园》(冯涛译)。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星期六》(夏欣茁译)。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在切瑟尔海滩上》(黄昱宁译)。200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出版了麦克尤恩的儿童小说《梦想家彼得》(孙仲旭译)。尤其是近两年来,国内对麦克尤恩作品的翻译达到高峰。201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麦克尤恩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只爱陌生人》(冯涛译,又译《陌生人的安慰》《陌生人的慰藉》)、《黑犬》(郭国良译)、《无辜者》(朱乃长译)、《床第之间》(周丽华译)等四部作品。201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磅出击,一口气连续出版了《阿姆斯特丹》(冯涛译)、《水泥花园》(冯涛译)、《爱无可忍》(郭国



良、郭贤路译)、《星期六》(夏欣茁译)等四部作品。2012年,译林出版社重新推出《时间中的孩子》(何楚译)。作为国内麦克尤恩中文作品最大的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2年不仅推出了《水泥花园》《只爱陌生人》《在切瑟尔海滩上》的中英双语版,而且还翻译出版了《追日》(黄昱宁译)。《外国文艺》杂志还于2012年第六期以“聚焦”栏目的形式推出了麦克尤恩专题,不仅刊载了《巴黎评论》杂志在2002年对麦克尤恩的采访,而且还发表了麦氏早年的三个短篇——《十字路口》(严春姝译)、《无题》(郭国良译)、《沉沉睡眠,浅浅睡人》(郭国良译)。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了麦克尤恩的间谍小说《甜牙》(黄昱宁译)的中文版。2017年3月,麦克尤恩的《儿童法案》(郭国良译)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总体看来,麦克尤恩作品在国内的翻译虽然起步较晚,但势头猛进。尤其是2007年以后,麦克尤恩的小说作品基本都有了中文译本,其中还包括较新作品《儿童法案》,从而使麦克尤恩的翻译越来越富有时代感。然而,国内在翻译麦克尤恩的作品时,基本上是以其小说为主,忽略了麦克尤恩所创作的其他类型的作品。作为一位有着多样创作才华的作家,麦克尤恩在儿童小说、戏剧、歌剧等领域皆有建树。由此看来,麦克尤恩作品在国内的翻译还存在用力不均的现象,对其戏剧、电影剧本等的翻译有待加强。

## 2. 从“冷遇”到“慢热”:麦克尤恩研究的初始阶段

同麦克尤恩作品的翻译相比,关于其作品的批评显得相对滞后和薄弱,颇有“冷遇”之嫌。一段时间以来,对于麦克尤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其作品中文译者所写的前言后记式的阅读感悟和翻译体会。但这并不是说这位英国文坛名家没有走入我国学者的批评视野。20世纪90年代初,王佐良、周珏良两位教授在其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1994)中,就已经注意到了麦克尤恩。他们称麦克尤恩是“文坛新秀”,他“先以短篇小说著称”。在评析与麦克尤恩同时代的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罗斯·特里曼(Rose Tremain)、威廉·特弗雷(William Trevor)、埃玛·坦南特(Emma Jennant)等年轻作家的写作风格时,王、周两位教授写道:“这批新作家在作品中把梦幻、荒诞、黑色幽默和现实融为一体,创造一个虚虚实实、可笑又可悲的天地。”(王佐良、周珏良,1994:906)他们以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陌生人的安慰》为例,认为在该部作品中,“梦幻转化为现实,现实又如同虚幻,使读者难以分清梦境和现实、真实与虚构”(王佐良、周珏良,1994:906)。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王、周两位教授能够关注到麦克尤恩,并对此作品做出如此精准的评价,充分体现了两位外国文学研究先哲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他们对当时英国文坛动态的准确把握和判断。

国内真正意义上的麦克尤恩研究始于蓝纯女士。1998年,蓝纯在《外国文学》第六期发表了《伊恩·麦克尤恩其人其作》及《评〈陌生人的安慰〉》两篇论文。前者不

仅对麦克尤恩的生平和创作历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而且还对麦克尤恩的创作特点与风格等进行了较为独到的阐释,文章认为,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位之一,他的文风融合了无所顾忌和蓄意的简洁,在揭露我们自身和社会的弱点的同时,他的兴趣更多地放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操纵及由此而产生的性行为上。他将男女之间的关系视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其间充斥着暴力与困惑,混乱与挣扎”(蓝纯,1998b: 23)。后者对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陌生人的安慰》做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小说中畸形的男女关系。蓝纯认为,在《陌生人的安慰》中“麦克尤恩力图说明这样一种畸形的两性关系的产生绝非偶然,正是我们这个等级森严的男权至尊的社会为它的产生提供了温床”。罗伯特和卡罗琳这两位小说人物“是这个罪恶社会的罪恶观念的必然产物”(蓝纯,1998a: 45)。

进入新世纪之后,麦克尤恩似乎逐渐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2000年,陆建德研究员在《世界文学》杂志第六期发表了《“文明生活的本质”:评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一文。在该文中,陆研究员高屋建瓴,对麦克尤恩的“布克奖”扛鼎之作《阿姆斯特丹》作了深入的文本分析,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小说人物之间你争我斗的权力游戏。陆先生尤其欣赏麦克尤恩的行文笔法,对此赞誉有加。他精辟地指出:“麦克尤恩的笔法极其洗练,读他的文字就像欣赏没有一点赘肉的健美运动员的肌体。作者极少描写人物的外表,他用简单的对话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正因为作者惜墨如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能放过任何细节。就此而言,《阿姆斯特丹》读来简直像侦探小说。”(陆建德,2000: 297)论及《阿姆斯特丹》在学界所赚取的种种称誉,陆建德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麦克尤恩用精确、清晰的语言和字里行间生动的韵味给读者讲述了一个具有纪实品质的故事和男女之间的权力游戏”(陆建德,2000: 300)。

2000年,《外国文艺》不仅在其第四期再度刊出“伊恩·麦克尤恩小说选”专辑,而且译者还在前言中对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第之间》做了较为简洁得当的评点。译者杨向荣认为在这些早期作品中,麦克尤恩自由奇怪的想象力就已经初露端倪,小说的情节怪诞残忍,建构了一个充满颓废、不合时宜、反常、被人遗弃的世界,但是麦克尤恩“却用优美精确的语言来承载这些恶心恐怖然而又源自普通生活的题材,麦克尤恩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确描述和黑色幽默相结合的产物。”<sup>③</sup>实际上,译者们对麦克尤恩作品所发表的前言、后记式的批评也构成了国内麦克尤恩研究的一个独特部分,不乏真知灼见,为麦氏作品在国内的成功推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譬如,唐建清在《时间中的孩子》中译本的序言中对麦克尤恩的这部重要作品做出了非常独到的批评。他认为,“时间中的孩子”这一命题表现了“麦克尤恩对时间的深刻理解:时间不仅是人对外部世界存在的一种理性把握,更是人的一种生命体验,或者说时间就是人的生命形式”。因此,“‘时间中的孩子’也就是‘时间中的生命’。孩子的丧失也就是生命的丧失。这种‘丧失’不仅是孩子的意外丢失和不

应有的夭折,也包括成长过程中童真和快乐的丧失”<sup>④</sup>。

同样,裘德在《水泥花园》的译者前言中,也对作品的情节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点。针对麦克尤恩的创作题材和风格,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麦克尤恩穷三十年的时间不断地用他的作品重新定义黑暗到底能有多么黑暗,不断地探索施一受虐狂、变态性爱以及超现实情节到底能走多远”<sup>⑤</sup>。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麦克尤恩“从来不惧于发掘骇人听闻的黑暗中心,从不忌讳所谓的变态和禁忌,但他当然不是一个廉价的恐怖批发商,他的文字简洁而且优雅,他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洞察和深挖使他笔下经常是‘不洁’的题材具有了真正的人性深度”<sup>⑥</sup>。又如,《世界文学》杂志在刊载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时,对麦克尤恩的作品风格做了非常精当的批评,认为:“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风格诡异。作品大多涉及谋杀、乱伦、变性癖、同性恋等令人困扰的题材,不过,这些题材经过他清晰、冷静、准确的语言过滤,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艺术效果,好比解剖尸体的手术刀无比抒情地跳起慢板的舞蹈,让读者离开常态,感受着艺术化的手术过程给人带来的内心冲击力。”署名为啁啾的编者对麦克尤恩的语言赞赏不已,认为“麦克尤恩的语言犹如艺术品手工工场的说明书,精确而到位”<sup>⑦</sup>。

尽管我国的麦克尤恩研究起步较晚,且大都以前言、后记或期刊等零散的形式出现,但经过诸如陆建德等国内有影响力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以及《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等重要刊物的热情推介,麦克尤恩毕竟开始融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关注,为下一个时期麦克尤恩研究热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 3. “沉寂”过后的“热潮”:麦克尤恩研究的高涨

近年来,由于麦克尤恩作品中译本的大量出版,以及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特别是电影《赎罪》的热映,使得麦克尤恩在国内的关注程度迅速升温。实际上,《赎罪》也是国内研究最多的一部麦克尤恩作品。首先,该部作品的元小说特征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譬如,丁建宁在《赎罪如何可能?——评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2004)一文中,不仅对作品的故事梗概作了简要评介,同时还指出《赎罪》是一部显著具有元小说特征的作品,元小说理论的运用贯穿始终。就元小说技巧而言,张和龙在《宏大而优美的心灵史诗——评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2008)中认为:《赎罪》并没有出现作者现身作品之中的“侵犯式叙述”,而是采用虚构人物与现代作家进行对话的样式。与上述论者不同的是,杜维平、高一琼在题为《麦克尤恩的自由国度——论〈赎罪〉的陌生化叙事结构》(2009)的文章中,考察了小说先被建构后被瓦解的陌生化叙事模式。他们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凸显了小说的不确定性特征。此外,还有学者从叙事学和伦理批评的视角来考察《赎罪》。例如,邹涛在《叙事认知中的暴力与救赎——评麦克尤恩的〈赎罪〉》(2011)一文中,从“叙事认知暴力”这一概

念出发,认为《赎罪》对这种暴力给予了深刻和具象化的呈现,从而揭示出进入虚构世界的危险是人类认知的普遍困境。宋艳芳、罗媛在《谁该赎罪?何以赎罪?——〈赎罪〉的伦理经纬》(2012)一文中,从伦理的视角出发,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谁该赎罪这一重要问题,尤其是考辨了文本内部的叙述者布里奥妮和文本外部的作者麦克尤恩之于赎罪的方式和努力,认为“《赎罪》的重心不是追究‘谁之过?’而是引起读者对自我之存在、自我之伦理意识的反思”(宋艳芳、罗媛,2012: 89)。

其次,《时间中的孩子》也是国内批评界关注较多的一部作品。首先,学者们从麦克尤恩创作转型的角度来审视这部作品。龙江在《心灵的孩子、神奇的时间——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解读》(2005)一文中认为:《时间中的孩子》是麦克尤恩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标志其叙事笔法的纯熟。同样从创作转型角度来阐释这部作品的还有程心。她在《“‘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2008)一文中指出:《时间中的孩子》以走失的孩子为线索,通过斯蒂芬·查尔斯和特尔玛影射浪漫文学、极权政治和自然科学对童年的不同构想,表明孩子既非文学家笔下完美的理想也非政治家手中统治的工具,而是人性的真实存在。就此,她得出结论:这部作品标志着麦克尤恩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与上述论者不同的是,舒奇志在《主体的欲望与迷思——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2008)一文中,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出发,详细考辨了作品中的孩子和时间两大重要意象,窥探小说围绕着追寻失却的童年本真这一主题。她认为,作品反映了处于象征域的成年人在寻求未曾被他者欲望所引诱的本真欲望与大写的他者相遇时所遭遇的迷思和尴尬,而时间是主体连接不同界域的介质。

此外,国内还有关于麦克尤恩其他作品的零星研究,散见于各类期刊。如邱枫在《男性气质与性别政治——解读伊恩·麦克尤恩的〈家庭制造〉》(2007)一文中,对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家庭制造》中所隐含的男性气质问题进行了探讨。郭国良以译者的身份,在《新婚之夜的悲剧——读伊恩·麦克尤恩新作〈在切西尔海滩上〉》(2007)和《“因坏情绪所累的文明”——评伊恩·麦克尤恩的〈黑狗〉》(2010)两篇文章中,对麦克尤恩的小说《在切西尔海滩上》《黑犬》分别作了内容评介,起到了一定的导读作用。著名作家余华在《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2010)一文中,对麦克尤恩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发表了颇有深度的批评,提出“麦克尤恩后遗症”这一说法,即“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sup>⑧</sup>。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国内部分学者还尝试用新的批评方法来对麦克尤恩的作品展开解读,从而为麦克尤恩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近年来,王悦从叙事学理论出发,集中探讨麦克尤恩作品的“不可靠叙述”手法。譬如,她在《析麦克尤恩〈立体几何〉:不可靠叙述的生成与阐释》(2010)、《〈陌生人的慰藉〉:不可靠的人物方阵及其叙述》

(2011)、《小说中的“叙述化”:一种不可靠叙述形式——以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为例》(2011)等系列论文中,分析了《立体几何》和《陌生人的慰藉》《爱无可忍》等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现象,认为“麦克尤恩对于不可靠叙述的运用,如同一个优秀的舞者故意戴上镣铐跳舞,在对人物和情节有意曲折的展现中显示艺术和思想的高超,并由此将作品与具有同样离奇情节的庸俗小说分隔开来”(王悦,2011:128)。

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也为麦克尤恩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周艺在《自然和人性的较量——从文学伦理学视角解读〈日光〉》(2011)一文中,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从性伦理、生态伦理和科技伦理这三个角度解读《日光》。通过梳理主人公彼尔德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经历这两条伦理线,她认为小说中的各种扭曲伦理现象反映了作者麦克尤恩对人性异化的思考,凸显了人性异化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张力。同样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研究麦克尤恩作品的还有尚必武。他在《“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2012)一文中认为,《蝴蝶》“通过书写极端的邪恶来承载对至善的向往,借助‘让人不安的艺术’来寄寓对崇高伦理道德的诉求”(尚必武,2012:82)。在另一篇文章《形式美学的道德旨归:麦克尤恩〈家庭制造〉的文学伦理学解读》(2013)中,尚必武认为麦克尤恩的处女作《家庭制造》是一则自我成长的道德警示,作品“在更大层面上投射了整个青少年群体在青春期的困惑、烦恼与迷惘,以及他们可能潜在的道德滑坡和伦理缺失,值得引起社会的重视与思考。”(尚必武,2013:84)在《〈甜牙〉:原谅的伦理与情感》(2013)中,尚必武重点考察了麦克尤恩新作《甜牙》中“原谅”行为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和情感元素,认为情感使得作品中的小说人物置身无所适从的伦理困境,最终做出了“假背叛,守真情”的伦理选择。在《成长的不能承受之轻:麦克尤恩〈水泥花园〉的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2014)中,尚必武分析小说人物杰克、朱莉、汤姆、苏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伦理问题及其蕴含的文学价值。在《儿童福祉的意义探寻与守护方式:麦克尤恩新作〈儿童法案〉中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2015)中,尚必武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重点阐述了菲奥娜对儿童福祉的理解与守护,认为“生命乃是儿童最根本的福祉;守护儿童的生命是捍卫儿童福祉的最基本职责;法官对儿童福祉所承担的守护角色不应狭义地局限于法庭的高墙之内,而需延伸至法庭之外的整个社会生活”(尚必武,2015:53)。在《〈果壳〉:伦理困境的囚徒》(2017)一文中,尚必武重点解读了麦克尤恩新作《果壳》中“果壳”所蕴含的三重伦理隐喻,即“私欲的果壳”“诗歌的果壳”以及“子宫的果壳”。“私欲的果壳”围绕胎儿叙述者“我”的叔父克劳德和母亲特鲁迪展开。他们片面追求物质的欲望和对性欲的满足,迷失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合谋下药毒害了“我”的父亲,触犯了弑亲的伦理禁忌。“诗歌的果壳”围绕“我”的父亲约翰展开。针对妻子特鲁迪和弟弟克劳德之间的不伦关系,约翰试图用朗诵诗歌来挽回自己的婚姻,恢复错位的家庭伦理身份,而其努力的失败凸显了特鲁迪对伦理

教诲的排斥。“子宫的果壳”围绕叙述者“我”展开,尽管“我”还是一名尚未出生的胎儿,但是“我”亲耳听到了母亲和叔父试图毒害父亲的图谋。在无力行动的胎儿身份与有心复仇的儿子身份之间,“我”在客观上无可奈何、未能拯救父亲于危难之际,同时“我”又受制于自己同母亲的亲情关系,在主观上导致了复仇时的犹豫与延宕(尚必武,2017:27-44)。

此外,近期国内学界还发表了关于麦克尤恩其他作品的研究。例如,冯涛在《麦克尤恩“悬崖撒手”,〈阿姆斯特丹〉破除“我执”》(2011)一文中,以《阿姆斯特丹》为例,讨论了麦克尤恩的创作转型。杨金才在《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2009)一文中,以麦克尤恩的《爱无可忍》为例,指出麦克尤恩“是一位擅长自我反省的作家”。他认为,该部作品“将科学与虚构结合起来,一方面揭示了人类的贪婪与欲望无度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科学可以增强人的知识,但排除不了人的欲望及其探索未知复杂性的需求”(杨金才,2009:57)。杨元在《“爱”因何“无可忍”:评〈爱无可忍〉的理性主题》(2011)的文章中认为《爱无可忍》戏剧化地呈现了爱情与理性背离的主题,并借用理性与爱情这个显性主题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反宗教立场。刘春芳在《〈心理之城〉中的荒原后都市摹写》(2012)一文中,分析了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心理之城》,认为该作品通过对四个人物的不同层级、不同侧面的心理现象的精准刻画,揭示了荒原后都市状貌和人性生态。

引人侧目的是,国内学界在最近两年集中发表了多篇关于小说《星期六》的评论文章,一时间使得该部作品成为国内麦克尤恩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李菊华在《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交往思想》(2013)一文中,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审视了作者麦克尤恩对当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工具性交往行为的批判。林莉在《论〈星期六〉的空间叙事策略》(2013)一文中,从当下流行的空间叙事理论解读了这部作品中的多层次的空间描写,凸显了“后9/11”时代人类的忧虑。申圆、史志康在《伊恩·麦克尤恩小说〈星期六〉中的景观社会》(2013)一文中从“作为景观的建筑”“作为景观的商品”和“作为景观的媒介”三个层面,分析了作品中复杂的都市映像。宋艳芳在《小说何为?——从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看小说的功能》(2013)中从“文化话语”“伦理范式”“预言方式”和“主观模式”四个层面讨论了小说的功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尤恩还被写进了国内数部英国文学史著作。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麦克尤恩格外受到英国文学史撰写人员的注意。例如,高继海的《英国小说史》(2003),阮伟、徐文博、曹亚军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4),侯维瑞、李维屏的《英国小说史》(2005),蒋承勇的《英国小说发展史》(2006),王佐良、周珏良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2006),王守仁、何宁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6),王守仁、方杰的《英国文学简史》(2006),瞿世镜、任一鸣的《当代英国小说史》(2008),刘文荣的《当代英国小说史》(2010)都用一定的篇幅对麦克尤恩的生平和作品做了简要介

绍,其中不乏精彩评论。瞿世镜、任一鸣两位学者对麦克尤恩更是赞誉有加,认为他的作品“清晰有力地描绘和说明了一些当代英国社会现象”(瞿世镜、任一鸣,2008:325),是“可读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瞿世镜、任一鸣,2008:332)。将麦克尤恩写进文学史,无疑反映出国内主流学术界对这位当代英国作家艺术成就的认可。

#### 4. 麦克尤恩研究的未来任务与方向

总体上看,20年来,麦克尤恩研究在中国有逐步深入和扩大的趋势,但同时又必须承认,我们的研究远不能和国外研究相提并论:现有成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研究对象过于集中、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严重;研究盲点较多,分析视角狭窄;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成果等。为了进一步推进新时期我国的麦克尤恩研究,使之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如下五条路径作为建设性参考。

(1)扩大作品研究范畴,提升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赎罪》《时间中的孩子》等部分小说作品,而麦克尤恩作为当今英国文坛的多面手,其创作的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譬如,儿童小说《露丝·白兰》《梦想家彼得》;戏剧《模仿游戏》、电影剧本《农夫的午餐》《酸甜》《好儿子》等作为麦克尤恩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未被纳入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未来的麦克尤恩研究不仅需要考察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而且需要将其创作的其他类型作品纳入考量范畴,有机地建构麦克尤恩创作的各类作品之间的文学生态链,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双重层面上提升我国麦克尤恩研究的学术层次。

(2)开辟新的研究视角,深化研究内涵。就研究视角而言,现有研究成果大都聚焦于麦克尤恩作品中的成长主题、时间元素、后现代叙述手法、伦理道德等论题,而忽略了麦克尤恩作品中的许多其他内容,如女性主义、历史书写、政治意识、心理再现、科技命题以及生态关怀等。因此,现有研究略显批评视阈狭窄,理论深度不足。若要使麦克尤恩研究在纵深上有所突破,就需要在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上开辟新的途径。学者们不妨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适当借鉴、援引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叙事学、生态批评、认知科学等多种批评理论,从多维视角深入发掘麦克尤恩作品中蕴藏的思想内涵,展呈麦克尤恩精妙绝伦的艺术手法,由此进一步拓展麦克尤恩的批评视阈。

(3)考察麦克尤恩作品与媒介传播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界和普通读者同时首肯的作家,麦克尤恩的成功与媒介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其自身的文学作品也经常成为电影改编的对象。迄今为止,麦克尤恩共有七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分别是《夏日里的最后一天》(1984)、《陌生人的慰藉》(1990)、《水泥花园》(1993)、《无辜者》(1993)、《立体几何》(2002)、《爱无可忍》(2004)以及《赎罪》(2007)等。但是,

“实际上,麦克尤恩对电影的介入要远宽泛于此,而且也暗示了作家介入电影世界的其他方式”(Higson, 2006: 63)。麦克尤恩本人精通艺术,还撰写了两部歌剧、四部电影剧本。在媒介传播时代,探究麦克尤恩的作品原著与电影改编、麦克尤恩的小说创作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互通关系,势必有助于深化麦克尤恩研究的深度,同时也利于洞悉麦克尤恩的媒介艺术观。

(4)拓展研究麦克尤恩及其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在麦克尤恩写作生涯中,既有其个人的创作突破与革新,但同时也有他对英国文学创作传统的继承。在英国文学的创作传统和变革语境下辨析麦克尤恩与同时代的作家如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其前辈作家如英国的爱丽丝·默多克,德国的托马斯·曼,奥地利的弗朗茨·卡夫卡,美国的约翰·厄普代克和诺曼·梅勒、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等人之间在作品主题和文体风格上的异同,有利于考察麦克尤恩的创作思想及其嬗变。

(5)翻译和引进国外麦克尤恩的批评成果,参与麦克尤恩研究的国际交流。国外学界对麦克尤恩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成果卓著。横比看来,我国学者对国外麦克尤恩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严重不足。目前,除由申丹翻译的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以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为例》(2007)、柯英翻译的格雷格·杰拉德的《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和生态批评的未来》(2010)以及裘德翻译的《通向真实的隐性文字——伊恩·麦克尤恩访谈》(2012)外,未见有其他关于国外麦克尤恩研究成果的译介。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国外麦克尤恩研究成果的积极译介与批判借鉴,不仅可以丰富学术史料,为国内学者提供一个较高的研究起点,开阔研究视野,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突显本土视角,形成研究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并最终取得超越性和突破性的成果,进而反哺国外的麦克尤恩研究,与麦克尤恩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接轨,形成国内外麦克尤恩研究互动交流、平等对话的格局。

当下,国内麦克尤恩研究的学术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学术氛围愈加宽松活跃,学术资料的采集和获取也较之前更为便利。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脚踏实地,摒弃浮躁学风,走出低层次重复研究的怪圈,一定可以开创我国麦克尤恩研究的美好未来。

#### 注释:

- ①余华,《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伊恩·麦克尤恩著,《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 ②麦克尤恩,《临死的瞬间》.汪义群,译,《外国文艺》1992年第2期第55页。
- ③《伊恩·麦克尤恩小说选》(杨向荣,译,《外国文艺》2000年第4期)第3页。
- ④唐建清.《我们丢失了什么》,伊恩·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何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年第4-5页。

⑤《水泥花园》. 裘德,译,《外国文艺》2006年第6期,第3-5页。

⑥《小说五篇》. 杨向荣,等译.《世界文学》2005年第5期第5页。

#### 参考文献:

- [1] Higson, A. Fiction and the Film Industry [G] // J. F. English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Malden: Blackwell, 2006.
- [2] Quigley, M. M. & Ian McEwan [G] // Kastan, D. S.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 Wells, L. Ian McEwan [G] // Shaffer, B. W. *The 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1.
- [4] 蓝纯. 评《陌生人的安慰》[J]. 外国文学, 1998a(6): 42-45.
- [5] 蓝纯. 伊恩·麦克尤恩其人其作[J]. 外国文学, 1998b(6): 23-27.
- [6] 陆建德. 文明生活的本质——读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J]. 世界文学, 2000(6): 289-300.
- [7] 瞿世镜,任一鸣. 当代英国小说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8] 尚必武. “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 外语教学, 2012(3): 82-85.
- [9] 尚必武. 形式美学的道德旨归:麦克尤恩《家庭制造》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 江西社会科学, 2013(2): 84-88.
- [10] 尚必武. 儿童福祉的意义探寻与守护方式:麦克尤恩新作《儿童法案》中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J]. 外国文学研究, 2015(4): 53-63.
- [11] 尚必武. 《果壳》:伦理困境的囚徒[J]. 文学跨学科研究, 2017(1):27-44.
- [12] 宋艳芳,罗媛. 谁该赎罪? 何以赎罪——《赎罪》的伦理经纬[J]. 外国文学研究, 2012(1): 83-90.
- [13] 王悦.《陌生人的慰藉》:不可靠的人物方阵及其叙述[J]. 国外文学, 2011(2): 120-128.
- [14] 王佐良,周珏良. 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 [15] 杨金才. 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J]. 外国文学, 2009(6): 55-61.

责任编辑:陈 宁

# 语篇翻译连贯机制的综合理论方法研究

马海燕 曾利沙

(海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10)

**摘要:**将心理空间理论用于翻译过程中的语篇连贯评价具有可描述性的方法论意义,但不足以解释语篇翻译连贯中各种语境因素相互制约的认知机制,故本文尝试融通心理空间和语境参数理论,探索一种可描述、可阐释、可印证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对语篇翻译连贯过程中的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结构缺省、语义嬗变及选词择义的心理机制做出有理据的阐释。

**关键词:**心理空间;语境参数;语篇翻译;连贯;认知机制

## A Study of Coherent Mechanism for Text Translating with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Methodology

MA Haiyan ZENG Lisha

**Abstract:** Applying mental space theory (MST) to the evaluation of textual coherence in translating is of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its descriptiveness, but it is not explanatory 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constraint of various contextual factors. This paper, by integrating MST with contextual parameters theory (CPT), aims at finding a descriptively and interpretively analytic framework whi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ethodology to explain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polysemy, ambiguity, fuzziness, structural default, meaning evolution, contextual meaning decision, etc. involving coherence in translating.

**Key words:** mental space; contextual parameters; textual translating; coherence; cognitive mechanism

---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认知语境等值的界面研究”(14YJC740064),海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项目“高校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的综合研究”(QYJ13516009),2016—2017年度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现代技术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Hyjg2016-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海燕,女,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导,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翻译学、认知语言学研究。

曾利沙,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翻译学、应用翻译学、语篇一认知语言学、商务英语研究。

## 0. 引言

语篇的连贯性既可以表现为文本表层结构上的衔接,也可以体现为深层结构中语义的连贯(Halliday & Hasan,2001),对语篇连贯的识解关涉大脑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语篇翻译连贯机制是指译文在实现语篇连贯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语篇翻译连贯机制研究涉及对语篇识解心智活动轨迹的描述,以及揭示主客互动的认知规律并给予可证性阐释,是翻译学理论研究范畴拓展的重要任务。语篇连贯和衔接是必须遵循的两个组篇原则(Halliday & Hasan,1985;胡壮麟,2002),语篇连贯由深层结构的认知机制所决定,不能简单地根据衔接符号判断语义连贯(Beaugrande & Dressler,2002)。当衔接功能语符空缺时,语义连贯只能依赖人的语篇认知机制建立。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空间理论为解释语篇连贯机制的心智活动提供了有力分析工具(Fauconnier,1994;Fauconnier & Sweetser,1996等),也为语篇翻译连贯研究提供了可供描述的方法(魏在江,2010)。我们认为,心理空间理论能对语篇翻译连贯与否做出直观的形式化描述,并能揭示语篇连贯的脉络发展,但无法解释实现语篇连贯各种语境因素相互制约的认知机制,而语境参数论则能补其不足,它将语境具体化为一系列可定性描述的概念或命题参数,从宏—微观层面的操作视阈拓展上对语篇翻译中的多义、歧义、模糊、语义嬗变、语义生成理据和连贯机制提供可行的阐释框架(曾利沙,2002;马海燕,2016)。本文尝试融合心理空间和语境参数理论,探索一种更为完整的语篇翻译连贯机制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 1. 心理空间与语境参数综合理论的建构原理

心理空间是福康涅(Fauconnier)等人发展的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Fauconnier,1994;Fauconnier & Sweetser,1996;Coulson 2001;Fauconnie & Turner,2002),主要探索语言形式的幕后认知。心理空间是人们思维和表达时构建的信息集合,随着思维和话语展开而构建和改变,各种不同的认知映现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心理空间,形成心理空间网络。福康涅(1994/2008:1;1997:41)提出识别跨空间元素连接的“可及原则”,即对一个元素的描写可以用来识别其相对应的其他元素。语篇构造的认知过程如下:语篇空间网络像半秩序化的矩阵,语篇构建从基础空间  $B$ (base space)开始,然后进入若干焦点空间  $M_1, M_2, \dots, M_n$ 。焦点空间内容常为概括或评价性语句,具有触发可及性视点空间的功能;焦点空间往下发展进入可及的下层视点空间,是对焦点空间的具体说明,其连贯的逻辑功能是为特定焦点空间提供印证的事例或特征描述,形式表征为  $M_{1-1}, M_{1-2}, \dots$ 。特定焦点空间  $M$  还可发展为可及的次级焦点空间,用小  $M$

表示(如  $M_{1-M_1}$ ,  $M_{1-M_2}$ ),次级焦点空间之下亦可下辖若干视点空间,依此发展,最终形成宏大的空间网络。但是,不管语篇如何发展,基础空间、焦点空间和视点空间之间都能建立连贯可及性心理网络路径。以此方式建立的心理空间由框架和认知模型支撑,其外在形式由衔接词进行跨空间的成分或结构连接(Fauconnier, 1997:38-41)。心理空间网络建构能对语篇发展复杂的内在关联性提供直观有效的描述方式,亦为语篇翻译连贯与否的可描述性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方法,但不足之处在于不能解释语篇翻译应如何实现连贯的认知机制,亦无法解释不连贯的译文应如何操作,故对语篇翻译研究仍有很大局限性。

语境参数理论是由语境理论发展演化而来。语境理论研究最初的特点主要是对语境的分类和要素概括(Malinowski, 1935; Firth, 1959; Hymes, 2006),后来范戴克(van Dijk)(2008, 2009)从社会语言学、认知、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语境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语境模型和语境参数的概念,并认为语境模型由话语参与者主观心理构建,对话语的形成和理解起关键作用,是连接话语、交际情景和社会的无形纽带。熊学亮(1999:124)从认知方面对语篇语境进行了定义,认为认知语境是人对于具体语言表达的认知经验总结并以图式或草案的形式存在于大脑中形成认知背景,这些认知背景反过来又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新的语篇表达。在语篇翻译研究中,曾利沙(2002)明确提出语境参数论,并进行了实证性描述研究。语境参数论将语境视为由  $N$  个参数构成的集合,认为参数之间是多维互参或映射或制约关系,如宏—微命题互参、整体部分互参、概念义素映射、关系特征映射、常规经验制约等认知机制。语境参数的设定旨在体现语篇语符之间潜在联系或各种言外相关知识或信息对文本的制约关系,以及反映对话篇连贯机制运作进行识解的心理表征。语境参数理论可以弥补心理空间理论的不足,二者的结合对于语篇翻译连贯认知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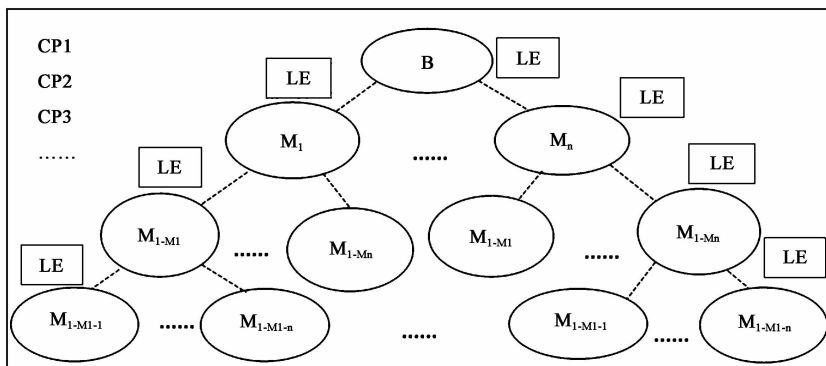


图1 语篇翻译连贯机制示意图

本研究结合心理空间和语境参数理论,构建出一个用于分析语篇翻译连贯机制的理论框架(见图1)。该框架中的小方框(LE)代表语篇的语言表达,属于表层语言结构;椭圆代表各个心理空间:B表基础空间, $M_1$ 、 $M_n$ 表焦点空间, $M_1$ 、 $M_n$ 表次级焦点空间, $M_1$ 、 $M_n$ 后的数字1、n表次级焦点空间下辖的视点空间;虚线表示语篇心智运作发展方向及心理空间的上下可及性。随着语篇的展开,心理空间可以无限往下延展,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空间网络,在此过程中语境参数(CP)起到参照、映射、制约等作用。语境参数的设定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与语篇的内容相关。

## 2. 该综合理论方法在语篇翻译连贯机制描述中的运用

该综合理论方法的工作原理在于先从心理空间角度对语篇连贯进行描述,判断译文是否存在不连贯、语义结构缺失、歧义、模糊等问题,审视认知层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然后运用语境参数理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和修正。见例1(毛荣贵等,2005:18):

段1 Mike Veeck had begun his baseball career in 1976 as a ticket salesman with the Chicago White Sox[1]. By 1992 he was the owner of several minor-league teams [2] *and* had become well known for his promotions[3]. He put fans in rubber fat suits [4]and then had them sumo wrestle at home plate [5]. He hired a blind announcer [6]. (Para. 1)

段2 His outrageous promotions continued with Tampa Bay[1]. On the team's Lawyer Appreciation Night, each lawyer was charged twice the ticket price[2] and then billed again every half inning[3]. The proceeds went to Legal Aid[4]. (Para. 2)

段3 In Mike's case, the apple hadn't fallen far from the tree [1]. His father, Bill, returned from World War II with a badly injured right leg[2]. Ultimately, the limb had to be amputated, and Bill Veeck was fitted with a wooden prosthesis[3]. (Para. 3)

段4 But he was not to let such setbacks defeat him[1]. Bill eventually became the owner of three major-league baseball teams[2]. He was known for luring in fans with such crowd-pleasing devices as the exploding scoreboard, which was his own invention [3]. (Para. 4)

该节选语段的背景是迈克(Mike)在其棒球事业蒸蒸日上时突然得知女儿即将面临失明危险,深受其父比尔(Bill)坚强乐观精神的影响,他放下工作,开始带着女儿游山玩水,想让女儿在完全失明前充分领略人生的美好,将大自然的美景永存记忆之中。所引段落是开头有关迈克热衷于棒球事业并如何获得成功。

## 2.1 心理空间对语篇翻译连贯的图式化描述

我们先从可及性原则对其进行描述,将语篇发展的心理空间和语篇表层语言表达整合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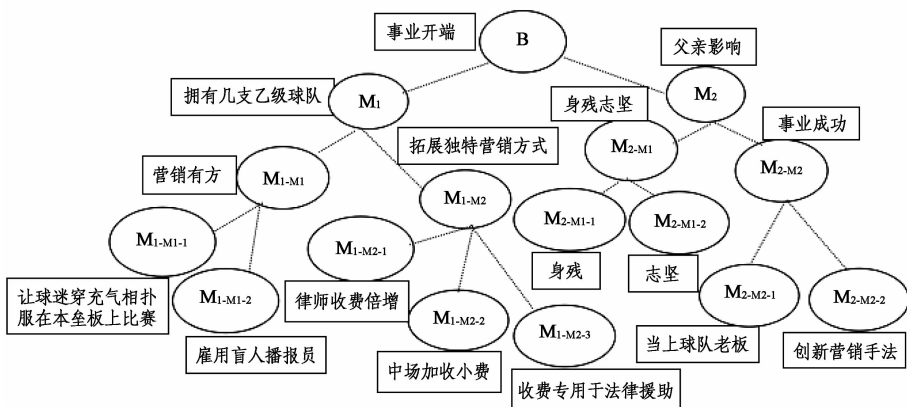


图2 语篇发展的心理空间与语篇表层语言表达整合示意图

该整合图旨在说明心理空间网络和语篇表层结构的相互映现性与连贯可及性路径。首段句[1]以迈克棒球事业开端为基础空间B,句[2]进入焦点空间M1,讲述其事业发展状况,成为几支棒球联盟球队老板;句[3]为次级焦点M<sub>1-M1</sub>,内容是其因营销有方而声名远扬;M<sub>1-M1</sub>下辖两个视点空间M<sub>1-M1-1</sub>和M<sub>1-M1-2</sub>,分别为句[4,5]至句[6],讲述:让球迷穿上充气相扑服在本垒板上比赛+雇用盲人播报员。段2句[1]讲述其事业继续拓展的独特营销方式,故从属于焦点空间M<sub>1</sub>,并形成次级焦点空间M<sub>1-M2</sub>,层级上与段1中次级焦点空间M<sub>1-M1</sub>并列。次级焦点空间M<sub>1-M2</sub>下辖句[2]至句[4],形成M<sub>1-M2-1</sub>,M<sub>1-M2-2</sub>和M<sub>1-M2-3</sub>三个视点空间,分别讲述迈克在坦帕海湾队别出心裁的营销手法:开辟律师晚间专场收费倍增以及中场加收小费+收费专用于法律援助金。段3与段4发展为另一焦点空间M2,讲述迈克执着于棒球事业的独特营销手法源于父亲的影响,下属两个次级焦点空间M<sub>2-M1</sub>和M<sub>2-M2</sub>(它们隐性存在,可由下层视点空间推导出来)。M<sub>2-M1</sub>下辖两个视点空间:M<sub>2-M1-1</sub>身残(段3句[2,3]+M<sub>2-M1-2</sub>志坚(段4句[1]));M<sub>2-M2</sub>下辖两个视点空间:M<sub>2-M2-1</sub>成功当上球队老板(段4句[2])+M<sub>2-M2-2</sub>创新营销手法(段4句[3])。该视点空间分别与首段视点空间及下文将要讲述的迈克的经历及性格特征等空间形成照应,各个心理空间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形成立体连接的巨大心理空间网络。该网络还可随着语篇发展继续扩大,但不管怎么发展,各空间之间必须建立起认知关联性和发展路径,相互之间必须遵循可及原则。再看相关译文的连贯可及性问题:

原译:迈克·威克的棒球事业始于1976年,当时他是芝加哥白索克斯队的一名售票员。到了1992年,他已经是几支乙级联盟队的所有人,并且因为他连连晋升而声名远播。//? 他曾让球迷穿上宽大的橡皮服装,并让他们在本垒板上相扑格斗。他还雇了一个盲人播报员。

他一再晋升的势头在转入坦帕海湾队后仍然继续。//? 在球队的律师晚间专场上,每位律师要支付两倍于票价的入场费,而后每半局还要再收费一次。所得的收益全部都归入法律援助金。

对迈克来说,这样的事早已不再新鲜。//? 他的父亲比尔从二战战场归来时,右腿严重负伤。最终,受伤的大腿不得不被切除,比尔·威克就此安上了一个木质假肢。

但他绝不是一个会被这样的挫折击倒的人。比尔最终成为职业棒球大联盟三支球队的所有人,这三支球队分别是圣·路易斯布朗队、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和芝加哥白索克斯队。他还用自己发明的爆炸积分板来吸引球迷、招揽观众,从而远近闻名。

(见毛荣贵等,2005:18)

说明:划线部分和符号//? 表示译文在概念和命题之间缺乏连贯,违反语篇可及性原则,造成读者对迈克的事业发展、身份特征、人物性格和营销理念受父亲的影响等难以把握,感到困惑:该语段是讲述迈克的晋升吗? 焦点空间  $M_{1-M1}$  译文“因连连晋升而声名远播”无法下辖  $M_{1-M1-1}$  和  $M_{1-M1-2}$ ,因下层视点并非讲述迈克怎样连连晋升,故焦点空间与视点空间之间不连贯可及。同理,段2 焦点空间  $M_{1-M2}$  译文“一再晋升的势头”与下层视点空间  $M_{1-M2-1}$  和  $M_{1-M2-2}$  之间不可及,因下层视点并非具体说明“晋升势头”,在心理空间层级上不具可及性。

段3 首句“In Mike’s case, the apple hadn’t fallen far from the tree”起到心理语篇导向作用:作为空间建造提示语而触发构建新的焦点空间  $M_2$  (比尔的影响)。该句心理表征整合了两个心理空间:迈克的亲属空间和树木空间,迈克和苹果相互映射获得类似属性特征儿子/果实;比尔/树木相互映射获得相同属性特征“父辈”,亲属空间和树木空间在类属空间的相互映射下,其结构和语义特征共同投射到整合空间,从而迈克/比尔的关系获得了同苹果/苹果树的关系同样的属性特征。正如苹果从树上落下来,果实会发芽长大,此比喻说明果实的本质特征脱离不了母本树木的属性特征,故有“不会落得太远”之喻。该习语通过整合空间形成“儿子迈克和父亲比尔之间的属性特征的承传影响性”概念表征。而译文“对迈克来说,这样的事早已不再新鲜”是指什么旧事? 如何与下文产生连贯可及? 此译文无法建立起承上启下各个层级心理空间的联系,迈克与比尔的关系也无法在心理空间中得到映射。

译文仅注意到句[1]至句[3]之间的局部连贯性,误读为迈克从球队售票员到球队老板之间的连贯。正如译者所言:“原文说的是迈克从一个售票员成了球队的所有人,这显然并非一次晋升所能达到的。”(毛荣贵等,2005:18)显然,译者忽略了语段

内部和语段之间的整体连贯可及性,其问题有五个:①promotions 的义项选择不当;②衔接词 for 的因果语义关联不符合经验常规;③段 3 的过渡性结构语义不连贯;④未能正确把握习语的语境化语义嬗变;⑤焦点与视点空间命题语句间不具连贯可及性。心理空间理论方法能建立起语篇连贯的心理网络空间,说明焦点和视点之间是否连贯可及,语境参数论则有效说明上述问题,尤其是解释如何才能实现语篇翻译的连贯性。

## 2.2 语境参数论视角下的语篇连贯解析

语篇语言学认为,体现主题的宏观命题必须为语篇所有其他命题所说明,即宏—微观命题之间应具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认知框架内得到维系。范戴克(1980:v)指出:宏观命题结构与知识的组织有关,任何语篇处理若不考虑信息的宏观组织及其过程都是不合理的,处理者能根据给定的主题解释一个话语或话语的一部分。主题对语篇/段发展具有阈限性,微观命题发展受制于主题(陈忠华,2004:181-187)。语境参数论认为,要正确解读语篇/段,读者首先须通过对显性或隐性关联性概念或命题进行分析、识别、推断、抽象、综合、概括等,建构出相应的题/段旨参数,才能明确该词的语境连贯性语义倾向。对于语篇翻译中的多义、歧义、模糊、语义嬗变等问题,译者还应从识别和建构宏—微观关联性参数入手,才能充分认识到语篇/段内在的连贯机制。以上述语段中多义概念“promotions”为例,其词典义项有四:①提升,晋级;②促进,发扬,提倡;③(企业等的)发起,创建;④(商品等)宣传,推销;推销活动(《英汉大辞典》)。确定“promotions”所涉语境参数有:

①题旨参数:营销有方;②方式参数:独特营销手法(段 1/段 2 中的“promotions”分别跟有 2-3 个营销手法事例,标记为 P1; P2/ P1; P2; P3);③空间参数:棒球赛场;④时间参数:1992 年(成为乙级球队老板)后;1998 年(任海湾队营销副总裁);⑤个人参数:职业(经营棒球队)、身份(老板)、父亲影响(成功经营甲级棒球队)。这些参数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印证。孤立看“promotions”无法决断其义项,但从参数映射和制约关系看:主题参数“营销有方”统辖了语篇的内在发展,对“有方”展开描写,各命题语句在语篇功能上形成宏—微观互参关系。译者在心理空间和参数推导上建构起连贯可及性,故只能选择释义项④“宣传,推销”等作为判断“promotions”义项析取的语义基础。因为受迈克的老板身份参数制约,“promotions”是指他独出心裁的“营销有方”(Promotion Strategies,简化为 P. S.)。综合而言,我们将两处焦点空间内容的“well-known”(promotions)和“outrageous”(promotions)视为主题触发语,在认知机制上视为评价参数,并认定与下属视点空间之间构成评价和论据互参可及关系: $M_{1-M1} \{ M_{1-M1-1}, M_{1-M1-2} \}; M_{1-M2} \{ M_{1-M2-1}, M_{1-M2-2}, M_{1-M2-3} \}$ 。我们将从主题触发语句抽象概括出的“营销有方”视为语段题旨,统辖或制约语段中微观语句或概念的语义关联性。下面将心理空间和语境参数理论整合起来,以便清晰地看出语篇连贯可及的参



数关系(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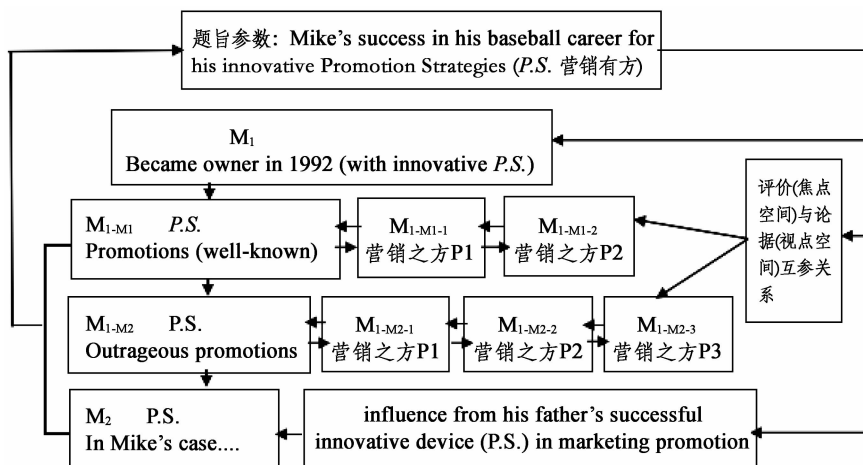


图3 语篇连贯可及的参数关系示意图

左边箭头表示主旨是通过语段中主题触发语及其关联性参数特征在认知思维中抽象概括而成。我们据此演绎出语篇连贯认知机制之一:若一个多义语词在语境中以评价性参数(焦点空间)出现时,且该语词的概念语义为后续若干事例或视点空间所印证,二者之间则构成评价与论据互参关系,该语词义项的析取基于对其论据功能特征的语义抽象概括。

段3首句习语“*In Mike's case, the apple hadn't fallen far from the tree*”引出焦点空间,其确切语境化含义主要由段4形成的互参关系得到映射。段4讲述比尔身残志坚,通过奋斗最终成为三支甲级棒球队老板,并且不断创新营销手法,事业十分成功。热衷于棒球事业的比尔以其坚韧的性格和创新理念影响着儿子迈克,即“从苹果树掉下的苹果不会太远”的隐喻和父亲对儿子影响的亲属相似性特征得到映射。其中显性关联性概念有“*luring in fans // crowd-pleasing devices // his own invention*”,并映射到该习语的语境化含义之上。由此,我们可演绎出语篇翻译连贯性推导机制之二:在特定语境中,习语的语境化含义嬗变或语义识解取决于后续语句中显性或隐性的关联性概念或命题语义特征的抽象与映射。这种明示义使不熟悉该习语的汉语读者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达到最大的语境化效果。至此,将原译修订如下:

1976年,迈克·威克开始在芝加哥白索克斯棒球队销售门票,这是其棒球事业的开端。到1992年,他已坐拥几支乙级联盟球队,并因独特的营销手法而远近闻名:让球迷穿上充气相扑服在本垒板上参与比赛,聘用盲人解说员进行现场讲解。

在受命担任坦帕海湾甲级队副总裁后,他的营销手法更加独出心裁。特辟了个晚间律师专场,门票价格是平时的2倍,中场休息还加收小费,其所得收益全部用于法律援助基金。

迈克对棒球事业的执着精神和创意独特的营销手法,秉承自其父比尔。比尔从二战战场归来时,右腿严重负伤,最终不得不截去,安上木质义肢。

但比尔没有被挫折击倒。他最终成为圣·路易斯布朗、克里夫兰印第安人和芝加哥白索克斯三大职业棒球联盟队的所有人,因采用自己发明的爆炸式记分牌招揽球迷常为人津津乐道。

### 3. 该综合理论方法的可印证性

该综合理论方法在解决同类问题时不仅具有普适性,用其推导出来的语篇翻译连贯机制亦可对语词的语境化语义嬗变进行识解。例2(何兆熊,2013:1):

Just the other week, Newsweek reported a boom in electronic books. The idea is to put books onto discs that you can plug into your customized book-displaying computer. Here's a *swell idea* of retarded technology. On the one hand, you can buy a \$900 or \$9000 book-reading computer that you can feed with \$20 discs of your favorite books. It's cumbersome. If you take it to the beach, it gets clogged with sand. You can't use it as a pillow. If it slips off the kitchen counter, it smashes.

该语段中的难点在于对画线部分“swell idea”的语义识解。“Swell idea”是作者对“把书的内容装入电脑”这一技术的评价。swell 的词典释义有:“膨胀,变肿”(动词),“波涛起伏”(名词),“极好的,时髦的”(形容词)等,其中动词和名词释义无法与名词 idea 搭配,而形容词的释义项与 idea 搭配时语篇不连贯。从心理空间的可及性进行分析,该语篇的基点空间(作者的基调)是反对弱智技术的过度开发,“swell idea”属于焦点空间,是作者的评价性观点,接下来的下层视点空间讲的都是反面的例证:花900或9000美元买台电子阅读器,把爱读的书目光盘插进阅读器,而光盘才花费20美元;携带不便,若在沙滩上阅读里面会进沙子,还不能当枕头枕;从厨台掉地上会摔破。如果 swell 指的是正面的评价,则与下层视点空间产生熔断,无法形成心理空间的可及性。根据语篇内容,作者的意图是从反面论证现代技术的弱智性(不实惠),进而强调自己观点:反对一些无用技术的开发。因此,我们可排除 swell 的词典释义项,而具体的语境意义则需进一步分析。利用相关语境参数:否定评价性参数 cumbersome(笨重的),性质参数 retarded(弱智的),对比性参数 \$9000 vs \$20,价值参数 fragile(易破),得知作者均是从反面论证对该技术的消极态度。人们花很多钱却

买回一个实用价值很小的技术产品,岂不是愚蠢之举?此设计是否靠谱?至此,我们可以推导出“swell idea”的语境化意义形成路径:弱智型技术的理念不切实际→不切实际来自于“膨胀”→脑子膨胀→想法膨胀过度→不切实际→unreliable idea。最终得出“swell”的语境化嬗变为unreliable。将其推导过程中共现的语境参数关系如图4所示(箭头表示意义生成的语境参数关系及其认知机制的推导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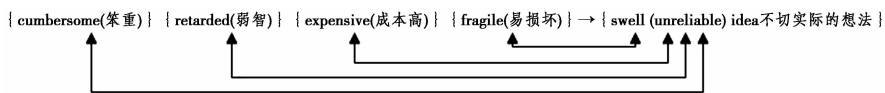


图4 意义生成的语境参数关系及其认知机制的推导模式图

该推导过程与例1中推导出的语篇连贯机制相互解释,即语词在语境中以评价性参数出现,且该语词的概念语义为后续若干事例或视点空间所印证时,该语词义项的析取基于对其论据功能特征的语义抽象概括,而语词语境化含义嬗变或语义识解取决于后续语句中显性或隐性的关联性概念或命题语义特征的抽象与映射。

#### 4. 结论

本文把心理空间和语境参数理论融合起来,构建出一种可描述、可阐释、可印证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对语篇翻译连贯过程中的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语义嬗变及选词择义的心理机制做出了有理据的阐释。本研究的意义有三:其一,语篇翻译连贯涉及对原文的理解问题,故探讨语篇/段连贯认知机制的综合理论方法对英语语篇阅读理解或阅读教学研究具有参考作用;其二,译者在语篇/段翻译过程中力求连贯通顺,但连贯与否需要一套可用于自证的手段,本研究能提供一种可行方法;其三,目前国内外语篇翻译连贯批评中缺乏可描述、可阐释、可印证、可操作的理论方法,尤其是缺乏客观有效的他证性批评方法论,本研究能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理论方法。语篇/段翻译连贯所呈现的复杂性要远远超出本文所论述的情况,还可根据不同的情况演绎出不同的连贯机制,并给予实践经验模块总结和理论表征,故其研究空间还很大,值得深入探讨和拓展。

#### 参考文献:

- [1] Beaugrande, R. A, de & W. Dressler.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M]. XIV Congress of Linguists, Berlin, Digitally Reformatted, 2002.
- [2] Coulson, S. *Semantic Leaps: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Fauconnier, G.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Beijing:

-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4/2008.
- [4] Fauconnier, G. & E. Sweetser. *Space, Worlds, and Gramma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5] Fauconnier, G. & M.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6]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7-41.
- [7] Firth, J. R. *The Treatment of Languag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London: The Medial Press, 1959.
- [8]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9]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10] Hymes, D. H. 1964.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ve Events. Excerpts From Introduction: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G] // Mey, Jacob L. et al (ed.). *Journal of Pragmatics*. Elsevier, 2006: 323.
- [11] Malinowski, B.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2) [M]. London: Routledge, 1935.
- [12] van Dijk, T. A. *Macrostructure-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Global Structure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M]. Hillsid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80.
- [13]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8-106.
- [14] 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5] 陈忠华, 等. 知识与语篇理解——话语分析认知科学方法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16] 马海燕. 认知语境参数对文学翻译中语义的阐释作用 [J]. 外国语文, 2016(1): 123-128.
- [17] 何兆熊. 综合教程(第六册) [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1.
- [18] 胡壮麟. 语境研究的多元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3): 161-166.
- [19] 毛荣贵, 沈沁, 焦亚萍. 新美国短文精品选译: 轻松走出忧郁 [G].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18.
- [20] 魏在江. 概念转喻与语篇连贯——认知与语篇的界面研究 [J]. 外国语文, 2010(2): 57-61.
- [21]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22] 曾利沙. 论“操作视域”与“参数因子”——兼论翻译学理论范畴——“文本特征论”的研究 [J]. 现代外语, 2002(2): 154-164.

责任编辑: 冯 革

#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自然语言<sup>①</sup>

威廉·A. 皮克林 著 王仁强<sup>1</sup> 杨旭<sup>2</sup> 李娜<sup>3</sup> 译

(1.3. 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2.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社群语言与复杂系统在本质上相似。文章认为,语言由构成运作整体的互动单位组成,具有网络结构、分散控制、涌现、互为因果、远离平衡态以及正负反馈过程等属性。此外,语言还具有适应性,而定义语言适应性的关键在于:个体的语言变异在保持一门语言的稳定和变化中起作用。因此,把自然语言视为复杂适应系统有助于提出理论假设和进行实证检验,复杂系统路径可为认识各种语言现象作出统一连贯的解释。

**关键词:**复杂系统;语言学;适应;社会语言变异

## Natural Language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William A. PICKERING trans. by WANG Renqiang YANG Xu LI Na

**Abstract:** Certain basic properties of complex systems are compared to those of communal languages. It is argued that languages are comprised of interacting units that constitute a functioning whole, with the properties of network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control, emergence, reciprocal causation, far-from-equilibrium state,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 proces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languages also have the property of adaptivity is also discussed. The key problem in defining language adaptivity is found to be the role played by individual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maintaining a language's stability and capacity for change. It is argued in conclusion that considering natural language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serves as a basis for hypotheses that can be modeled and tested empirically, and that the complex systems approach can bring a unity and cohere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verse linguistic phenomena.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学科视域下的分析语词类问题实证研究”(15BYY16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威廉·A. 皮克林,男,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语言学博士,逻辑、认识论和科学史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译者简介:**王仁强,男,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词典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研究。

杨旭,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主要从事语法理论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李娜,女,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词典学研究。

**Key words:** complex systems; linguistics; adaptation;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 0. 引言

把复杂系统理论应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就相关论著发表数量来看,此类研究大概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仅有零星论述或者仅限于多数语言学家所不熟悉的专门领域。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语言学家Jakobson(1990: 474, 483)就断言,语言是动态的、自我调节的目的性系统,但他并未将其发展为详尽的语言学理论。大约在同一时期,法国数学家René Thom把他的突变理论应用到符号学,后来被其他学者所接受并发展为语言不同侧面的突变论模型(Wildgen & Brandt, 2010)。系统概念也被应用到计量语言学研究,该领域滥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Zipf有关力量法则分布的研究(Köhler & Altmann, 2005; Naranan & Balasubrahmanyam, 2005)。20世纪80年代,德国计量语言学家开启的“协同语言学”研究延续至今(Köhler, 2005)。然而,诸如此类的观点对主流语言学影响甚微。

不过,最近20年来,复杂性理论视角的语言学论著明显增加。其中,以一语/二语学习、语篇现象和语言教学为研究对象的应用语言学领域已发展出一整套理论概念,并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进展渐行渐远(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de Bot et al., 2013)。另一个领域是语言演变,目前主要致力于把语言演变同时作为生物和文化进程来研究。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加之言语交际的复杂性,电脑建模在语言演变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Zuidema & de Boer, 2013)。语言类型与其结构特性之间的复杂性关联问题长期被语言学家所忽视(因为19世纪的理论认为欧洲语言具有优越性),而在当前科学背景下学者们已着手对其进行探讨(Sampson et al., 2009)。最近十年来,在语言学传统领域展开了几次复杂系统与语言的大讨论(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Beckner et al., 2009; Kretzschmar, 2015)。从复杂性理论视角开展研究的语言学专门领域还有音系学(Wedel, 2011)、句法学(Boeckx, 2014)、历史语言学(Ehala, 1996; Keller, 1994)、方言学(Kretzschmar, 2009)、认知语言学(Bernárdez, 2008; Frank & Gontier, 2010)和心理语言学(de Bot, 2012; Raczaszek-Leonardi, 2014)。

简言之,复杂系统视角下的语言学研究在众多语言相关学科中依然各自为阵,而且各个学科所开展的复杂系统视角的研究都要求重新审视那些基本概念。虽然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理论主张,但迄今为止尚未基于复杂性理论详细构建出完整的、学界普遍认可的语言理论。尽管如此,语言学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兴趣日增,因为它能对众多语言现象提供统一连贯的解释,并提出可供建模和检测的假设。

## 1.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语言

本节首先介绍复杂系统的主要特征 (Heylighen, 2001, 2008), 接着阐明语言也具有类似特征。切记, 文中所说的语言指社群语言 (communal languages) 而非个人语言 (idiolects)。

复杂系统由动态互动的单位构成, 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为整个系统提供了功能特征。这些单位仅在局部互动, 但这种局部互动能为作为功能整体的更大系统提供支持。人类语言就是这样的动态系统, 系统的互动单位就是说某种语言的个体。对话就是一种言语行为高度依存的局部行为, 可从大脑行为、直接交流背景、个人关系、文化进程、代际语言变化等不同时间维度进行考察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166-169, 240-241)。而在同样可以从不同时间维度进行观察的社群层面, 语言系统作为整体在广阔时空中对说者行为进行调节。

复杂系统中单位之间的互动可以定义为一种网络结构, 进而可以进行数学和电脑建模。有的复杂网络具有无标度性、小世界、聚类等特点, 这些特点加上其他网络属性已被应用到各种社会网络的分析中 (Easley & Kleinberg, 2010)。人类通过语言进行互动对社会网络的形成至关重要。社会语言学家发现, 一门语言使用哪些言语要素 (即社会语言学变异) 通常与年龄、阶层和性别有关。他们还发现, 社会语言学变异及其社会关联对应于社会网络。已有研究者 (如 Fagyal et al., 2010; Mühlenbernd & Quinley, 2013) 对此进行电脑建模。会说多种语言的人自然会参与多个语言网络, 而在多语社群中使用不同语言也是可以建模的 (Minnet & Wang, 2008)。

复杂系统的控制分布在构成系统的各个单位。没有哪个外在的控制者、内部的个体单位或集体单位可以引导系统的行为。语言是分布控制的绝佳案例。语言是通过数代说者集体互动进行演变的, 任何自然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都不太可能由某个祖先或几个先驱创造出来。众所周知, 通过国家语言学会之类的权威机构企图规定语言的变化往往收效甚微。

复杂系统中的单位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衍生出涌现特征。涌现特征是系统作为整体的属性, 不能单单通过或“还原为”系统个体单位的行为就能解释清楚, 但确实是由于系统中的单位互动而涌现出来的。Beckner 等 (2009: 15) 阐述了语言复杂系统研究路径的核心假设: “个人语言是在言语个体通过与社群语言中其他个体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而社群语言的涌现则是个人语言交互影响的结果。”长时间对大量人口进行社群语言涌现研究往往困难重重, 但借助电脑建模可以克服困难; 它“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证明: 特定的基本机制组合起来就会产生一些观察效应” (Beckner et al., 2009: 12)。

作为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 “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对语言习得、语言结构和语言演变做出的解释并不依赖于先天语言机制假设。其中, “涌现”概念非常有

用,因为它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通过记忆、模仿等体现一般认知能力的人类行为就可以演化出复杂的语言结构。复杂系统理论的魅力在于,它能为基于使用的解释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Becker et al.,2009)。在语言学领域,“涌现论”指一批采用涌现一般概念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广义复杂系统的研究(MacWhinney & O'Grady,2015)。

尽管复杂系统的出现是其构成单位个体行为的结果,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后者引起的,但是涌现特征也会限制系统构成单位的行为,使其不会任意发展(即互为因果;参见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59)。语言也是这样的双向过程:一方面,个体的语言创新若被他人模仿,在语言网络中传播,就会导致语言演变;另一方面,个体的语言表现要受制于他所操的语言,因该语言是他要达到交流目的所必须遵守的常规。

复杂系统以远离平衡的状态存在,系统构成单位之间以及系统和环境之间都存在持续的能量流动。能量来源若被切断,系统就会消亡。不需要在社会系统与物质系统或生物系统之间进行严格的类比就可以观察到,若说者(即语言能量之源)死亡或改操其他语言,那么这门语言就会完全消失。正如漩涡消失、有机体死亡或者物种灭绝,导致语言涌现的初始条件和后续互动相当复杂,以至很难精确再现或者重组。因此也难怪人们常把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减少与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相提并论。

反馈过程是复杂系统的另一项重要特征。在复杂系统中,网络中的负面反馈会抑制扰动,促使系统保持稳定;正面反馈会强化扰动,并在整个系统中传导,从而导致变化,若不加以控制便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在复杂系统中,正负反馈的相互作用维持了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也赋予了系统应对环境变化的灵活性。创新用法(比如一个新词、一个新的语法结构或一个新的发音)进入语言其实就是在在一个说者网络中涉及正负反馈的过程。某些创新用法被一小部分关系紧密的群体如家庭或朋友圈所采用并不断模仿(即正面反馈),接着很快就被丢弃(即负面反馈)。其他的创新用法则继续传播,最终成为多数语言使用者的基本装备。语言特征的这种此起彼伏的过程正是语言变化的重要特点。

因为反馈过程的存在,复杂系统会展现非线性行为:扰动即使很小,一旦得到正面反馈,也会导致系统发生巨大变化;同样,扰动即使很大,但若被负面反馈抑制,也只能引起小小的变化。鉴于涉及因素相当复杂,很难准确预测复杂系统的行为。Larsen-Freeman 和 Cameron(2008:85-88)指出,语言演变中相对突发的历史“重建”过程具有非线性特征。

## 2. 适应:语言是否具有适应性?

复杂系统在绝对稳定和无序变化之间保持平衡的方式就是适应。尽管“复杂系



统”和“复杂适应系统”这两个术语经常交替使用,但严格来说只有部分复杂系统具有适应性。语言是稳定和变化的混合体,因为在变化速率上,语言变化快于人类的生物演化,但远慢于文化的发展变化。语言变化作为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已有200年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种解释其成因的理论被广为接受。随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出现,有人把语言变化和生物适应进行比较,但在20世纪这种比较在语言学领域一直备受争议。目前多数语言学家反对这种比较(Labov, 2001:6-15)。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在当代演化理论、拟态学和复杂系统理论的新科学背景下,语言学领域重启有关语言适应的研究(Christiansen & Chater, 2008; Croft, 2000; Mufwene, 2001; Beckner et al., 2009)。复杂系统视角表明,语言确实在以某种方式适应环境。

根据 Heylighen(2001:15),适应可视为存在于系统给定配置和环境给定配置之间的“契合”。换言之,系统能够在特定境况中维持自身并获得成长(注意,复杂系统本身也可视为其子系统和构成单位需要适应的环境)。然而,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系统出现不稳定,进而导致其崩溃。适应系统面对变化维持自身的方式是,“在变化大到足以威胁基本结构之前抵制扰动”(Heylighen, 2001:15)。因此,“复杂适应系统通常位于‘混沌的边缘’,即处于绝对稳定和动荡不停之间的空隙”(Heylighen, 2001:16)。由此看来,“适者生存”指的是环境自身对系统中哪些行动可以达到契合以及哪些达不到契合之间作出“选择”。

不难想象,言语个体是通过终身语言发展来适应语言环境的,但要在集体层面把系统适应合理地类推到语言中就比较困难了。从上节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表现出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即稳定和变化。但要说语言在集体层面上进行适应,那么其适应环境又是什么呢?

对心理语言学家 Christiansen 和 Chater(2008)来说,语言适应的对象是大脑。他们反对内在语言能力是通过生物自然选择进行演化的观点,主张集体层面的语言就像生物物种一样,是通过适应其环境而衍生发展的。不同的是,语言适应是一个文化过程,而非生物过程;人脑正是语言所适应的环境。Christiansen 和 Chater(2008:490)认为:“人类语言结构肯定是围绕人类的学习和加工偏好而形成的,这些偏好源于我们的思维加工结构、知觉运动因素、认知局限和语用限制。我们很容易学会使用语言,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包含语言知识,而是因为语言适应了我们的大脑。”手语研究者发现,这个观点其实可扩展到整个身体,而不仅限于大脑(Aronoff et al., 2008)。

然而,这个观点只关注到了语言必须适应的环境中最稳定的一面,即视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体。另一面则是植根于文化的个人日常行为,表现为巨大的多样性和快速的变化性。为了准确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首先看看语言学传统上是如何理解语言的。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学内部就这个重要问题并未达成一致。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简要回顾两种著名的语言概念: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语言观。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既有社会的一面(即“语言”),也具有个体的一面(即“言

语”)。他认为语言学家应该研究“语言”,因为它是“语言的社会维度,外在于个体,个体自身无力创造或改变它”(Saussure,1986:14)。对于语言的这个维度,索绪尔认为:“作为集体现象,语言是每个人大脑中的印记合成,就像人手一部相同的词典一样。”(Saussure,1986:19)而“言语”则包含在思维和言语行为中,它是“个体的和暂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处理的是个体身心过程,过于异质,因此不能作为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

乔姆斯基也做了区分,但关注点有所不同。对他而言,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为内化语言,即:“在大脑中获得或内在表征的语言知识系统。”它是内在官能与经验相结合的产物(Chomsky,1986:24)。而外化语言则存在于“实际或潜在的言语事件中(也许包括其使用语境和语义内容的描述)”(Chomsky,1986:20)。乔姆斯基认为,外化语言“充其量是附现象”(1986:25),包括诸如历时变化和社会语言学变异等集体现象。

尽管两者观点有别,但都认为一门语言个体说者之间所存在的变异不是具体语言或一般语言的定义特征,而且都把语言理解成与交流 and 特定语境使用无关的语法结构和语音结构。虽然上文提到的基于使用的研究路径不严格区分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但并不排斥语言或内在语言等概念,只不过接纳程度有别罢了。但是,撇开这些区别不谈,基于使用的路径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个体言语行为的方式和成因对阐明语言的本质至关重要。因此,基于使用的语言研究和复杂系统理论是兼容的,理由是:从复杂系统视角来看,鉴于宏观过程可以进行统计描述,且能通过复杂系统理论的一般原则进行解释,故系统中的个体单位看似可以忽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过程的基础正是源于微观层面中系统单位的局部互动,而且要正确理解这样的复杂系统就必须对微观层面的互动作出解释。

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界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来自社会语言学家的田野调查发现:一门语言中说者之间的变异要比过去认为的要广泛得多,语言形式变体和基于年龄、阶层、性别和其他更小规模组别的社会分组之间存在系统关联。然而,社会语言学视角(至少在北美)的一般看法是,与社会相关的变异表明,同一社会分组的说者享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分组的同一语言系统(即“语言”)——尽管可能只在特定规则或特征上有所不同。因此,尽管该领域注重与社区成员合作开展实证研究,但是“社会语言学家并不在意个人的言语行为,而是把他们视为能够代表特定群体(即言语社群)的个体。社会语言学家关注‘最系统的语言形式’,唯恐它被人类社会结构的繁琐细节所破坏”(Kretzschmar,2009:10)。

根据上文的适应性定义,可以说语言已经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响应(即备选形式,如人群中的社会变体、区域变体乃至个人变体),这些响应足够语言系统在面对环境中的各种扰动(指个体之间的持续互动)时维持自身;还应该有某种因素,不管来自语言系统之内还是之外,能够选择合适的响应以应对特定情境。不过,这种观点有别于

传统的语言系统概念。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系统性本质上源于内在官能。内在语言概念否认了会话交流和历史变化等“外在”因素是语言的构成要素或者定义特征。索绪尔并不否认这个事实,但他认为“语言”可以单独进行定义和研究,在描述语言系统时个体差异是无足轻重的;社会语言学接受了索绪尔的假设,只不过做了一点微调。

因此,为了定义语言适应性,有必要给语言下一个不同的定义。该定义不仅要考虑到微观层面的互动会导致宏观层面的结构和过程涌现,也要能够把言语中观察到的变异与复杂适应系统中的多样性和选择等理论概念联系起来。在这方面,Kretzschmar(2009,2015)采用复杂系统视角开展的“言语语言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言语语言学认为,语言包含许多特征变体(即同义的言语变体形式集);这些特征变体作为言说同一事件的备选方式在说者群体中流动,就像基因在生物物种基因库中流动一样。个体说者只有在特定情境中决定使用(或不使用)时才能说“选择”了变体;而当我们说语言系统“选择”变体时,意思是说由于语言系统网络的反馈效应,特定变体在人群中的使用频率可能增加或减少(甚至消失)。

Kretzschmar(2009,2015)的研究显示,特征变体在地域上显示出无标度性的“A曲线”(力量法则)频率分布(即一个特征有极少的高频变体和大量的低频变体)。频率分布的无标度性指的是,尽管社会群组 and 区域大小有别,社群和区域抽样中的变体频率有异,但A曲线模式始终保持不变。这种变体无标度分布产生的后果就是,不论在某个地区的哪个地点,个体都极有可能使用和邻居相同的高频变体。这就形成了一种印象,即他们所操的方言局限于该地区,而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则操的是其他方言。然而,个体之间存在的地域差异实际上是说者相邻局部网络之间的渐进差异。特定的特征变体不会出现在整齐划一的地区,群组的不同特征也不会分布于同一地区。如果有人认为,特定地区(不论其大小)发现的高频变体就证明该地区存在某种假想的共享语言系统,那么他一定忽略了语言系统的动态本质。Kretzschmar(2009)指出,如果把最常见的变体视为系统的或常态的,那么语言学家就可能描写出一种实际上没有人说的语言。

在把适应性概念应用到语言时,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上述定义。说到语言系统的选择时(对应于个体说者的变体选择),不妨在抽象层面上把它视为一个适者生存的过程。语言系统的外在环境可理解为全体说者日常语言使用所在情景变体的总和;Bernárdez(2008:143-144)注意到:“语言使用的基础(即不停变化的互动条件)使得变异成为其直接的必然结果。”选择(即不论变体在语言网络中是否得到传播)取决于说者网络中的反馈过程,因为网络中的个体选择深受他人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超越个体的过程。

然而,要搞清楚语言适应性这个概念,需要定义好语言变异:用复杂系统的话语来说,它相当于系统中存在各种选项。显然,语言中存在很多变异;有意或无意的创

新是日常语言使用的副产品;说者可利用各种变体服务于自身的目的;语言特征变体的相对频率可表示为 A 曲线(力量法则)。至于集体语言系统“必须能够在面对扰动时自动采取措施来维持系统自身的稳定”这个观点,上述事实如何与之相吻合的问题尚未回答。只有当扰动及其应对措施等相关概念变得明确而具体的时候,才有可能就语言适应性做出明确系统的理论定义<sup>②</sup>。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是它能使语言适应性的观点从源自生物学或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隐喻中脱离出来。

### 3. 结束语:复杂性理论与语言学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复杂系统概念与语言研究关系密切,它为异质的语言事实提供了一个统一连贯的解释,尽管在索绪尔看来是无法在一个科学框架下对其进行研究的。把个体说者同时视为复杂系统和具有动态涌现特征的更大系统中的互动单位,有助于发现存在于个体语言使用、交流互动、社会地域变异以及语言变化之间的整体关联。从复杂性视角研究这些关联当然需要跨学科合作,不过复杂性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其提供了共同基础。此外,把复杂性理论应用到语言学还开启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重新定义语言,把源于各个语言相关学科的成果整合起来,而不是人为排除掉或者打入其他类别。复杂系统理论对语言学研究具有很多新启示。如果我们接受语言是包含动态互动单位的复杂系统这个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基于复杂性理论作出有关语言的预测。比如,我们可以预测:说者网络具有复杂网络的特征,其动力分布是分散的,具有涌现特征,包括互为因果以及反馈的过程。适应性是某些复杂系统的附加属性,语言预计拥有这个属性。

#### 注释:

①原作:Pickering, William A. Natural Language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J]. *Estudos Linguisticos*, 2016, 45 (1):180-191. 本文翻译获得了原作者许可,并根据知识共享公共许可证(Creative Commons Public Licenses)条款得到了版权所有者的授权,原文获取网址为:<https://revistas.gel.org.br/estudos-linguisticos/article/view/787>。

②Larsen-Freeman 和 Cameron 就应用语言学中有关概念的使用所做的阐释与提出一个明确的语言适应性观点直接相关:“比如,如果我们主张‘中介语是复杂系统’,那么这究竟是说中介语满足了复杂系统的各项标准呢,还是采用打比方的方式说中介语像复杂系统?复杂性理论若想超越这种隐喻性或桥接性的角色,我们就得对其进行合理的归类,即我们得采纳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标准来回答上述问题。”

#### 参考文献:

- [1] Aronoff, M., Meir, I., Padden, C. & W. Sandler. Open Peer Commentary: Language is Shaped by the Body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8, 31(5): 509-511.
- [2] Beckner, C. et al. 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sition Paper [J]. *Language Learning*,

- 2009, 59(1): 1-26.
- [3] Bernárdez, E. Collective Cognition and Individual Activity: Vari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G] // Frank, R. M. et al (eds.). *Body, Language and Mind* ( vol. 2 ) .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8: 137-166.
- [4] Boeckx, C. *Elementary Syntactic Structur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 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M]. New York: Praeger, 1986.
- [6] Christiansen, M. H. & N. Chater. Language as Shaped by the Brain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8, 31(5): 489-509.
- [7] Croft, W. *Grammar: Functional Approaches* [EB/OL]. [2015-10-04]. <http://www.unm.edu/wcroft/Papers/Functionalism-IESBS2ed.pdf>.
- [8] Croft, W. *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 [M]. Harlow: Longman, 2000.
- [9] de Bot, K. , Lowie, W. , Thorne, S. L. & M. Verspoor.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s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G] // Mayo, M. et al.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199-220.
- [10] de Bot, K. The End of Psycholinguistics as We Know It? It's about Time! [G] // Judit, N. et al. *Mentális folyamatok a nyelvi feldolgozásban (Mental Procedure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Budapest: Tinta Könyvkiadó, 2012: 10-19.
- [11] Easley, D. & J. Kleinberg. *Networks, Crowds, and Marke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0.
- [12] Ehala, M. Self-Organ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J]. *Diachronica*, 1996, 13(1): 1-28.
- [13] Fagyal, Z. et al. Centers, Peripheries, and Popularity: The Emergence of Norms in Simulated Networks of Linguistic Influence [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10, 15(2): 81-90.
- [14] Fran, R. M. & N. Gontier. On Constructing a Research Model for Histor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HCL):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G] // Winters, M. E. et al. *Histor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0: 31-69.
- [15] Heylighen, F. The Science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Adaptivity [G] // *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 vol. 5 ). Paris: EOLSS Publishers, 2001: 253-280.
- [16] Heylighen, F. Complexity and Self-Organization [G] // Bates, M. et al.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9: 1215-1224.
- [17] Jakobson, R. *On language* [M]. Cambridge: Harvard, 1990.
- [18] Keller, R. *On Language Change: The Invisible Hand in Languag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19] Köhler, R. & G. Altmann. Aims and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G] // Altmann, G. et al. *Problems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Černivci: Ruta, 2005: 12-41.
- [20] Köhler, R. Synergetic Linguistics [G] // Köhler R. et al (eds.). *Quantitative Linguistik/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5: 760-774.
- [21] Kretzschmar, W. A. *The Linguistics of Spee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9.

- [22] Kretzschmar, W. A. *Language and Complex System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5.
- [23] Labov, W.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vol. 2)[M]. Oxford: Blackwell, 2001.
- [24] Larsen-Freeman, D. & L. Cameron. *Complex System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 [25] MacWhinney, B. & W. O'Grady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Emergence*[G].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5.
- [26] Minnett, J. W. & W. S. Wang. Modelling Endangered Languages: The Effects of Bilingu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J]. *Lingua*, 2008, 118(1): 19-45.
- [27] Mufwene, 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1.
- [28] Mühlenbernd, R. & J. Quinley. Signaling and Simul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13, 19(1): 129-138.
- [29] Naranan, S. & V. Balasubrahmanyam. Power Laws in Statistics and Related Systems [G] // Köhler, R. et al (eds.). *Quantitative Linguistik/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5.
- [30] Raczaszek-Leonardi, J. Multiple Systems and Multiple Time Scales of Language Dynamics: Coping with Complexity[J].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2014, 21(1-2): 37-52.
- [31] Sampson, G., Gil, D. & P. Trudgill. *Language Complexity as an Evolving Variable*[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9.
- [32]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Chicago: Open Court, 1986.
- [33] Wedel, A. Self-Organization in Phonology[G]//Van Oostendorp, M. et al.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onology: Suprasegmental and Prosodic Phonolog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 130-147.
- [34] Wildgen, W. & P. Brandt (eds.). *Semiosis and Catastrophes: René Thom's Semiotic Heritage* [G]. Bern: Peter Lang, 2010.
- [35] Zuidema, W. & B. de Boer. Modelling in the Language Sciences [G]//Podesva, R. et al. *Research Method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3: 422-439.

责任编辑:蒋勇军

# 在线视角下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

## ——《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网络课程案例研究

杨鲁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本研究为质性个案研究,深入分析参加《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网络课程学员所提交的反思日志。数据分析发现学员教师一致指出该课程设计合理,内容全面,该课程带领学员教师“领略了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完整体系”,在教学理念、教学实践、教师角色与职业认同、职业发展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为广大教师的自我学习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该课程案例也说明了外语教师专业发展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个性化、持续性学习。

**关键词:**外语教师;在线研修;网络课程;教师发展;混合式学习模式

## Onlin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YANG Luxin

**Abstract:** Taking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flective journals written by the teachers who took the online cours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ticipating teachers unanimously acknowledge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content and the proper course design, leading them to experiencing the complete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addition, participating teachers gained new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theories, teaching practices, teacher’s role and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became clear about what they need to make effort i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case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development so as to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16JJD740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鲁新,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二语写作、外语教学、外语教师教育研究。

space and help teachers realize individualized and continual learning.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online learning; online courses; teacher development; mixed learning mode

## 0. 引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明确指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强我国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教师教育的水平,是实现教育改革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周燕、张洁,2012;宋永刚,2013)目前,高校英语教师普遍存在自我发展的愿望,但由于教学工作量大、进修机会少、生活压力等原因,教师对进修机会的渴求是一个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周燕,2005)面对教育部门和学校所能提供的教师发展资源不足,教师进修机会少的困境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网络研修则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实现终身学习的一种可行、有效的新途径。(宋永刚,2013)

网络研修是以网络协同学习平台为技术支撑而开展的有组织、有引领的教师自主研修活动方式,旨在突破面对面教研培训活动的时空局限性与资源交流的不充分性,为教师提供更为多元、自由的发展选择。(马立、郁晓华、祝智庭,2011)基于中国知网近十年文献的搜索,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探讨了网络教育的优势(牛丽娜、丁新,2004)、网络教育中教师角色的定位与发展(徐红卫,2010)、网络课程与教学模式(魏肖鱼,2011)、网络环境下的学生自主学习(何明霞,2012)、网络外语教学资源与平台建设的研究(娄立原,2010)、外语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及角色转换等(李海伦、李芳军、王力,2016)、网络外语课程的现状(曹文,2015)、新型网络课程(如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的应用(梅明玉,2015)、教师对网络教学资源的应用现状调查(严倩,陈亚杰,2014)等。这些已发表的研究多为经验类、思辨性的描述,缺乏基于实证的研究,而关于网络课程与教师发展关系的研究寥寥无几,几乎没有实证研究探讨网络研修对教师教育理念及教育实践方面的影响。

虽然很多外语教师认同以学为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但是很多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与他们的课堂行为之间仍存在差异。(周燕,2005,2008)近几年,高校里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外语教师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些教师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素养,但是很多教师却不能将所学到的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理论与研究成果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出现了“一边是高深的学术水平,一边是肤浅的教育素养”的现象。(邱春安、吴磊,2009:82)为了帮助广大外语教师实现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的对接,切实提升教学质量,同时探索网络课程促进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笔者与外研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U讲堂合作推出了《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系列课程。本研究是基于第一季课程《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探索网络研修对教师教育理念及教学实践



可能产生的影响。指导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①学员教师如何评价网络课程《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②通过学习《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网络课程,学员教师是否有收获?如果有收获,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质性个案研究(Creswell, 2007; Merriam, 2001),深入分析了学员提交的反思日志,全面了解《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课程的教学效果,为今后的网络课程的策划与设计提供参考。

### 1.1 网络课程《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

基于笔者十年的教学法课程授课经验,同时考虑到目前国内外语教师普遍缺乏语言学习的理论素养、课堂活动设计缺乏创新等问题,《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课程围绕外语教学中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外语教学活动(包括语法、词汇、听力、口语、阅读、写作教学)、课堂评估等进行案例式系统讲解,全面阐释外语教学所涉及核心理念与方法,对于教师如何组织课堂活动、完善课堂评价也进行了深入分析。

该课程采取“线上研修”与“线下阅读”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每一讲直播课程开始的前一天将课程讲义上传到课程平台,课程助教在QQ群里提醒学员教师下载并阅读。线上研修时,笔者会对课程讲义上的重点内容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解答教师们课前阅读碰到的困难和疑惑。除了课前预习的课程讲义,笔者为每一讲课程内容都提供了大量的阅读资源(共近2000页),供学员教师课下阅读,巩固学习效果。因此,“线下阅读(预习)”“线上研修”“线下阅读(复习)”三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修学习链。

由于本次课程采取的是线上直播形式。因此,为了保障和学员教师及时沟通,随时解决他们在课程学习中遇到的课程内容及直播观看技术等问题,U讲堂课程助教在开课前建立了课程专属QQ群,覆盖了所有的学员教师。课程助教每天在群里提醒学员教师当晚的学习内容,提醒学员教师下载讲义进行预习,并随时解答学员教师的问题,学员教师对于本课程以及和外语教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群里进行交流互动。同时,U讲堂直播课程平台设有公共讨论区和专家答疑区,供学员教师随时与其他学员和主讲专家(笔者)互动讨论。

### 1.2 研究对象

共有198名学员参与学习了《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直播课。课程结束后,笔者收到了98份学员教师反思日志(文中学员信息都是笔者在学员的反思日志正文中提取出来的)。其中,有51位教师提供了姓名、性别和学校信息,包括43位高校外语教师(84%)、5位职业技术学院教师(9.8%)和3位中学外语教师(5.9%)。51位教师中,有33位教师还提供了其学历和教龄信息。具体而言,有25位学员教师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25/33,76%),2位学员是在职研究生,5位学员拥有本科学历(15%)和

1 位在读博士(3%)。从学员教师的教龄看,教龄在 0~5 年的教师有 2 位(6.5%),教龄在 6~10 年的教师共有 12 位(38.7%),教龄在 11~15 年的教师共有 9 位(29%),教龄在 16~20 年的教师共有 4 位(12.9%),教龄在 20 年以上的教师共有 4 位教师(12.9%)。其中,一位教师的教龄长达 26 年。总之,参与该直播课的学员教师中,大部分为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高校外语教师,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 1.3 数据收集与分析

该课程共有八次直播(2016 年 7 月 6 日—7 月 8 日,7 月 11 日—7 月 15 日的 19 点 30 分到 21 点),每次时长为 1.5 小时,包括 15 分钟到 30 分钟的答疑时间。由于学员积极参与在线答疑环节,实际直播结束时间推迟 20 至 40 分钟。学员教师按规定在课程有效期内(三个月)通过 U 讲堂课程平台提交了反思日志。按照笔者的要求,反思日志字数不少于 500 字,中英文均可,主要汇报学员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及学习之后的收获、问题及建议。

该课程共收到 100 份反思日志。U 讲堂的后台管理人员将其从课程平台导出,并整理出学员档案(包括学员登录邮箱账号、用户昵称、用户姓名及反思日志)。笔者与 U 讲堂管理人员一起对所有的反思日志认真研读,进行筛选和梳理,共整理出有效反思日志 98 份,平均篇幅约为 855 字。有些教师在反思正文中会对自己的现状做一些简要介绍,通过这些介绍,笔者能够了解学员的个人信息,包括所在学校、所教班级(英专/大英/基础)、年龄、教龄、职称等。这些信息对于后期的内容分析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不同教龄的教师教学理念会有差异,教师所在的院校水平、所交学生的所处学段对于教师的授课方式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在阅读反思日志时,笔者对学员教师表达的收获、问题及建议进行了相应标注及归纳梳理,找出学员教师在职业发展中的共同问题,以及学习完该课程之后的共性收获。针对一些学员教师提出的个性的想法或建议,笔者结合学员教师背景进行了分析。学员教师主要评价了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并针对教学理念、教学实践、教师角色与职业认同、职业发展等方面畅谈了自己的收获与感悟。

## 2. 研究发现

### 2.1 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

学员教师一致指出本课程设计合理,内容全面,覆盖了外语教学中的核心理念、核心教学内容。正如教师 1 所说,该课程带领学员教师“领略了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完整体系”,为广大教师的自我学习与发 展指明了方向。

“在为期两周的课程中,杨教授从课程与教案设计到语法、词汇、听力、口语、阅读、写作、专项技能的教学再到课堂评估,带领我领略了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完整体系,对自己的教学以及研究工作都是极大的启发,感觉收益良多。深刻体会到要想

成为一名称职的外语教师,需要不断的自我学习、反思、实践。(教师1,来自某职业技术学院,在职研究生学历,9年教龄,从事大学英语教学)

本课程采取线上研修与线下阅读相结合的学习形式。对于该教学形式,教师们给予了极大地肯定。线上学习免除了线下面授所面临的交通、住宿、时间、家庭等问题,教师们可以通过网络研修,近距离与专家交流互动,接受系统全面的指导。课程提供的大量阅读材料也为教师们提供了预习和复习的机会,保证了研修效果。该课程特别满足了来自相对较不发达、学习资源匮乏地区的教师,为他们参加高水平研修、不断提升学习提供了机会。

线上课堂没有让我失望,时间的灵活,资料的丰富,更多反刍的时间让我感觉学习的愉悦。(教师2)

正如教师3在反思日志中所说,该课程以教学案例为载体,深入浅出地剖析每个教学活动所依据或遵循的语言教学理论。通过这些教学案例视频,学员教师可以反复观摩、思考笔者的点评、反刍学习的理论。

整套课程围绕课堂教学,特别适合广大外语一线教师,几大模块环环相扣,既有直观的教学案例赏析,又有教学背后的学术理论讲解,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课堂还可以这般精彩,原来教书还可以这般快乐,原来教学理论还可以这般通俗易懂!(教师3,来自某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9年教龄,从事大学英语教学)

同时,在课程授课过程中,笔者全程贯穿了自己的求学和教研经历,鼓励大家多读书、勤思考、不盲从,促使教师深入反思自己的学习和教学经历。

杨老师的风格一如既往,语速快,没有废话,信息量大,最主要的是极为亲切自然,用自身经历鼓励后学多读书,多思考,不盲从,而这些都是一个正直的学者所应具备的!(教师4)

## 2.2 教学理念

教育是艺术,也是科学。大多数学员教师进入了职业发展瓶颈期,对教学感到厌倦,不清楚如何突破。他们坦诚自己从未系统学习外语教学法相关知识,不了解外语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而且平时工作中很少阅读教学法方面的书籍,教学主要“跟着感觉走”。正如教师5所反思,很多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并不清楚自己的目的和意图,很多活动设计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学生很难从活动中有所收获。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很多教师认识到教学不仅仅是经验的积累,更是需要理论指导的创造性行为。有效的课堂教学是需要教师深入理解教学理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经过本次系统的课程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英语教学一定要有教学理念作指导,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计划,精心设计每一个课堂活动,精心设计每一个课后作业。当我认真把英语教学中关于“词汇、语法、阅读、听力和写作”等相关节目看完,学习和掌握了相关教学中存在的理论原则后,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教学并没有按照这些理论原则去实施课堂教学,也没有弄清楚有效的教学背后还要有相应的理论原则和教学设计作支撑。很庆幸,这个暑假能够安下心来,丢弃习以为常的一些旧的观念和方法,珍惜时间重新学习,重新设计自己下个学期的课程。(教师5,来自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 2.3 教学实践

通过该课程学习,学员教师认识到在教学实践中需要了解学生需求、明确教学目标、谨慎选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设计以及重视教学反馈和评估。首先,学员教师进一步认识到备课时了解学生需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有的课堂活动设计也都要以学生需求为出发点。例如,教师6反思自己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以教材为中心,忽略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学习风格等。教师们认识到在准备每门课程,包括每一节课之前,需要做学生需求分析,即了解学生必学的内容(necessities),需要学习的内容(needs)和学生想学习的内容(wants)。

我的专业是英语教育,我知道在备课时需要“备学生、备教材、备方法”,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重点关注的是教材,一心围着教材转,不敢越雷池一步。忽略了授课的对象——学生。在选材、教学方法上,不能从学生的立场出发,不能考虑学生的接收能力,不能考虑学生的兴趣,自己还总是埋怨学生不够用功。(教师6,来自某航空学院,22年教龄,从事大学英语教学)

其次,教师需要明确本课程、本单元、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及其内在关系。正如教师7在反思日志指出,很多学员教师认识到了明确教学目标的重要性。只有在具体教学目标的指引下,教师在选择教学材料和设计活动时才能做到科学合理、有据可依,课堂教学才更有针对性,从而有可能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教育。因此,教师在设计课程、单元、课时的教学活动时都应当把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设定为最终目标。

通过课程学习,我认识到首先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学习,

每个单元的学习并不是独立的。在上课之前应该对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设定一个学习目标,并把目标实现的子目标设定为相对应的每个单元的学习目标。为了实现每个单元的学习目标,应该根据目标对课文内容进行选取和设计,再补充相应的学习材料,以读促写,以听促说。学习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培养。(教师7,来自某农业大学)

第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教师们认识到在教学中需要慎择教学内容,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思想和行动都被教材所束缚,没有考虑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缺乏对教学目标、学生需求定位的思考。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教师们认识到真正的语言教学应该是将语言、内容、思维和文化有机融合。首先,教材要服务于教学。教师应该从学生的需求出发,灵活选择合适的教学材料,而不是“死扣”教材。其次,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外语教师应该让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文化,潜移默化提升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第三,教学内容对学生要有认知挑战性。在富有挑战性的活动中,学生才能积极思考,运用已学习的语言和内容知识进行讨论。在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学习才能发生。

在过去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被要求跟着教学大纲走,每个星期该上什么内容、该完成什么教学任务都是固定的。学习了这门课程后,明白了教材当然是为教学服务,其实没有一种教材可以同时满足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教学目标,教师应立足于教学目标,教师应该也有权利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灵活选择内容、灵活安排教材的呈现顺序与方式,而不是被教材牵着走。我之前的教学就是杨老师经常批判的“包教不包会”,把教材内容呈现完了,教师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教师8,来自某文理学院)

第四,学员教师认识到优化自己教学设计的必要性。很多教师苦恼不知如何教授某个技能模块,如听力、词汇、语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教师们认识到语言技能的各个环节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在设计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注重各个技能模块的联系,实现听、说、读、写活动的有机结合。作业的形式也可以丰富多样,让学生通过融合的任务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各方面的英语能力。即使同样的教学材料,面对不同专业、不同水平的学生,教师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按照学生具体需求设计相应的课堂活动。

通过这次课程,我了解到听说课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听说结合,而不仅仅只是老师放听力,学生做题,再对答案,老师可通过提问、课堂讨论、复述各种教学形式丰富课堂教学,作业也很丰富,听写、转写、写 summary 等各种形式可以促进学生课下也

多听。阅读和写作也更是互相补充,教师应通过各种教学策略以提高学生读写能力。总之,教学活动设计要和学生需求、语言教学等各种因素紧密结合。(教师9)

第五,学员教师认识到日常教学中需要重视教学反馈和评估。很多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教”的过程,而忽视了“教”的结果。学生到底有没有学会来自课堂的知识?教学是否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教师们认识到教学反馈和评估在整个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日常教学中的测试不是为了为难学生,而是给学生机会展现已学到的知识和能力,帮助学生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其更长远的学习与发展。

听了第9讲关于测评这一课,突然觉得我是个很 mean 的老师。我就是那种考试前只告诉学生题型,出卷时想着怎么为难学生的那种老师,没有想过让学生们在考试中表现最棒的自己。听了最后一讲,很受用,我想我的学生都会很感谢杨老师的。(教师10,来自某文理学院,硕士,4年教龄,从事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学)

#### 2.4 教师角色与职业认同

很多教师反映外语教学很累,即教师累,学生也累。教师们感觉累是因为传统的外语课堂经常是教师主导的“满堂灌”“教你没商量”。而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忙着记笔记,背单词,没时间内化,导致实际教学效果低下。久而久之,学生对外语学习失去了兴趣,慢慢开始应付外语课堂。学生失去兴趣了,教师们则更没有动力,恶性循环就这样产生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教师们认识到上述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教师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不足。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是课堂的组织者、学习的引导者和学习环境的创造者。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从而实现其终身发展。教师的角色就是选择合适的教学材料,通过一系列的课堂活动,在日常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这过程中,教师也需要不断学习,即多阅读、勤反思,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大学毕业后我就职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担任大学英语老师。工作之初,曾经非常尽职尽责的想把一切知识教给学生,但事与愿违,自己累、学生似乎也很累,而效果甚微。教学的瓶颈让我这次报了杨老师的课程。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教师是知识的来源,是课堂的主宰。然而,让学习发生才能实现教学目标。教师不能只是知识的传播者,更应该是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学习环境的创造者。(教师11,来自某工学院,19年教龄,从事大学英语、英语演讲、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

#### 2.5 职业发展

大多数外语教师,特别是女性外语教师,缺乏职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很多女教师

常以照顾家庭为托辞说明自己没有时间学习。在职业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也只是嘴上和心里抱怨,却没有勇气采取实际行动改变这种相对安全的现状。正如教师 12 指出,很多“老教师”很少思考课堂教学问题,对教学改革持有消极态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教师们认识到不论处在教学生涯的哪个阶段,教师都应该不断学习、勇于改变。

对于我这样的“老教师”来说,大多很少思考课堂教学的问题,也不太有热情去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效果。然而我一直有个心结,虽然身边的同事大多对教学改革持有消极态度,而自己却不甘于接受每次教学不理想而经历的挫败感,因为我想不断改进,只有寂寞前行,不知道路在何方。杨老师的网络课程让我近距离感受到,杨老师就是我的引路人,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可以成为我的同路人,不再孤单。(教师 12,来自某理工大学,英美文学硕士,18 年教龄,从事大学英语教学)

另外,很多外语教师认为教学和科研是分离的、矛盾的。一方面,教学任务重,无法做科研。另一方面,迫于职称晋升压力,教师们又需要做研究,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教师们纷纷表示看到了教学与科研的内在相关性,认识到教学问题与研究问题的互通性,教学中的很多方面是可以进行深入研究,而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也可以反哺教学。教师们非常认同笔者倡导的“以教促研、以研促教、教研一体”的理念,科学地实现自身的职业发展。

杨老师积累多年的科研经验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外语教师平时可做的科研原来这么多。在写作的反馈阶段,我平时也偶尔用到学生的同伴反馈,但是一直在寻找好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发现原来科研可以这么好的反哺教学,杨老师的讲解像及时雨一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要做个有心人,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科研选题,杨老师说要从小处入手聚焦科研问题,想想需要搜集什么样的数据。(教师 13,硕士,7 年教龄,从事大学英语教学)

### 3. 结语

本研究以网络课程《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为例,展示了“线上研修”与“线下阅读”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有效性。本研究发现学员教师一致认可《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授课方式,并指出了自己在教学理念、教学实践、教师角色与职业认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收获。本研究发现表明教学内容与授课方式是决定网络课程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助教提醒和互动平台是实现网络课程教学效果的保障因素。课程设计者和主讲专家需要充分了解学习者需求,教学内容要丰富而时新,教学方式要深入浅出,易于学习者理解。

另外,本研究发现也体现了网络课程的独特优势,即突破了传统面对面研修活动

的空间局限性、时间间断性和资源交流欠缺性(马立、郁晓华、祝智庭,2011)。由于网络固有的交互性特点,学习者可以不用远离工作单位和家庭,在专家的引领下随时进行学习;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变得多元化,反馈和传递信息可以在实时状态,也可以延时传递;学习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学习特点确定反刍和内化的时间(徐红卫,2010)。由于跨越了时空的局限,学习者可以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来选择信息的进度和难易程度,实现个性化学习。

总之,本研究发现表明当今的教师发展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认真思考如何创设网络教师学习共同体,逐步形成教师在线研修生态圈,切实为教师的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而服务。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跟踪参与网络研修的教师,了解他们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在网络课程中学到的理念与方法,为网络研修效果持续化提供参考性建议。

#### 参考文献:

- [1] Creswell, J.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M]. Thousand Oaks: SAGE, 2007.
- [2] Merriam, 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1.
- [3] 曹文,等. 中国中小学英语网络教学的现状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5(164):41-46.
- [4] 何明霞. 基于网络环境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监控理论与实践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 [5] 李海伦,李芳军,王力. 网络辅助外语教学中的教师角色:基于 Blackboard 网络教学平台的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2):67-71.
- [6] 娄立原. 重庆高校校际外语网络教育资源共享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 2010.
- [7] 梅明玉. 微课与翻转课堂在电大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 天津电大学学报, 2015(19/4):52-56.
- [8] 马立,郁晓华,祝智庭. 教师继续教育新模式:网络研修[J]. 教育研究, 2011(382):21-28.
- [9] 牛丽娜,丁新. 基于网络的教师继续教育[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04(70):28-30,71.
- [10] 邱春安,吴磊. 后方法视角的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探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09(16):82-83.
- [11] 宋永刚. 高校教师网络培训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高等教育, 2013(15):43-45.
- [12] 魏肖鱼. 大学英语网络课程中的任务教学设计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 [13] 徐红卫. 高校网络教育中教师角色的定位与发展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0(2):127-128.
- [14] 周燕. 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调查与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3):206-210.
- [15] 周燕,张洁. 外语教师认知方式及需求研究:基于一项暑期研修班的个案调查[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1):6-10.
- [16] 严倩,陈亚杰. 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外语教师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现状分析:以内蒙古地区五所高校为例[J].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116-120.

责任编辑:朱晓云